


中国近代史

上册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中国史组编



中国近代史

上册

上海师大历史系中国史组编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	1
一、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社会	1
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	5
三、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	7
第二节 正义的禁烟运动	10
一、可耻的鸦片贸易	10
二、正义的禁烟运动	14
第三节 英国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和中国人民的 反侵略斗争	18
一、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	18
二、沿海军民英勇抗战和清政府被迫抵抗到 妥协投降	20
三、英国扩大侵略战争和清政府卑屈投降	26
四、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31
五、闽、浙和沿江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36
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和中国开始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8
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38
二、《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40
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4
第五节 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和地主阶级改革	
派的革新思想	48
一、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48
二、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革新思 想	51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 胜利发展	59
第一节 革命前夜的阶级斗争形势	59
一、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	59
二、反清起义的蓬勃兴起	63
第二节 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64
一、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和革命理论	64
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70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73
一、金田起义	73
二、定都天京	76
三、北伐、西征和天京外围的战斗	81
四、各地天地会和捻军起义	85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和各项制度政策	90
一、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90

二、太平天国实行的各项国内政策·····	93
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对外政策·····	98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101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106

第一节 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英、法、美 扩大侵略的阴谋活动·····	106
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沙俄侵 占中国大片领土·····	106
二、英、法、美企图在中国扩大侵略·····	110
第二节 英、法发动侵略战争和《天津条约》 的订立·····	115
一、“亚罗号”事件和英、法联军发动侵略 战争·····	115
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18
三、英、法联军北犯大沽和《天津条约》的 签订·····	121
四、沙俄逼订《璦琿条约》·····	125
第三节 英、法侵略联军再次燃起战火和《北 京条约》的签订·····	128
一、英法侵略者重燃战火·····	128
二、天津、北京陷落和《北京条约》·····	131
三、沙俄逼订《中俄北京条约》和中国人民 的反侵略斗争·····	134
四、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全面勾结·····	141

第四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英勇斗争…………… 144

第一节 韦昌辉、石达开的变乱…………… 144

一、太平天国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144

二、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 146

三、石达开的分裂出走…………… 148

第二节 太平军的重振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150

一、前线军事形势的逆转…………… 150

二、太平军重振军威——三河大捷、扫平江北、江南大营…………… 151

三、太平军东征苏、常和痛打外国洋枪队…………… 153

四、安庆保卫战和太平军进军浙江…………… 155

五、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157

第三节 太平天国抗击内外反动派的英勇战斗… 160

一、中外反动派紧密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160

二、同外国侵略军鏖战江、浙战场…………… 161

三、天京保卫战和太平军余部的英勇战斗…………… 166

四、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 170

第四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失败原因…………… 175

第五节 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 182

一、贵州的苗、教军起义…………… 182

二、云南彝、回民起义…………… 184

三、西北少数民族起义…………… 187

第五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89

第一节 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控制的加强及其对华经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 189

- 一、外国侵略者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189
- 二、外国商品输入、原料掠夺的激增及其在中国创办工厂企业 194
- 三、侵略者侵犯沿海沿江航运权利和控制我国金融 197

第二节 洋务运动 201

-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和洋务派的尊孔卖国思想 201
- 二、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 205
- 三、以“求富”为目的创办民用工业及其作用 207
- 四、外国侵略者控制下建成北洋海军和海防设施 212
- 五、洋务运动的后果和洋务派的性质 215

第三节 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 217

- 一、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和农村阶级分化的加速 217
- 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21

三、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228
第四节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及其早期状况·····	232
第六章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侵略。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	238
第一节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238
一、宗教文化侵略和传教士的罪恶活动·····	238
二、利用孔教作为洋教侵略的帮凶·····	247
三、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和天津教案·····	251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边疆和邻邦的侵略·····	254
一、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我国台湾和侵占琉球·····	254
二、英国侵略缅甸和我国云南、西藏·····	256
三、沙俄、英国对我国新疆的侵略·····	259
第三节 中法战争·····	265
一、法国侵略越南及其企图经由越南侵入中国·····	265
二、中法交涉和法国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	267
三、战争第一阶段——从法军进攻山西到《中法简明条约》·····	271
四、战争第二阶段——从法军在谅山挑衅到《中法越南条约》·····	273
附地图·····	282

第一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 社会和中外关系

一、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社会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清朝在康熙末年，土地占有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①的现象。到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奏摺中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日趋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高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如：乾、嘉时期的大学士和坤占有地亩八千余顷，他的家人刘全及马某也占有地亩六百余顷^③；道光时任大学士的琦善，拥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亩之多。^④

① 邱家穗：《丁役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

②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第十二—十三页。

④ 德庇时：《战时与和平后的中国》，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广大农民负担繁重的地租和清王朝的苛捐杂税，他们不仅折价变卖鸡豚布帛，“甚至有卖儿鬻女以偿租者”。农民过着“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的生活。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晴事耕耘，两勤织绩”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

但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已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丝织业、棉织业、制瓷业和造纸业等手工业中，出现了不少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例如在丝织业中就已产生“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①的手工工场。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苏州阊门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设立踹坊四百五十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②可见那时已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具有雇佣关系的手工业作坊。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乾隆、嘉庆年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黄浦江已是“头尾相接，密如梳齿”的“沙船之乡”了。上海小东门一带已形成比较繁华的市场，当时的《竹枝词》有云：“东门一带烟浦阔，无数樯桅闯广船。”“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

① 《奉各充永禁机匠叫歇碑记》，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② 《雍正硃批谕旨》第四十二册，第七十六——七十七页，引自同①第二五六页。

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赖以成立之历史前提。”^①因此“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②然而由于封建经济居于统治地位，封建统治者采取“重农抑末”的政策，同时和手工工场并存的是大量的农村副业、家庭小手工业和小作坊，手工工场在这中间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而已。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削使广大农民一贫如洗，哪里还有余钱剩米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贵族和地主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租米贡赋，主要是供自己挥霍享用。结果是社会经济停滞，国内市场狭小，商品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严重地束缚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就已走上了下坡路。从嘉庆朝（一七九六年到一八二〇年）开始，政治更加腐败，军备日益废弛，财政越发混乱。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官僚们都是些贪污腐化、昏庸残忍的豺狼。嘉庆朝查抄权臣和坤家产时，其全部资财竟达八亿多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二十年国库收入的总和。这充分暴露了贪污搜刮的严重性。地方官吏在其所属府县，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无一不是“民之蝥贼”。当时的民谣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僚无官不贪的贪婪本性。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军队，也腐败不堪。八旗兵早已腐朽，绿营兵也已败坏。武官克扣粮饷，不管营务，士兵扰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四九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

劫财，凶残暴虐，平时从不训练。军队的腐败，是清王朝衰弱的标志之一。

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竭力鼓吹反动的孔孟儒家思想，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宗法思想，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植。清统治者给孔老二加上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头衔，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并规定以孔孟之道作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以培养忠于清王朝的奴才，牢笼知识分子。对于反对孔孟封建宗法思想的任何微弱表现，极力进行镇压，屡次大兴文字狱，它公开宣称，反对忠君就是违犯封建的“伦理纲常”，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处以极刑。妄图以此钳制社会进步思想的发展，杜绝人民的反抗思想，对人民进行愚民统治。鸦片战争前夜，清朝文化思想领域里，笼罩着一片“万马齐喑究可哀”^①的沉闷空气。

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生活逐年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以农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和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日趋活跃。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南方以天地会为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先后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各兄弟民族如回族、苗族、瑶族和维吾尔族人民，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各族人民的起义风雷，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这些起义虽然都被清政府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起伏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清朝的反动统治已经是日薄西山，开始没落了。

^① 《龚自珍全集》第五二一页。

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

正当清王朝国势江河日下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为了掠夺资源和扩大海外市场，攫取高额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扩张，到处侵略。

鸦片战争前夜，世界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已经是走遍全球寻求殖民地的头等侵略国了。一八二五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来推销其工业品，以摆脱经济危机，就成了英国进一步向外扩张侵略的根本动因。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加紧推行它的殖民事业。一八一九年，又占领了通往远东的重要基地新加坡。一八二四年开始武装侵略缅甸。一八三八年，侵入阿富汗，同年又胁迫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样，英国就把它的侵略势力推进到中国的海疆和边境。贪婪横暴而又积有殖民经验的英国海盗，对清王朝统治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国这块肥肉，垂涎欲滴，抱有极大的侵略野心，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

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十六世纪后，它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展。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一七二七年，中俄两国通过谈判，划分中段边界，订立《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界约》，规定“从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起到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老沙皇争霸欧洲，瓜分波兰，狂热地向外扩张，野心

勃勃地要并吞中国黑龙江流域和蒙古地区。早在一七三三年，沙俄侵略者就狂吠：“向北京提出对外蒙古和黑龙江的要求。”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也发出“占领阿穆尔河对我们说起来就是事关重要的”叫嚣。一七九九年，沙皇政府建立了“俄美公司”，把中国的库页岛也划入其经营范围。一八〇四年到一八一一年间，沙俄侵略者多次寇掠库页岛。一八二一年，沙皇政府宣布太平洋海岸北纬五十一度以北为俄国的独占区，该线通过库页岛中部和黑龙江口以南。铁的历史事实证明，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老沙皇就象贼一样，已经偷偷摸摸地把它的魔掌伸向中国东部北部边疆地区了。

美国经过独立战争以后，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工厂开始广泛使用蒸汽机，纺织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都迅速发展起来。美国的商业资本一直在向海外伸展势力。在非洲、阿拉伯和波斯沿海，美国商船非常活跃；在远东，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和菲律宾等地，都有美国商船的踪迹。一七八四年，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此后，到中国贸易的商船与日俱增。美国商人把一些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毛皮和从土耳其贩来的鸦片，运到中国高价出售，转手之间，获取巨额暴利。美国也跃跃欲试，急于侵入中国。

法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法国资产阶级也积极地向外扩张殖民势力。在非洲，它以武力占领了阿尔及利亚的部分领土，与英国争夺埃及，还企图控制摩洛哥和突尼斯；在远东，它以极大的侵略野心注视着越南和中国。

英、俄、美、法，是在鸦片战争前虎视眈眈企图侵略中国的四个主要国家。英国为了加紧和其他侵略国家勾结，共同宰割中国，当它决心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时，公开声称，不管英国从中国取得多少新的利益和特权，无意一国独吞，愿与他国共享。美国和法国为了自己的侵略利益，积极赞助英国，特别是美国在鸦片战争中直接充当了英国的主要帮凶。

三、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

中国人民对外的正常贸易已有悠久的历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主要贸易国是葡萄牙和荷兰等国，此后主要的则是英国，次为美国和俄国。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政策。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规定中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进出口贸易概归公行经营。公行是由专营欧美贸易的洋行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习惯上称为“十三行”。行商均由地方官承允，报官府备案。公行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帮助官府监督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并负责征收出入口关税，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一切交涉的中间人。由于他们和清朝官府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所以又叫官商。清朝政府同时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一定季节来华贸易等“防范外夷规条”，限制外国商人在华活动的范围。这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策。清朝统治者把自己关闭在“天朝上国”的圈子里，抱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的态度，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

^① 《乾隆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乾隆朝东华录》五十八年九月。

展。但是，这种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强盗侵犯中国主权，抢劫中国物资，掠夺中国人口，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

清政府虽然采取闭关政策，但广州的对外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是在不断发展中。例如，一七五一年，外船到黄埔的总数是十八艘，其中英船九艘、荷船四艘、法船二艘、丹麦船一艘、瑞典船二艘；一七八九年，外船到黄埔的总数八十六艘，其中英船六十一艘、美船十五艘、荷兰船五艘、法船一艘、丹麦船一艘和葡萄牙船三艘。^①以上数字表明，在三十多年中，来华外轮增加了近四倍，而英国始终占外轮总数的一半以上，占绝对的优势。

英国在对华贸易上虽占首位，可是它的工业品却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得到倾销。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地抵抗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广大农民遭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生活极端贫困，根本无力购买外国进口的工业品，而且他们习惯于穿着结实而廉价的土布。官僚士绅等社会上层人士，服装多用丝绸，而中国的养蚕业和丝织品在当时举世无匹。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很少有销路，而中国的丝茶却有很广阔的海外市场。

由于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缺乏销路，就使中国在与英国的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地位。一七八一至一七九三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品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一千六百八十七万元，只抵得上中国输入英国茶叶价钱的六分之一。到十九世纪，茶叶不仅是英国的必需品，而且又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利所在和英国政府的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九十三页。

大宗税源。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就不得不运许多白银来换中国的丝茶。在十九世纪初，广州一地流入的白银，每年约在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英国对华贸易的这种逆差情况，是与急于要求扩大市场的英国资本主义不相容的。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地位，在中国攫取更大的权益，处心积虑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七九三年，它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达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允许英国在北京派驻使节，设立商馆，减轻税则等一系列侵略性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国侵略者碰壁后，就以武力进行挑衅，并试探中国的防御力量。一八〇二年，英国兵船在广州外伶仃洋面窥探，图谋进犯。一八〇八年，英国兵船十三艘一度攻掠澳门，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到达北京，重提二十多年前的无理要求，再次被拒绝。

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惯于海盗行径的英国政府，为了扭转中英贸易的逆差，迅速打开中国市场，终于找到了一种既易泛滥又能获利的特殊商品——鸦片。当这种污秽的鸦片贸易受到抵制时，英国资产阶级就大吵大闹，狂热地鼓吹战争。一八三五年，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的老板们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备忘录说：“只要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处在这样受限制的不稳固的状态中，所望于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帝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就必然大受损害。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商业国家的利益而言，目标是太重要了。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

办法，来扫除妨碍达到目标的障碍的。”^①你不和我做买卖，不受我剥削，我就打你，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列宁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②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扩张与侵略，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

第二节 正义的禁烟运动

一、可耻的鸦片贸易

鸦片，又名罂粟或阿芙蓉，是麻醉毒品，产于印度、小亚西亚一带。清朝以前，鸦片已作为药材输入中国。十七、八世纪时，葡、荷商人将鸦片及吸食工具输入中国，清政府的官吏和地主阶级开始吸食鸦片。英国贩卖鸦片是后来居上。一七二七年，英国输华鸦片约二百箱。一七五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鸦片产地孟加拉，十年后输华鸦片就增加到一千箱。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一七九七年，东印度公司又垄断了制造鸦片的特权。一八三四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英国政府取消了对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对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开放了对华贸易。英国对华鸦片输入量猛增。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三八年，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鸦片输入量增加近十倍，

①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二期。

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四五页。

达到年输入量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烟象潮水般涌进了中国。

肮脏的鸦片贸易使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和鸦片贩子们获得暴利。首先是东印度公司，它把鸦片以超出成本九倍以上的垄断价格卖给鸦片贩子，获取高额暴利。如一八一三年，每箱成本二三七卢比的鸦片，出售价格达二四二八卢比。其次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作为它的财政收入，以一八二九年为例，鸦片税的收入达一百万镑，约占它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成为印度殖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鸦片贩子们，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鸦片是偷运进口的，不要纳税；中国烟贩购买鸦片的款项是预付的，不会有倒帐。贩卖鸦片，不仅利润大，而且靠得住。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这种罪恶的贸易，在经济上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在政治上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捞到了“爵士”的桂冠。如鸦片贩子马地臣，一八四一年从中国溜回英国，第二年就把苏格兰西海岸的整个路易斯岛买了下来。仅仅为了开垦这个岛，就投下了三十二万九千英镑！就是这个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肥的鸦片贩子，后来还得到了爵士头衔的封赏。

在可耻的鸦片贸易中，美国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美国来华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就打了贩卖鸦片的主意，回国后大肆鼓吹“有厚利可图”，此后来华的商船不断增多。他们还特制一种快速的配有枪炮的“飞剪船”，专作武装走私鸦片之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都是美国在华的大贩毒组织。据当时调查，在广州的美商，除一家外，都经营鸦片贸易。美国人丹涅特承认：在鸦片贸易的这一方面，美商“和其他贸易商所获得的

利益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的”^①。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美国资产阶级一直是英国侵略者的主要帮凶。沙俄在鸦片战争前也干着由中亚向中国新疆输进鸦片的罪恶勾当。

下表显示了鸦片战争前，历年鸦片输入激增的情况（单位千银元）：

1818年	4745
1825年	7608
1833年	12875

表中鸦片输入数字，包括美国、葡萄牙两国的鸦片，但大部分是英国的鸦片。

清政府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早在一七二九年就曾下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此后在一七九六年、一八〇九年、一八一三年多次严令禁止鸦片输入，一八二二年又下令禁止贩运吸食及私种鸦片。但是清政府的一系列禁烟法令，都无法阻止鸦片的输入，鸦片走私反而更加猖獗。为什么清政府的禁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主要是由于英、美侵略者的破坏和清政府的腐败。英、美资产阶级在它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禁烟，鸦片贩子一方面用武装走私的海盗行径把鸦片偷偷地运进中国，他们用趸船作为贩运站，并将鸦片趸船从黄埔撤到珠江口外伶仃岛附近的洋面。疯狂地进行走私；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贿赂收买清政府官吏，“**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②而贪污腐化的清政府官吏也正是利用

① 《美国人在东亚》第一〇四页。

②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六页。

了禁烟法令和非法的鸦片走私，从中牟取巨利，他们与英、美等国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为一箱箱鸦片走私进口发放了通行证。事实上，清朝皇帝也是鸦片贸易的受贿者，海关从鸦片得肥，皇帝又从海关分肥。朝廷每年向海关勒索大量的金银玩好，以供皇帝过奢侈生活。因此，清朝皇帝对待鸦片的态度是一只眼看鸦片的毒害，一只眼又看鸦片的利益。这就决定着清政府的禁烟是一纸空文，它只供官吏利用，向鸦片商索取更多的贿赂和放进更多的鸦片入口，使鸦片烟毒泛滥全国。

鸦片烟毒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首先是白银外流，造成中国财政困难，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一八四〇），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平均每年流出五百万元，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使得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造成了银价上涨，钱价低落。过去纹银和铜钱的比价是一两银子兑换铜钱一千文左右。一八三八年竟增加到一千六百多文。银贵钱贱，遭受损失最大的是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出售产品是以钱计算的，而缴纳各种捐税却要折合成银两。过去纳税银一两交铜钱一千文，而今却要交一千六百多文，无形中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其次，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据一八三五年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二百万以上，流行地区遍及十几省，鸦片几乎腐蚀了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为了支付日益增大的鸦片价款，必然加剧剥削，把鸦片烟的耗费转嫁给广大的劳动人民。

第三，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鸦片畅销，白银

外溢，造成中国民穷财匮，影响到正常商品贸易的销售。林则徐曾在苏州、武汉等商业发达的地区作过调查，说：“臣……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金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① 鸦片日益增多的输入，致使城乡工商业凋敝，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摧残。

二、正义的禁烟运动

广大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所造成的烟毒泛滥的严重后果，早已怒不可遏，坚决要求严禁鸦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鸦片问题愈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人民群众的禁烟要求，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吏中也有所反映。在清朝政府内部，随着鸦片大量输入引起社会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在鸦片问题上逐渐形成主张严禁和弛禁两派。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将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处以重刑。弛禁派则主张鸦片可以当作药材纳税进口，以货易货，不得用银元去购买，在国内只禁官兵吸鸦片，其他平民百姓都可以吸鸦片、种鸦片。弛禁派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使非法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使鸦片的祸害更加扩大加深。这种主张为外国烟贩以及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的中国官吏所欢迎。一八三六年弛禁派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公开买卖。这种荒谬的弛禁主张，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在清朝政府的官吏中，也有一些人纷纷上书道光帝驳斥许乃济，主张严禁鸦片。一八三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

^①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向道光帝上奏疏痛陈鸦片的祸害，指明过去禁烟有名无实是由于官吏的庇护，建议以重治吸食者和贩卖者来抵制鸦片输入。

从环绕着鸦片问题的争论中，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对其统治的威胁，逐步倾向严禁。特别是他看到林则徐的奏文中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使他更感到问题的严重。“兵”和“饷”是清政府维持其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现在鸦片已危及它的统治，所以道光帝此时不得不排除弛禁派的意见而表示决心禁烟。一八三八年下令将许乃济革职，召林则徐进京讨论禁烟措施。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担任过河工，漕运和盐政方面的工作，一八三二年任江苏巡抚，一八三七年任湖广总督。办事认真，具有爱国思想。禁烟问题发生争论时，他正在湖广总督任内，采取积极的禁烟措施，两湖禁烟颇见成效。一八三八年十二月，林则徐到北京。道光帝连续召见多次，最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人民群众是推动禁烟斗争的动力，也是禁烟运动的主力军。林则徐在两湖的禁烟，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才取得成效的。一八三八年，在湖北、广东等地数以千计的鸦片烟具被收缴，数以万两计的鸦片烟被查收，仅武汉一地就收缴烟土一万二千两，两湖地区收缴烟枪约四千三百杆。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广州清官吏准备在商馆前广场上

①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处决一个中国鸦片贩子，英、美鸦片贩子竟胆敢拆毁绞架，捣乱刑场，殴打执行绞刑的人员和在场群众。英、美侵略者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立即聚集了一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外国烟贩子以及他们的无耻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意志，推动着禁烟运动进入高潮。

在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林则徐于一八三九年三月到达广州，并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的赞同和协助，开展严厉的禁烟运动。一方面，整顿海防，制造枪炮，视察海口炮台，加强对士兵的训练，招募沿海渔民参加水勇。同时，下令逮捕烟贩和惩办勾结外国烟贩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布告外国烟贩必须把运入中国的鸦片全部缴出来，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暂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①表示了坚决禁止鸦片流毒的决心。

中国的禁烟，是完全正义的，是为了维护本国主权的行动。但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亲自出面破坏中国禁烟运动。他从澳门偷偷地溜进广州，阻止外国商人缴出鸦片，企图携带大鸦片贩颠地夜间逃遁。这样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就直接与中国的禁烟运动对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第一，下令停止中英贸易。第二，派兵严守洋馆，断绝趸船与洋馆的交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逮捕了颠地。伶仃洋面的趸船二十二艘（每艘存鸦片一千箱上

^①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二），第二四三页。

下），企图开船逃避，被林则徐派水师制止。这些措施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反动气焰。经过林则徐这番正义的斗争，义律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于是他变换手法，狡猾地表面上接受中国政府的法令，假令英国鸦片贩缴出鸦片，并向鸦片贩子保证缴出的鸦片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为了联合美国共同侵略中国，义律又向美国烟贩表示，美国烟贩缴出的鸦片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阴险地把中国政府打击不法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之间的问题，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

从一八三九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英、美鸦片贩子陆续交出鸦片二万多箱（其中美国烟贩一千五百四十箱），共重二百三十多万斤。从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在虎门海滩举行了震动中外的正义销烟。在林则徐主持下，中国军民“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①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无不拍手称快。当时到虎门观看销烟的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反复考察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②虎门销烟是中国正义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对英、美侵略者的当头棒喝，它一洗多少年来贪官污吏给中国所招致的奇耻大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铭刻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

① 《夷艘入寇记钞本》，《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一〇七页。

② 《中国丛报》卷八，第七十四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三十二页。

念碑上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六三”销烟的伟大场面，生动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继承光荣传统和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钢铁意志。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继续坚持禁烟政策，同时，开放中英正常贸易，命令进口各国船只出具“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①的甘结，表明了中国政府允许合法的国际贸易，反对鸦片烟毒的严正立场。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英国水手野蛮打死中国村民林维喜，林则徐严令义律交出杀人凶犯抵罪，义律无理拒绝，有意侵犯中国主权。林则徐下令停止供应在华英人的物资，义律竟发动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在这期间中英先后发生七次战斗，中国都取得了胜利。中国军队战胜了号称“船坚炮利”的英国侵略者。

第三节 英国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多年，英国鸦片贩子们就开始进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准备和情报搜集工作。一八二三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沿海做了一千多里的长途侦察旅行，公开鼓吹侵略。一八三一年八月，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英国间谍郭士力，最先潜入上海搜集情报，认为上海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

^① 《论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二），第二四三页。

商业城市”，定为侵略的主要目标之一。一八三二年初，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派遣间谍礼士，化名胡夏米，和郭士力乘坐间谍船，用六个多月的时间，有计划地详细地收集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山东等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鸦片贩子们根据多年侦察的结果，制订了一份详细的侵略计划，于一八三五年七月，由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献策。

一八三九年八月，林则徐责令外商缴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积极策划一场侵略战争。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商会，许多鸦片贩子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资本家纷纷向英政府上书，疯狂叫嚷决不能“轻易放过这样一个战争的机会”，无耻地说什么这个战争“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①九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的正式报告后，巴麦斯顿立即狂妄地表示，对待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从再作解释”^②。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此可见。十月，英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发动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巴麦斯顿发出训令，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的正副全权代表。指示：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占领舟山，再北上直趋白河与清政府谈判。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最后就扩大侵略战争。同一天，巴麦斯顿发出致中国政府照会一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割让沿海岛屿，偿还商款等无理要求，并声明英国侵略军此次军费，全部要由中国负担。

^① 《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二），第六六一页。

^②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三十八页。

还在上述给义律的训令中详细规定，开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侵略要求。

英国侵略者这样一个作战方案，几乎完全是根据鸦片贩子所提供的情报与建议制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愤怒地谴责这次肮脏的侵略战争，他深刻地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①四月，英政府拼凑成了一支包括军舰十六艘，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八艘，士兵四千人的侵略军，并任命懿律为这支侵略军的总司令。

鸦片战争从一八四〇年六月正式爆发，到一八四二年八月结束，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战争的全过程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坚决反抗斗争的路线，一条是清政府从被迫抵抗、动摇转到投降的卖国路线。

二、沿海军民英勇抗战和清政府被迫抵抗到妥协投降

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国侵略军的舰队陆续开抵广东海面，六月底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这时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他对英国武力入侵抱坚决抵抗的态度。他认真备战。防守严密，在虎门一带海面，安设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又整顿水陆官兵，号令严明，声势壮盛。并每天派人侦察敌情，收集西人书报，了解到侵略者极其藐视清朝水师，而畏惧沿海渔民但户。于是招募渔民、但户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当英国侵略军发动进攻时，林则徐又发布《英夷鸱张安民告示》，提出“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当外国侵略者向中国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华民族和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八页。

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大敌当前，林则徐敢于和侵略者针锋相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力，站在民族自卫的立场上，坚决抵抗，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毕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反侵略这一点上，虽和人民有一致的地方，可是他和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他在招募佃户、渔民组织水勇时，提出要“妥为管束，以杜日后为非”，又反映出他害怕人民、敌视人民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这就说明林则徐虽然是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代表，也不可能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来反抗侵略。

这时，广东沿海广大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纷纷起来投入抗英斗争，表现出誓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精神。他们参加水勇、团练、乡勇等组织，配合军队作战，还三、五成群自动地持刀杀敌。当地各阶层群众经常向军队报告英船的行动，还“假装济夷办艇，作为内应，配合各队水勇火船，出其不意，纵火焚烧夷船。”^①英船被火攻后，每日东飘西泊，胆战心惊，惟恐再受严惩。在广东人民和军队的合力抗击下，英国侵略军只能困守海上，不敢轻易驶进内河。英国侵略者企图侵占广东的计划被粉碎了。

英国侵略军见广东无隙可乘，便按照训令指示，大部分军舰北上。至福建时侵犯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退。侵略军又北上攻浙江，七月五日定海失陷。八月十一日进犯天津海口，企图用深入清统治的心脏地区，来胁迫清政府屈服。

当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民族战争

^① 林则徐：《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二），第二一二页。

的时候，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抵抗侵略的巨浪冲击之下，清政府内部分化为抵抗派和投降派。以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禁烟、要求抵御外侮的官吏构成抵抗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和两江总督伊里布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原来就反对禁烟，或者害怕对外战争会动摇其统治的官吏构成投降派。投降派在禁烟运动进入高潮和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时，暂时保持沉默，暗中伺机活动。等到外国侵略军步步进逼时，他们就公开跳出来打击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以达到其卖国投降的目的。在鸦片战争的全过程中，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定海失守和英舰进逼天津海口，他们就公开出面向道光帝大进谗言，说什么“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还诬蔑林则徐接受英国国王文书，私行销毁，图谋不轨。清政府被迫下令禁烟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现在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海口，对它的威胁比鸦片的泛滥更加迫在眉睫，同时它对抵抗派官僚有所疑惧，因此很快就发生了动摇。清廷派琦善为代表前往天津海口和英国侵略者谈判，只要英舰退出天津海口，什么条件都可以商议，同时下令痛斥林则徐。一时，投降派的气焰又甚嚣尘上。

琦善在与英国侵略者谈判时，首先，他把一切责任推给林则徐，无耻地向侵略者赔礼道歉，还要拿林则徐等“治罪”，为侵略者出气。其次，要求英国军舰退出天津海口，至于退兵的条件到广州再商量，保证满足他们的要求。英国侵略者得到琦善的保证，答应退兵。琦善回京向清廷谎报说：英国人“情词恭顺”，“似有愧悔之心”。清廷看他“善于”办理外交，派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和英国侵略者谈判，同时，

以“办理不善”的罪名，下令把林则徐等革职查办，开放烟禁，宣告禁烟结束。这说明了清政府从被迫抵抗开始转向屈膝投降。

一八四〇年十一月，琦善到达广州。他到广州办外交的方针是：“一切力反前任（林则徐）所为，谓可得外洋倾心。”^①他为了讨好洋人，首先，替英国侵略者“代伸冤抑”，查拿林则徐。其次，在军事上撤防，撤除所有炮台，裁减师船三分之二，遣散全部招募来的水勇壮丁，削弱了海防力量，为英国侵略军敞开大门。第三，在政治上独断独行，自称专办夷务，省城文武官吏都不得与他会面和参与意见。他把反抗侵略的人民诬为“汉奸”，即使有人要报告侵略军的活动情况，他也拒绝，反而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②琦善的种种倒行逆施，更加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凶焰。在谈判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均一一俯首允诺，只有对割让香港一事，表示不敢作主，但答应向道光帝代为请求。英国侵略者马上以武力相威胁，一八四一年一月，英军在谈判中，突然进攻沙角、大角炮台，守将无援战死。侵略军进逼虎门，关天培率守军奋力抵抗，并派人入广州城求援。琦善置之不理，连夜派人赴穿鼻洋向义律求和，并与英国订立《穿鼻草约》。但清政府未予承认，英国于一月二十日却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的成立。条约内容是：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恢复广州贸易等。六天后，英国侵略军正式占领香港。《穿鼻草约》签订后，琦善故意向

① 《夷艘入寇记钞本》，《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一一四页。

② 同上。

清廷奏报防御的困难，说什么：“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总之“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①只有同侵略者订立和约才可保平安无事，至于他私自答应割去的香港，却说成是广东外洋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岛，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推卸自己的卖国责任。

在浙江方面，两江总督伊里布也和琦善一样，是个一味主张妥协投降的民族败类。十一月六日，他和懿律达成停战协定，使英国侵略者可以从浙江方面抽出兵力，加强在广州的侵略力量。

至此，战争以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的妥协而暂告沉寂。

琦善、伊里布对英国侵略者卑屈求和的丑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愤慨，群众反对妥协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浙江镇海曾爆发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请愿活动，反对伊里布与英军停战后撤退镇海的防兵。当英国侵略军宣布根据《穿鼻草约》占领香港的消息传到广州时，舆论譁然，群众一致要求当局驱逐英国侵略军。一八四一年一月底，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感到“天朝尊严”受到很大的打击，于是发布对英国的讨伐令，派他的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调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赴广东协同琦善作战。道光帝出兵，主要目的不过是要对英国“示以声威”，以取消英国侵略者所提某些条款，挽回“天朝”的体面，并非真心抵抗侵略。

奕山还未到达广州之前，义律就接到清政府增兵广东的消息，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在二月二十六日，突然进攻虎

^① 《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九十一—九十一页。

门炮台。提督关天培率兵死战。他身受重伤，仍坚守炮台，亲自点放大炮。而在广州城里的琦善却隔岸观火，不发援兵，使关天培孤军奋战，最后弹尽力竭，与将士数百人一同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陷。琦善又将二沙尾要隘守军撤走，使广州门户洞开。三月，英国侵略军逼近广州城郊。

四月，奕山到广州。他来广州的任务是组织抗英斗争，但却与人民为敌。认为：“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他把抗英斗争的人民诬蔑为“汉奸”。因此，他的方针就是“防民甚于防寇”，奕山对于人民的恐惧和仇恨，深刻地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腐朽。在这个反动的方针指导下，他既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不作反侵略的战斗准备，只要求速战，把希望寄托在速战中能侥幸取胜。五月，奕山派兵仓卒出击英船，获得小胜。第二天，敌人反扑，奕山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城外重点炮台，均被侵略军占领。清军退入广州城。奕山的速胜变为速败。二十七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秘密签订《广州和约》，内容是：（一）奕山率清军撤出广州城六十里外。（二）于一星期内交付赎城费六百万元。自五月二十七日算起，日落前交付一百万元。（三）英军暂驻原地，双方不得增加军备。如赎城费未能于七天内全部付清，即增至七百万元，如未能于十四天内全部付清，即增至八百万元，如未能于二十天内全部付清，即增至九百万元。全部付清后，英军撤出虎门。（四）赔偿英商馆损失三十万元。《广州和约》既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也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大海盗面目，又为英国侵略军缓冲待援以便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明明是战败投降，奕山给朝廷的奏折却说：“焚击痛剿，

大挫其锋”。“义律穷蹙乞抚，只求照前通商”。^①腐朽的清政府居然下令“准令通商”，并把林则徐、邓廷桢发往新疆伊犁充军。

三、英国扩大侵略战争和清政府卑屈投降

外国侵略者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当英国内阁接到义律订立《穿鼻草约》的报告时，认为得到的侵略利益太少，没有打开中国的大门，不予批准。英国政府为了满足本国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决定派璞鼎查来中国代替义律，进一步扩大战争。

八月二十五日，英侵略军三千五百人，大举向闽浙侵犯，首先进攻厦门，次日厦门失陷。遭到厦门人民反抗，不久，英军退出厦门北上。

九月，英国侵略军分扰台湾与浙江，侵入台湾鸡笼（基隆）港口，守军和当地“义首壮勇”英勇作战，毙英军三十二人，俘一百三十三人，击退了敌人的进犯。英军又多次图谋侵占台湾，都被台湾人民所粉碎。

九月二十六日，英军再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军顽强抵抗，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十月一日，定海再度沦陷。英军续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守县城，坚决表示：“城存其存，断不肯以退守为辞，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英人片纸。”^②提督余步云率兵四千守招宝山要塞，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家伙，竟然高悬白旗，不战而逃，镇海守兵遂溃，裕谦力战不支，投河死。十

^① 夏燮：《中西纪事》。

^② 《裕谦传》，《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三〇一页

月十日，镇海失陷。三天后，英军又侵占宁波，公然委派大烟贩查顿的帮凶、间谍郭士力为县令。英国海盗们仅从宁波府库中就抢走了十二万元左右的银元和纹银，又抢去大量的丝绸和粮食，浙江省这个最富庶的商业中心被洗劫一空。野蛮的强盗们还四出掳掠，无恶不作。

浙江连失三城，道光帝大为恐慌。十月十八日，他特授另一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征调各省军队驰赴浙江收复失地。奕经和奕山一样，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最愚顽腐朽的典型代表。出京后，一路沉醉于酒色歌舞，游山玩水，毫不作战守准备。宿迁人臧纡青曾向奕经建议：“宜多用土勇、水勇。……及沿海渔盐枭贩，……惟用散攻，不动大队……陆路伺敌出入，水路各乘风潮，逢敌即杀，遇船即烧，人自为战，使彼出没难防，而后以大兵蹙之。”^①奕经同奕山一样惧怕人民，怎么能实行这个需要人民支持的作战方案呢？一八四二年一月，奕经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他们就在“吉祥”的梦兆下进驻绍兴，“饮绍酒大乐，日在醉乡”，一心一意坐待梦中所示的胜利从天上掉下来。三月八日，清军分兵三路，夜间冒雨向宁波、镇海、定海出击，希冀同时克复三城。结果这支腐朽军队，一触即溃。奕经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主张妥协，不敢再战。在一片混乱、盲动和错误的指挥下，结束了浙江的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逆不靖，威不扬”，走的是轻举妄动，一打就垮，丧胆乞降的一条老路。而导致浙江战争一败涂地的原因，根本在于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尖锐的

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对立。

清政府在接到奕经浙东惨败的消息后，吓慌了手脚，清朝统治集团更怕战争拖延日久，人民会燃起更大的抗敌烈火，竟无耻地决定向侵略者屈膝投降。道光帝下令：“不许进兵，并不许擒斩零夷，有兵勇杀一黑白夷，即行正法，并治官弁之罪”^①，同时派盛京将军耆英带同因妥协被撤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向英国侵略者议和。

然而，璞鼎查从传教士的谍报中得知，长江下游一带清军兵力空虚。他还知道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南京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是江南大量漕米和税银北运的枢纽。如果攻占南京，就等于卡住清政府的咽喉。因此，英国侵略者拒绝议和，决定入侵长江，直趋南京，以胁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全部侵略要求。

一八四二年五月初，英国侵略军攻陷乍浦。六月中旬，进犯长江口吴淞炮台。吴淞守将是江南提督陈化成。年近七旬的陈化成是抵抗派的一员老将。他备战认真，率领守军奋起抗敌，击毁敌舰三艘，英海军少校霍维特被击毙。驻军宝山的两江总督牛鉴，如多数清朝大员一样贪婪无能，听说陈化成击伤了英舰，率军增援东炮台，想以此揽功。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居然还摆列总督仪仗，招摇过路，被敌人发炮轰击，吓得弃轿逃跑，全军溃败。侵略军趁机从东炮台登陆，水陆夹攻西炮台。陈化成腹背受敌，孤军奋战，受伤多处，仍坚持战斗。最后，他和全体士兵壮烈牺牲。吴淞失守，长江门户洞开，上海、宝山相继陷入敌手。

^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侵略军占领上海共六天。这批强盗除勒索赎城费五十万银元外，又大肆抢劫。他们在城隍庙的庭园内，将屋内许多精致的饰物拆下烧掉，还抢劫典当的仓库和民宅，在初夏季节里，每个人穿上“镶着高贵皮毛的绸子和缎子的外衣，手里拿着绣花的扇子”，酗酒作乐，干尽了坏事和丑事。这就是帝国主义强盗在东方表演的“西方文明”！

七月中旬，侵略军进攻镇江城。镇江城形势险固，中国军队一千五百余人在守城将领海龄率领下，固守城内。侵略者用炸药轰开城门，并用云梯攀登城墙，冲进城内。城内守军英勇抵抗，与英军展开极为激烈的巷战。一个侵略军军官记述说：“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① 镇江守军的英勇抗战，给英国侵略者以一次沉重的打击。英军入城后，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施行报复。英军在镇江的暴行，又一次暴露了侵略者的凶残本性。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一方面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战斗精神，另一方面痛责英国侵略军的暴行，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这些战斗中，英军损失了 185 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②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五），第三〇五页。

②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镇江陷落后，英军于八月间抵达南京江面。投降派头子穆彰阿公开发言了，他说：“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①依据这个卖国理论，清政府接受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②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坚持可耻的鸦片贸易，发动侵略我国的战争，因此，英国是非正义的。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是进步的，正义的。

外国侵略者及其辩护士们，为了掩盖鸦片战争的侵略实质，别有用心地把它歪曲为一场是非不分的所谓“通商战争”，叫嚷什么：“从英国的观点来看，战争主要是为英国的臣民取得公平的待遇，及在对于外人更加公平的条件下开放中国贸易。”^③他们咀里的“公平待遇”，就是要在我国横行霸道，他们喧嚷的“开放贸易”，就是要对我国肆意掠夺。而中国的买办文人，如蒋廷黻之流，也跟在他们的洋主子后面，鹦鹉学舌，胡说什么：“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

① 夏燮：《中国纪事》卷八。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三页。

③ 赫德烈：《中国的发展》第一四三——一四五页。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三九三页。

守。”^①明明是英国海盗远涉重洋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怎么能说“两方面都有理由”呢？这是一种典型的“侵略有理”论。就连一些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抢掠、杀戮和武力的经常使用，这些就是欧洲对于中国的商业接触的开始时期的特色。欧洲人是配得上洋鬼子这个称号时才被加上这个不愉快的称号的。在中国人的眼中，一切西方的野蛮人所企望的目的就是战争和抢掠。”^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鸦片战争的侵略实质。

四、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当清朝军队在抵抗派官员主持下对英国侵略者进行抵抗的时候，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配合军队作战。当统治阶级转向屈辱投降时，人民则自动地组织起来继续坚持着英勇的反侵略斗争。

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首先在广东爆发。英国的侵略暴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给广东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因此，广东人民恨透了这些侵略强盗和认贼作父的卖国贼，反英反清的斗争特别猛烈。早在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和武装反击侵略军的时候，广东人民就纷纷参加水勇和组织义勇团练，与军队配合作战。奕山到广州后，阻止和反对人民参加反抗侵略的斗争，最终还向英国侵略者屈膝求和。于是，广大群众就自发地组织起来，继续坚持反侵略斗争。英国侵略军占领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版，第十四——十五页。

② 引见《学习杂志》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四方炮台后，四出骚扰，大肆淫掠。广州城郊义勇丁壮自动组织起来参战。义勇领袖陈棠等曾经夜袭英船，并协助军队作战，杀死英侵略军军官一人。新安县的义勇壮丁也在穿鼻洋面，袭击英船。奕山投降的第二天，广州义勇几百人，乘敌不备，攻克龟岗炮台，全歼守敌。广州人民机智地用各种突击方式来对付蹂躏祖国国土的外国侵略者，一个英国侵略军头目懊丧地说：“我方人员曾经几次被人袭击，这些人显然是在田间作工的农民，一到他们以为有机可乘，可以攻打一个孤立者时，是会拿起一支火绳枪而试图射击他的。”^①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岂止是“攻打一个孤立者”，而是同仇敌忾，遍地燃起了烧死侵略者的火海。

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推向高潮。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人民自动地组织起来，汇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英大军。这支队伍是以菜农韦绍光领导的广大农民为主，包括以陈棠为首的千余丝织工人，以邓潜为首的打石工人，以及秘密会党，还有一些乡镇的爱国士绅。

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一队侵略军在三元里一带肆行抢劫淫掠，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自动起来反击敌人，当场打死侵略军七、八人，漏网的一些兽兵，狼狈逃去。

三元里人民预料到敌人一定会疯狂报复，决心团结起来与敌人血战到底。满怀着对英国侵略军深仇大恨的三元里人民，在韦绍光的带领下，到村北北帝庙集会，声讨英国侵略军的暴行，商议反抗侵略的斗争步骤，他们从庙里捧出三星

^① 奕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五），第二一八页。

旗，对旗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①并派人联络附近各乡农民一起参加反英斗争。当天下午，各乡代表都到牛栏冈集会，讨论了打败英国侵略军的作战部署。最后决定：（一）各乡自成一个单位，各备大旗一面，自举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每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②；（三）各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一律出动；（四）和敌人作战，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包围战术；（五）以牛栏冈为决战地点。散会后，一百零三乡的代表，各回本村，连夜动员，准备来日痛歼敌人，整个广州城北各乡都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十日，三元里人民根据预定的计划，集合了几千人的队伍，向英国侵略军盘据的营地——四方炮台推进。这时英国侵略军正在吃早饭，突然听到鼓声如雷，吼声震天，只见中国人民手执大刀长矛，摇动五颜六色的旗帜，漫山遍野地冲上前来，敌人头目卧乌古慌忙下令吹号集合。敌人除留一部分军队守炮台以外，其余二千多个洋鬼子携带枪炮，仓皇应战。洋鬼子的洋枪洋炮只能吓唬奴颜媚骨的清政府，却难不到顶天立地的中华好儿女。群众见英国侵略军蜂拥而出，毫无惧色，并以极快的速度向三元里方向撤退，诱敌深入。当敌人被引到牛栏冈时，突然一声锣响，冈上七、八千群众，挥动大刀、锄头、铁锹，挺起木棍、长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下冈来。个个龙腾虎跃，人人奋勇杀敌，和英国侵略军展开了白刃战。这时各乡农民群众，听到锣声，也从

① 《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第三—四页。

② 林福祥：《平海心筹》，《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六〇〇页。

四面八方向牛栏冈方向冲来，把敌人团团包围起来。义勇颜浩长勇敢善战，冲锋在前，他见英军官毕霞在寻路逃命，冲上去一刀砍死了这个侵略强盗。当天下午，雷雨交加，英国侵略军的“火药尽湿，枪无所施，且水满、泥深、路歧，奔踏稻畦中，或窜伏豆篱瓜圃，多为义勇所杀”，“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乞命之声震山谷”。^①敌人洋相百出，狼狈万状，而三元里群众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越战越勇，连妇女儿童也上阵杀敌，真是“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②，充分显示了人民抗战的无比威力。当天一共歼敌二百多名，其中还有二名上校军官。这一仗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威风扫地。

三十一日，天刚蒙蒙亮，各地农民已纷纷出动，有的是花县来的，有的是从鸦湖、石井来的。他们打着旗号，潮水般地向四方炮台杀去，只见旗帜似海，刀矛如林，约十万群众把四方炮台围了个水泄不通。面临灭顶之灾的英国侵略者慌忙派人去广州向清政府求救，卖国贼奕山马上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去为敌人解围。余保纯一到，群众就把他包围起来，这时“汉奸、卖国贼”的怒斥声响成一片。余见势不妙，便要地主士绅解散群众，并对他们虚声恫吓：“将来万一有事，要你们负责。”这些地主士绅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激于一时义愤，参加了抗英斗争。当群众起来了，他们又害怕了，动摇了。经余保纯这一吓，有的溜了，有的成了余保纯欺骗、驱散群众的帮手。在群众的一片怒骂声中，余保纯护着他的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四三页。

② 张维屏：《松心十录》，《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七一六页。

洋大人夹着尾巴逃跑了。

英国侵略军在广州人民铁拳的打击下，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在广州多作停留，第二天即悄悄地退出虎门。义律为了掩饰侵略军的惨败，在撤退时还厚颜无耻地出告示要中国人民“后毋再犯”。广东人民非常愤慨，即日发出了告示，义正词严地历数了英国侵略者“用鸦片烟害我百姓，骗我银钱”，“杀我百姓”，“害我乡村，伤我男妇”的滔天罪行。指出敌人的凶焰完全是那些汉奸卖国贼开门揖盗的结果。满怀信心地向英国侵略者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尔若不早退出虎门，我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并庄严宣告：“今尔如此可恶，我们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尔等！”^①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声讨外国侵略者的第一篇檄文，激扬文字，气壮山河，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阶级仇民族恨和坚决反抗侵略的英勇气概。

三元里人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反压迫反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打了第一个人民战争的漂亮仗，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鼓舞了全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意志，使人民知道“官兵不足恃”，“鬼子不足怕”，侵略者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推动

① 《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一二一一—五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二页。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车轮前进的，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五、闽、浙和沿江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英军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十室九空。但是，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福建、浙江和长江沿岸各地人民和广东人民一样，在这次反侵略斗争中，不畏强暴，表现了勇敢的战斗精神。

一八四一年八月，英军攻占厦门，四出抢劫，有乡民陈氏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抵抗。“夷众五千，我兵五百。夷用车炮，民用抬枪。一以击十，夷兵死者以百计，伤者以千计。陈氏之死者三人，伤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驻厦门而退屯鼓浪屿”。^①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时，昏庸腐朽的奕经等贵族官僚，一遭失败便仓皇败退，而浙东人民却自发地拿起武器，向敌人进攻。宁波的“黑水党”在徐保、张小火、钱大才等领导下，机智勇敢，神出鬼没，经常出击英国侵略军。宁波陷落后，徐保和他的同伴，“分伏郡城，并于江中置八桨小艇，伺英人出，狙击之……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英人大恐，遂弃宁波，越二日并弃镇海。”^②明明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赶走了侵略军，而厚颜无耻的奕经却贪天之功为己有，向朝廷谎奏克复宁波、镇海。浙东人民奋勇御敌，保卫国土，使英国侵略者在浙江处处受到打击，“在岸既恐诛擒，在船又防烧毁，畏首畏尾，昼夜不安”，十分狼狈。

^① 谢兰生：《思忠录》，引自《中西纪事》卷七。

^② 董沛：《明州系年录》，《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六四六页。

英军进占吴淞、宝山、上海后，当地人民以竹竿、锄头狙击敌人。侵略军还企图沿苏州河进犯苏州，英船三只在松江强迫渔民王在坤引航，王在坤勇敢机智地把侵略者诱入河水浅处，侵略军虽中途换乘小的平底船冒险闯入，最后仍在泖湖搁浅，迫使侵略者放弃进犯苏州的计划。英舰“康威号”在长江口杀人放火，抢掠牛羊，也遭到崇明人民的英勇抗击。^①

英舰至靖江时，“征索牛米，一童子立城上，忿掷石击毙一白夷，贼遂飞炮攻城，乡民竞执耒锄迎敌，江口沙滑，贼屡跌，辄击毙之，凡三十余人，明日由小路潜进，土人于道傍积石罅中施枪，妇竖悉拾石奋击。”^②为了迎击野蛮的侵略者，人民协同当地官兵，积极组织力量，修理抬枪，掘出埋在土里的大炮（英军侵入长江后牛鉴下令撤去的沿江大炮），削竹为兵，固守堤岸，准备痛击敢于来犯之敌。第二天，英船三只从对江驶来，全城人民奋起抗击，用抬枪杀敌兵十余，击中敌船火药舱，一船烧毁，两船逃走，迫使侵略军不敢再犯靖江。靖江人民团结御侮，以一小城，重挫敌军，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镇江失陷前后，沿江人民不断采取夜间顺风施放火筏、火船的办法，袭击敌人。这种夜袭的抗敌方法，给侵略者以无休止的困扰。一个侵略军军官在回忆录中供认，占领江后，他们随时遭到袭击，必须时刻惊醒，根本得不到什么休息，哀叹这是“最伤脑筋的事”。

① 参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三五八——三五九页。

② 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三，第一〇一页。

大江南北人民自发的抗英运动的发展，极为普遍和迅速。在一八四二年六月到八月短短的时间内，随着英国侵略军的深入，长江南北人民武装发展到十余万人以上，可见当时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的高涨。

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也说明了中国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一开始侵入中国时，就与封建统治者走着根本不同的道路。反动统治阶级走的是从被迫抗战到屈辱投降的道路，而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抵抗的道路。

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和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的代表耆英、伊里布，在英国侵略军的炮口威胁下，与英国侵略者的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英国兵船“康华利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又于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和十月八日，先后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开放通商口岸：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口岸为商埠。还规定五口均驻兵舰一艘。从此，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被侵略者强行打开了。资本

主义的商品就顺着这些缺口倾泻进来，逐渐破坏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在《虎门条约》中还规定外国人在这些通商口岸有租地造屋，永久居住的权利，大大便利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

(二)强占中国领土香港：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霸占一个岛屿作为侵略中国的立脚点，在一八四一年战争尚在进行中，英国侵略者就派兵强占香港。《南京条约》又把这种强占规定下来。香港在此后一百多年中就成为帝国主义策划和扩大侵略中国的基地。

(三)勒索巨款：赔偿英国军费、鸦片烟价、商欠共二千一百万元(奕山给英国侵略军的六百万“赎城费”不包括在内)。这笔款项，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四)协定关税：规定“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将极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定为值百抽五。从此，中国开始丧失海关的主权，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近百年来，帝国主义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吸吮了中国人民大量的血汗。

(五)领事裁判权：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英国领事自行审判。这就破坏了中国司法行政权，从政治上保护了英国鸦片烟贩和其他罪犯，这些凶犯就可以更加横行无忌，胡作非为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利用这一特权，横行霸道，干尽了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

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条约中都有同样的规定。从此，其他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取的任何侵略权利，英国即可同样享受；而英国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取得新的权益，也就等于为其他侵略者掠得了新的权益。因此，各国侵略者就无形中结成为侵略中国的伙伴。

鸦片问题在《南京条约》中只字未提，实际上就是允许大量走私输入。在《虎门条约》签订前，璞鼎查派马礼逊要求鸦片开禁，交出照会一件，理由是以前中国禁烟，中英商人在海上照常贸易，结果“名禁实不禁”，因此不如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这样，中国税收必能增加。清政府官吏虽然不敢答应载入约中，但他们早向侵略者保证：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在英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这一谅解下，此后鸦片走私较战前更加猖獗。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从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始勾结起来，加紧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同内外敌人展开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二、《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美国和英国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就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把鸦片源源偷运到中国来，毒害中国人民。美国在对华鸦片贸易中的地位仅次于英国。它的侵略目的也和英国一样，极力想打开中国大门，剥削、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而其手段之狡猾，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美国是英国侵略者的主要帮凶。美国政府一方面竭力怂恿英国对华的侵略战争，从舆论上支持鼓励英国侵略者；另一方面，鸦片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派海军统领率舰队来中国作为英国侵华军的后援。当《南京条约》一签订，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派顾盛为代表，来中国趁火打劫，要求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一个“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①的不平等条约。他威胁清政府说：“如果不答应，那么，本国（美）政府或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②在美国强盗的威胁下，腐败的清政府派耆英为代表，于一八四四年七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和美国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共三十四款。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侵略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除强占香港和赔款以外的一切特权，还攫取了中英条约上没有、或虽有但尚未明确规定的特权。它比中英条约更苛毒的有：

（一）扩大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它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二）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它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就是说，中国要变更税率，必须由美国领事批准。

（三）严重破坏中国的领海权：它规定美船可以自由进出五口，“中国无从统辖”，并允许美兵船以“巡查贸易”为名进出中国港口，甚至规定中国各港口官员要负责接待。

（四）攫取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特权：规定美国得在五个通商口岸自行设立医院、教堂，成为后来法国强迫清政府取消天主教禁令的先声。从此，“上帝”派来的魔鬼，披着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一。

② 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第四十一页。

宗教外衣的侵略者，纷纷来华，从精神上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①

（五）条约还规定十二年后修订条约的条款：这就是说，过十二年后，美国侵略者还可以要求中国与它订立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也为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日后进一步侵略中国准备了借口。

《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比《南京条约》更深一层地剥夺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大大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扩张侵略势力。所以，后来顾盛觉得得意忘形地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②以后百多年，美帝国主义不断地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美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九年蒋家王朝灭亡的前夕，发表一份《白皮书》，正是从《望厦条约》开始写的。在这部反革命的《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把美帝侵华史说成是对华亲善友好史。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

① 《“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九五页。

② 詹逊，《美国外交史》第四八八页。

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①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论断，深刻地揭露了鸦片战争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阴险狡诈。

紧跟在美国之后，法国也趁火打劫，向中国进行讹诈。《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政府认为乘机渔利的时机已到，派遣刺萼尼为专使，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四年十月订立《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即《黄埔条约》。

《黄埔条约》共三十六款。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法国除了取得和英、美同样的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外，还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外国传教士在各个通商口岸传教和建造教堂及坟地。并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就是要清政府镇压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法国侵略者在传教方面所攫取的特权，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起了极恶劣的作用。从此，外国传教士就披上这一条款作为护身符和商品、鸦片一起蜂拥侵入中国，充当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在美、法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前后，帝俄、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争相援例要求各种特权。腐朽的清政府，本着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概答允，与他们先后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大门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① 《“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九四——一三九五页。

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奴役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起点。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主席明确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①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兵舰自由进出中国港口权和传教等一系列的特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中国开始沦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

资本主义列强还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沿海的重要口岸，并在这些口岸强行划出一部分中国领土作为他们直接统治的“租界”。英国侵略者首先有意歪曲不平等条约中关于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迫令清政府在上海划设“租界”。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英驻沪领事巴富尔与苏、松、太道宫慕久议定《上海地皮章程》二十三条，把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黄浦江以西的地区划为英国“租界”，占地约八三〇亩。一八四八年扩展到西至西藏路、北至苏州河，面积扩大为二八二〇亩。一八四八年，美国侵略者强占了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地方为美“租界”，后来又和英国的“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一八四九年，法国也夺取了上海县城以北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方作为“租界”。其地址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

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上海变成了“十里洋场”。后来随着侵略势力的深入侵略者不仅把上海的“租界”逐步扩大，而且逐步推行到其他通商口岸去。外国侵略者又利用各种机会攫取了“租界”中的行政、司法和警察等权力，建立统治机构，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成为一种变相的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吸吮中国人民血汗和从事各种侵略活动的重要据点。“租界”的划定，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记。

《南京条约》规定的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除广州是旧有通商口岸外，其余四口在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相继开放。外国人陆续在那里开设商行，经营贸易，扩大侵略势力。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毛主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

随着五口的开放，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自上海开埠后，洋布大量倾销，使“甲于松太”久负盛名的上海土布受到惨重的打击。到了一八四六年，号称棉布“为天下甲”的松江、太仓地区，已“无纱可纺”，布市“削减大半”。广州、厦门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与此同时，广东佛山的冶铁业，东南沿海的沙船运输业等也都有所破坏。当时中国的手工业，特别是手工纺织业，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

是农村中主要的家庭副业，它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遭受破坏，说明了中国原来的封建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在外国资本主义破坏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经济的同时，城乡商品经济有了发展。浙江湖州出产的生丝大量出口，附近各地都纷纷养蚕缫丝，产量激增。湖南、福建、浙江的植茶业都有所发展，上海且有茶商在茶栈内附设茶厂，专门加工制造适合外国人需要的茶叶。丝茶出口量的大增，意味着外国资本对中国掠夺和剥削的加深。这时的中国丝茶出口贸易，几乎全部为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所操纵，他们控制市场，压低价格，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七年十一年间，茶叶收购价格下跌一半以上。中国丝、茶业开始走上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开始变化，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五口通商地区开辟码头、投资兴办企业、扩大航运、修筑船坞，所以就在这些企业中出现了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中国工人。如英国曾在广东招雇华工到沿广州、香港、澳门航行的英国轮船上充当船员和水手。战后外船来华数字有了显著增加，如一八三三年外国商船在广州进口的有一八九艘，一八四五年即增至三〇二艘。这些船只需要经常修理，同时，侵略者为要扩大输出输入并攫取中国的航运权，船舶不断增多，因此便在口岸附近开始设立外国资本经营的船舶修造业，其中最早的是一八四五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设立的柯拜船坞。此外，英国资本于一八

四三年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一八五〇年于上海开办了字林报馆，美国资本也在一八四五年于宁波开办了美华书馆等印刷业。这些企业规模虽然不太大，但它是鸦片战争前所没有的。这些企业中雇佣了一部分中国工人，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毛主席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由于五口开放，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从此解体，公行制度也就不能继续下去。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倾销他们的商品，掠夺原料和土特产品，为了走私鸦片，他们在各通商口岸，开始直接培植了一批依附于他们的走狗——买办商人，当时称为“通事”。他们中有些就是原来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商人，有些则是原来的鸦片走私贩子。这些人口操外语，充当中外贸易的中介人。他们有的直接受雇于外国商行，有的开设行栈，为外国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货物。他们是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服务并受侵略者豢养的一批洋奴。他们靠着外国的经济侵略而大发横财。近代买办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人数还不太多，处于它的初生时期，但却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吴健彰、杨坊、吴煦等就是他们在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买办商人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产物。在经济上，他们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经纪人；在政治上，他们成为清统治者勾结外国资本主义的媒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〇页。

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的封建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它的经济基础，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下日益解体，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矛盾，而且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最主要的矛盾；落在中国人民肩上的已经不单是反封建的任务，而是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中国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

第五节 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和地主 阶级改革派的革新思想

一、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穷凶极恶的剥削奴役和压迫，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坚定了抵抗侵略的决心。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等地继续展开。广州的反侵略斗争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三页。

自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广州城乡人民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就纷纷以“社学”形式，组织武装力量，来抵抗侵略者。最先是利用三元里一带的升平社学，后来，广州城内及附近各乡的社学，也相继出现。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店店员等，一些爱国士绅也参加在内。群众零星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经过社学这一组织，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参加社学的义勇以及各乡团练，最多时达数十万人。

社学多次领导了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反抗英国侵略军入城的斗争。

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一向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南京条约》中规定广州开为商埠，但没有规定允许英国侵略军开进广州城。英国侵略者硬是要进广州城，表示他们所提出的任何侵略要求，中国都必须俯首听命。这个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在对待英国侵略军进城的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与人民完全相反。一八四三年七月，英国侵略者第一次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两广总督耆英随即答应。这一消息给群众知道后，群起反对，耆英却把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诬蔑为“无赖流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①。因此，广州人民贴出揭帖，揭露清政府官吏的卖国罪行，其中写道：“外国强盗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而肉食的官员，实为之帮凶”，“官敬视洋鬼如神，而轻视百姓如犬豕”，“他们只求保持禄位，不顾眼前事实，不加郑重处理”。在强大的人民反抗怒

^① 《耆英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六。

潮中，卖国贼耆英感到众怒难犯，赶紧通知英国侵略者“忍耐后图”，暂且不要进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粉碎了英国侵略者进城的狂妄计划。

一八四六年一月，英国侵略军再次企图进入广州城。耆英在英国公使德庇时的威迫下，张贴准许英人入城的告示，派广州知府刘浚与英国侵略者秘密商订进城日期。群众十分愤怒，当夜就撕毁告示，同时张贴了许多揭帖，警告官员如果允许英人入城，“义民将攫官而杀之”。群众约定“夷人入城之日，闭门起事”。并聚众数千人攻入知府衙门，烧毁知府刘浚的朝珠公服。刘浚从后院跳墙逃走。耆英见群情愤怒，被迫将刘浚撤职，暂时不答应英人入城的要求。

一八四七年，英国侵略者第三次要求进城。四月三日，英国侵略军千余人乘军舰闯入虎门，沿途炮台，毫无抵抗。侵略军爬上炮台，钉塞炮眼，强行驶入省河，企图以武力强占广州。广州人民义愤填膺，立即进行防堵，坚决不许侵略者进城。耆英慌忙去与英国侵略者密约，准其二年后进入广州城。英国侵略军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狼狈滚到香港。

社学义勇最大一次斗争是一八四九年的反进城斗争。这年年初，英香港总督文翰以耆英所订两年入城之约已届满，要求入城，并进行多方恫吓。广州各社学听到消息后，立刻行动起来。广州城厢内外人民组织起十余万人的武装力量，昼夜操练，准备迎战，而且按铺捐资，储备经费。广州商人也宣布与侵略者断绝交易。广州人民并在一八四九年三月号的《澳门月报》上刊登了一份告白说：“该蛮夷一有举动，即在各地响起警钟，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杀尽叛夷，寸草不

留，不容蔓延。”^①在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涨形势下，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不敢违抗群众的意志，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说：“民夷实有不解之仇……是以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群思食肉寝皮，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意志，迫使徐广缙拒绝英国侵略者进城的要求。文翰恼羞成怒，率军舰闯入省河。两岸群众十万人，呼声震天，准备战斗。文翰恐惧，慌忙撤退。文翰进城失败之后，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供认：“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一八四一年第一次抵抗时强得多。”^②因此，广东民谣唱道：“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百姓。”反入城斗争实质上是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不平等条约和反对清政府投降卖国的斗争。侵略者慑于中国人民的力量，暂时不敢再提入城要求。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胜利，显示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有坚韧不拔的反抗精神，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二、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革新思想

鸦片战争前夜，全国各地连绵不断爆发的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暴露了封建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侵略者的斗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这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四四七页。

②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九十九页。

一切影响和推动了地主阶级内部一些代表下层的封建官吏和中小地主阶级的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探求使中国富强的方法，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就是他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一七九二年——一八四一年），字璩人，号定庵，又名巩祚，出身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一八二九年中进士，先后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始终没有得到清朝统治阶级的重用。他一生写了三百多篇政论文章和杂文，近八百首诗。在这些著作中无情地揭露批判了孔孟之道和清政府的腐败，提出革新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收编为《龚自珍全集》

赞扬法家，反对儒家，在龚自珍思想中是很突出的。他少年时就“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①。在应试进士的殿试对策时，他以王安石上书皇帝要求变法的精神直陈无隐。同时，他“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②，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引用汉武帝、贾谊、柳宗元等法家人物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改革思想。在尊法的同时，他痛斥迂腐儒士是“生不荷耒耨，长不司吏事”的“尽奄然而无生气”开历史倒车的家伙；谴责科举制度堵塞才智，造成了官场的黑暗。龚自珍指出儒家的经籍多半是虚伪的，他讨厌周公和孔丘的说教，他说“我疑经籍志，著录半虚哄，我生恶周礼”，儒教有什么了不起呢？它不过是“九流一”^③罢了。这就打破了传统的儒家独尊。龚自珍并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指出“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总人事之千变万化，而强

① 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龚自珍全集》第六三三页。

② 《己亥杂诗》，同上书第五三四页。

③ 《题梵册》，《龚自珍全集》第五〇六页。

倭之曰命”^①是很荒谬的。认为“天地，人创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②，肯定了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龚自珍继承了法家路线的基本精神，正视现实，揭露矛盾，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青年时所写的《明良》四论，《尊隐》、《乙丙之际著议》等著作都充满了对旧制度的批判精神，他在这些作品中无情揭露当时清王朝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③的惨状。这个“日之将夕”的封建社会象一个满身“疥癣”又被长绳缚在独木上而病势沉重的病人。要医治这个顽固的疾病，必须“更法”。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自古至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这里引用龚自珍一首诗，来表达他要求革新的心情：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他的“恃风雷”来打破“万马齐喑”的“可哀”现状，达到“九州生气”的愿望，是可贵的。

在龚自珍从挽救清朝统治危机出发，反对儒家顾上不顾下的做法说：“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④主张改变“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⑤的君主专制，提出“天子总其大端”，内外大臣之权“不可以不重”的主张，同时认为必须改革腐败的官僚制度和论资排辈的科举制度，主张推行

① 《尊命》，《龚自珍全集》第八十三、八十五页。

② 《壬癸之际胎观》，同上书第十二页。

③ 《尊隐》，《龚自珍全集》第八十七页。

④ 《农宗》，同上书第四十九页。

⑤ 《明良论》四，同上书第三十五页。

赏罚分明和“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路线。

在经济上，龚自珍认为社会弊病的本源在于“贫富不均”，“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陆，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发展下去“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①他理想的社会图景是“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在《农宗》篇中，他提出了“按宗授田”的改革方案，企图限制“大不相齐”的土地兼并，保护中小地主利益。在《西域置行省议》中，又提出开发西北边疆的方案，认为新疆历来是我国领土，不能任其荒芜，置之不问。建议在新疆设立行省，移民殖边，开发边疆。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是一种进步的主张。

龚自珍晚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盗在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清政府内部出现了禁烟和反禁烟二派。龚自珍坚决主张严禁鸦片，以武力抵抗外国侵略。他称鸦片为“食妖”，使人“病魂魄，逆昼夜”，指出“食妖宜绝”，建议对吸食和贩运鸦片的人严加惩办。一八三八年当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大力支持林则徐的行动，极言彻底禁烟的必要性，并详陈战守之策。鼓励林则徐决不要“游移万一”，提醒林则徐严惩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悄悄者”。希望在打败侵略者后，中国成为一个“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独立富强的国家，这些，表明了龚自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龚自珍的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

^①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七十八页。

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也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要求，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封建社会制度，他期待的“盛势”也不过是封建制度的“盛势”。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字默深。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中小官僚地主家庭。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两江总督裕谦处当幕僚，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目睹了战争的败局。一八五四年中进士，历任江苏兴化知县和高邮知州等职。他与龚自珍、林则徐交往密切。一生写了大量著作，有《默觚》、《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要求革新主张抵抗侵略的论著。

魏源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尊法反儒和主张革新等方面与龚自珍观点相似，世称龚魏。由于他比龚自珍晚死了十五年，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争失败后的社会变化，使他的变革思想比龚自珍前进了一步。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始终贯穿着尊儒、投降、卖国和尊法、抵抗、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魏源的思想正是体现了后一条路线。鸦片战争失败后，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魏源怀着满腔义愤，先后写了《圣武记》、《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积极探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方法。通过总结，他认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对内残酷剥削镇压人民，宣扬封建理学，因循守旧拒绝任何革新；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甘当敌人的走狗。这批人“惟知九州以内”，至天下大势，“则若疑若昧，

……若有若无”^①，他们视西洋长技为“奇技淫巧”，而“邪教毒烟受之”，“但受害而不受益”^②。对此他极端痛恨。同时，三元里人民在民族危机面前高举抗英大旗，坚决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也是激发魏源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促使他提出改革现状，反对投降卖国和反侵略主张的重要因素。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③的口号，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制造新式船炮，用以“攻夷”、“制夷”。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冲开迷雾睁眼看世界，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愧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

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军的腐败，清政府的无能，而人民群众在抗英斗争中的英勇善战，使魏源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战术和备战思想。在战略上，他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提出“战、守、攻”三项军事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又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和诱敌深入，“分优散战”，“水陆并进”等作战方针。同时他批驳了鸦片战争中投降派散布“英夷强寇，非一省所能抵御”的谬论，主张组织训练各省“义民”、“水勇”成为精兵，“捍一省之疆圉”^④。他还主张“平日精选优养、勤练”，以使战时能“将士一心，臂指呼应”，“出奇制胜”。并指出侵略者贪得无厌的本性，告诫人民，要提高警惕常备不懈。

① 《圣武记》卷十二。

②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③ 《海国图志》。《原叙》。

④ 《海国图志》《筹海篇二》。

魏源还把反侵略和经济改革结合起来，主张奖励民间开采矿藏，要求“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①，以利于“实边储”，“捍外侮”^②，针对当时白银外流，银价上涨的情况，他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输入，另一方面主张更币，声言应“仿铸西洋之银钱”和“兼行古时玉币贝币”^③，以利民用。他的这些主张，在经济改革上都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

魏源的这些改革思想，和他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④，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满着矛盾，“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但是他说：“君令臣必恭，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⑤，在君臣、父子、夫妇三对矛盾中，君、父、夫是处在矛盾主要方面，魏源认为这是不变的“道”。这就表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看不到社会的质变。在认识论上，他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⑥。反对理学家闭着眼睛说瞎话。他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说：“及之而后和，屡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见，谈论溟之

① 《海国图志》《筹海篇二》

② 《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二》。

③ 《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三》。

④ 《古微堂内集》卷二《学篇七》。

⑤ 同上《学篇十》。

⑥ 《皇朝经世文编叙》，《古微堂外集》卷三。

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①。强调只有实践才能得到知识。由于他注重实践，以发展的辩证观点去观察分析问题，因此他就比较重视调查研究，正视客观现实，进而提出变革现实的主张，这是他思想中的光辉部分。

魏源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革新，反对投降卖国，主张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但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就是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改革要求，主要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终究还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他就站到了农民战争的对立面。到晚年，他完全与世隔绝，躲进佛寺里去了。

^① 《古微堂内集》卷三，《学篇一》。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的兴起及其胜利发展

第一节 革命前夜的阶级斗争形势

一、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矛盾的迅速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基础上爆发的。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剧烈冲击，官吏、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压榨，较前更为贪婪，更为凶残。中国社会土地兼并的状况，达到了新的高度。有人曾征引各种资料历举冀、苏、浙、晋、鄂、陕、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四页。

鲁、赣、闽、广、桂以及东北等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形，证明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土地有百分之四十至八十，集中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少数人手里，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多数人没有土地。^①就地主拥有土地的情况来说，占地三十顷以上的地主相当普遍，占地数万亩乃至数十万亩的大地主，几乎省省皆有，太平天国首义地区广西桂平、贵县、平南、陆川、博白一带，土地更为集中，地主阶级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②不少大地主每年收进的租谷达几十万斤乃至上百万斤。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③。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更为严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当时就深刻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追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④

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消耗了大量战费，仅《南京条约》一项就付出二千一百万元的巨额赔款，除去侵略者在各地抢掠的大量金银财宝不计外，清政府支出的战费有账可查者约在七千万元左右，广东一省的战费即达四百万两。因此，战争一结束，清朝统治集团就下了一连串搜刮令：“筹划经费”、

①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三卷，一期。

②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九六二年版，第一页。

③ 《桂平县志》第二十九卷。

④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页。

“开捐输”、“裁浮费归公”、“多追商欠”、“查明私垦隐赋，勒限照例升科”等，横征暴敛，以填补因战争和赔款造成的财政亏空。同时，清政府普遍加重了地丁漕赋的征收科派。单地丁税一项，从一八四一到一八四九年就增加了三百几十万两。官吏四出催捐逼赋，关押拷打，逼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痛苦的另一根源，是资本主义强盗可耻的鸦片贸易。《南京条约》中关于鸦片问题只字未提，因此，鸦片贸易实际上不受任何阻碍。正如马克思所说：“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① 鸦片走私在英、美等国政府的包庇下，较战前有更大规模的发展。鸦片的进口量四十年代为三万七千箱，到五十年代即达约七万箱。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进口鸦片七、八十万箱，约三、四亿银元。香港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许多海口，成为鸦片走私船经常出没的地方。据一八四八年统计，被称为“浮动堡垒”的鸦片趸船，全国计有三十五艘（鸦片战前共二十二艘），仅吴淞口趸船上的鸦片竟达二万二千九百多箱，一八五七年达三万三千余箱。一八四七年上海进口鸦片占全国进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强，一八五七年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年代末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走私港。进口的鸦片越多，中国被刮走的白银和原料也越多。而这一切无一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老问题，较战前更为严重。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一八四二年，银一两兑钱一五七二文，以后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八页。

连年上增，到一八四九年一两银已可兑二三五五文了。这就使农民零售农产品所得铜钱折算成白银缴纳赋税所吃的亏，较战前更大了，即使赋额不增，由于银价腾贵，农民的实际负担也大大加重。官府征收地丁，一八三九年定价银一两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后渐增至二千余文以至二千八、九百文，总比市价高数百文。农民完纳地丁银一两，须卖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银，每亩又需米数斗，平常年景，一亩产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纳完地丁漕米，已经剩余无几。加上高利贷的残酷盘剥，农民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佃农、雇农的生活尤其悲惨。

五口通商以后，洋货的倾销和商路的改变，又造成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和运输工人破产失业。鸦片战争以后，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侵夺了中国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土纱土布的生产。一八四五年福州将军敬穆说：“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①由于外货倾销而破产的手工业工人，被抛进早已很庞大的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原来在广州的贸易大量的转到上海来了。长江流域的商品，包括江浙的丝茶和福建的茶，原来都是挑夫越五岭山脉运往广州的，现在福建的茶可由福州出口，长江流域的货物经由水路运往上海出口。这就使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数十万运输工人失去了生计。

总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头上旧税捐加上了新税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四九四页。

捐，中国社会旧矛盾又加上了新矛盾。阶级矛盾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尖锐起来。

二、反清起义的蓬勃兴起

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剥削越残暴，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就越猛烈。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间，各地农民、手工业者和少数民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举行了一百多次起义，抗捐、抗租、抗粮，攻城杀官，夺取江山。起义遍及全国，由小到大，声势日益壮阔。其中以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的斗争最为激烈。重要起义有：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县天地会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占县城，杀知县，称钟勤王，竖都督大元帅红旗，分官设职，势颇壮盛。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州高沙市地方，人民举行反对地主商人运米出境的斗争。台湾嘉义县洪协聚众数千人起义。

一八四四年，湖南耒阳县杨大鹏率领两千人，持械攻城，举行抗粮起义。

一八四五年，广西藤县邓立奇、钟敬敏率众在赤水墟起义；广东香山、新会、顺德、新安等县农民连续暴动；云南永昌回民起义。浙江奉化张名渊等进行完粮减价斗争。

一八四六年，台湾、山东峄县、湖南新田、广东北流、江苏昭文等地农民起义。青海藏族人民起义。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雷再浩和广西全州李世德在湘、桂边区起义，立“棒棒会”，一时湖南、广西等地天地会纷起响应。

一八四八年，广西大饥，连年的水灾、旱灾、蝗灾、雹

灾，把人民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广大饥民纷纷起来暴动，当地官府对饥民进行残酷镇压。“官逼民反”，广西天地会起义出现了高潮。陈亚贵领导的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起义，转战各地，一直坚持到太平军起义爆发以后。还有张钊领导的艇军在梧州起义，他们长于水战，曾控制了广西的主要水道。

一八四九年，江苏松江府人民进行反抗勒限完粮的斗争。云南腾越厅彝族人民起义。贵州黄平苗族人民起义。影响最大的是湖南新宁县天地会李沅发领导的会众和饥民的起义，他们攻破县城，杀死县官，打开仓库，放出狱中被捕群众，与清军战斗一个多月，随后转战于湘、桂边区的高山丛林中，连续击败地主武装和清军的围攻，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广西天地会纷起响应，如庆远的张家福、柳州的陈东兴、武宣的梁亚九、象州的区振祖等，大有席卷广西之势。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民革命的总趋势是一浪高过一浪，神州处处布满了干柴，人民起义点燃了熊熊的烈火。“山雨欲来风满楼”，以洪秀全为首的一场震撼祖国大地的农民革命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

第二节 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一、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和革命理论

太平天国的伟大革命领袖洪秀全，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客家的一个农民家庭，后迁居官禄埗村。童年入塾读书，十六岁时因家贫停

学，随父兄种田。十八岁受聘为本村塾师。他接近贫苦农民，是一个深知民间疾苦又和贫苦农民有密切联系的乡村知识分子。广东是天地会活跃的地方，天地会反抗清朝的革命斗争，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人民的疾苦，社会的黑暗，激起了他的反抗思想。一八三六年，他到广州应秀才考试，没有考取，无意中得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次年，他再次前往应试，仍然落第，回家后大病四十多天，病中若梦若狂，假托上帝痛斥人间“妖魔”，责罚孔丘，高呼“斩妖，斩妖”，并自称上天堂受了上帝的天命，到人间来为民解除痛苦。他写下了豪壮的诗句：“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鸦片战争失败后，又使热爱祖国的青年洪秀全无比愤激，写下“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姦宄落天罗”的诗句。决心要以他的三尺钢剑重“定山河”。并对族弟洪仁玕说：中国“以五万万兆之花（即华字）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犁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①

一八四三年，洪秀全最后一次赴广州应试，又遭失败。这时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继续展开，清朝政府政治上、军事上的腐朽反动已完全暴露，各种秘密会社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发动武装起义。洪秀全决心抛弃科举仕途，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而斗争。他和同学冯云山等研究《劝世良言》，附

^① 《英杰归真》，《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五七〇页。

会书中词句和宗教仪式，创立了革命组织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创立后，洪秀全积极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发展会众，为了发动群众，冲破封建宗法思想的牢笼，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砸毁了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孔老是二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神圣”偶像，是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洪秀全毅然砸毁这个“圣像”，公开向整个封建制度、向维护这个制度的反革命的孔孟之道宣战，这是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创举，它反映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砸烂封建制度的强烈要求。洪秀全、冯云山因此遭到了封建卫道者们的迫害，不得不离开花县，远出进行革命活动。

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和战友冯云山走向了社会，到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他们的足迹遍及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曲江、阳山、连山等地，进入了被地主阶级骂为“多盗之都”的广西。他们到达广西的时候，正是当地农民革命进入高潮的年头。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刻被如火如荼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吸引住了。他们深入到贵县一带的穷山野坳的贫苦农民中，宣传拜上帝会教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贵县赐谷村一带吸收了一百多名信徒，这是洪、冯在广西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种子。洪秀全还引导群众砸毁了当地六乌神庙的神像，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神权对贫苦农民的束缚，壮大了拜上帝会的声势。这一年的冬天，冯云山转入桂平紫荆山区进行革命活动，洪秀全返回广东。

紫荆山区纵横数十里，山峦重重，形势险要。南麓的金田村是入山要道。这里的贫苦农民，除种地外，大多以砍柴烧炭为业，他们中有汉人、壮人和瑶人。冯云山深入这些贫

苦农民中，和他们一起劳动，并在当地人家当教师。他利用各种机会，加紧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经常在深夜翻山越岭到各村去，同贫苦农民谈心，向他们宣传拜上帝会的宗旨，宣传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经过三年艰苦努力，紫荆山区的贫苦农民加入拜上帝会的达到了三千人。这支力量成为太平天国日后起义时的骨干队伍。紫荆山区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摇篮。

当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活动的时候，洪秀全在花县家乡从事革命理论的创作。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间，他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宣传革命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宣传了：第一，政治平等思想。洪秀全说：“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皇帝可以自称“天子”，可以“祭天”；封建统治者宣扬皇帝和各级统治者是天生高贵，劳动人民是天生低贱、应受统治等鬼话。现在洪秀全却公然否定这套鬼话，声称上帝是“人人共”有的，人人都同样可以拜上帝，没有谁天生高贵，谁天生低贱的事。彻底否定了“神圣的”封建君权。第二，经济平等思想。洪秀全根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这个原则，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在当时，地主、官吏不但占有大部分土地和财富，“此疆彼界”的划分很严；而且他们还贪得无厌地继续吞并农民的土地和仅有的一点东西，“尔吞我并”的现象到处皆有。洪秀全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宣布说：这些“私”和“念”都是非法的，违反“上帝”本意的。这就否定了地主、官吏、高利贷者对农民吞并、剥削的一切“理由”。

第三，政治斗争的目标。洪秀全塑造了两个敌对的代表：一个是“阎罗妖”，他是一切恶行的总魁首；一个是“皇上帝”，他是世界上一切财富的赐与者，是一切善行的总化身。洪秀全号召大家“共同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他所说的阎罗妖，就是指清朝皇帝，妖徒鬼卒就是各级封建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号召群众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洪秀全创立的革命理论在形式上是汲取了基督教的某些原始平等教义，但洪秀全从农民革命的立场出发，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把它改造成为农民革命的理论武器。《劝世良言》是一本基督教的布道书，充满了上帝是“造物主”的唯心哲学和“爱尔仇”的阶级调和论的反动说教。洪秀全却以中国农民传统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给予了新的解释。当那个妄想利用太平天国使中国殖民地化的美国宗教骗子罗孝全，发现洪秀全的理论“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而走向他们利用宗教愚弄中国人民的反面的时候，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天王所热心宣传的宗教教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恶的。”^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到中国传教，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阶层和愚弄中国人民，而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目的在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反对外国侵略和打倒封建主义。这是多么严重的分歧啊！

《救世》《醒世》《觉世》三篇革命文献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制订了一条发动群众武装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路线。它所宣传的平等思想，是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否定。揭开它的宗教外壳，就可看出它的革命

^① 转引自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第七十七页。

民主主义的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洪秀全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中的第一人。他所创立的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农民革命最杰出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农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壮丽的诗篇。

洪秀全创立的太平天国革命理论是当时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理论都根源于阶级斗争，任何思想家都只能是一定阶级的代言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②洪秀全起来闹革命的时代，正是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③现实的阶级斗争是洪秀全创造革命理论的源泉。洪秀全把中国革命农民所憧憬的、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概括为一定要实现的上帝的意志，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腐朽淫恶抽象为一定要打倒的阎罗妖的罪行。在这里，上帝与妖魔的斗争，直接反映了现实社会中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愿望，一旦在农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就发挥出反对封建制度的伟大力量。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八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八页。

③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思想的批判，往往是武器的批判的先导。洪秀全要率领中国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就必须大造革命舆论，用革命的思想去武装群众。洪秀全认真制作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理论著作，启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觉悟，唤起群众千百万，成了指导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拜上帝会初期的革命斗争，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炽烈的阶级斗争中组成了骨干队伍；二是在革命的发展中形成了领导核心。它为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农民政权并向全国胜利发展准备了条件。

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知道冯云山的行踪后也来到紫荆山区，继续宣传教义，发动群众，扩大拜上帝会组织，并带领群众与当地的封建势力斗争。洪秀全听说象州有个甘王庙，老百姓很害怕它的“神灵”，便和冯云山率领群众砸烂了甘王像，捣毁了庙宇。这一革命行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反封建斗争的勇气。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制订了各种章程、宗教仪式。他们规定了《十款天条》：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杀人害人，七、不奸邪淫乱，八、不偷窃打劫，九、不说谎话，十、不起贪心。《十款天条》在平时是生活准则，

^① 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九期《红旗》杂志。

在战时就是军事纪律。太平军对于这些纪律奉行甚严，违者处重刑，这大大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和提高了战斗力。拜上帝会有了自己的教义、组织形式和纪律，发展得更快了。广西东南各州县，如潯州、郁林州、平南、武宣、贵县、博白、陆川都有拜上帝会组织，广东的信宜、茂名一带也有拜上帝会组织。

随着拜上帝会势力的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也日益激烈。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地主团练逮捕了冯云山，企图扑灭农民革命的火焰。拜上帝会群众夺回了冯云山。一八四八年一月，地主团练再次逮捕冯云山。洪秀全闻讯后赶回紫荆山区，发动会众营救无效，乃于四月初回广东继续设法营救。以紫荆山区为中心的拜上帝会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拜上帝会骨干之一杨秀清，用当地流行的神灵附体的方式，托言天父下凡传言，稳定了群众情绪。后来，拜上帝会另一位骨干萧朝贵也用神灵附体的方式托言天兄下凡传言，维系了拜上帝会的组织。不久，紫荆山的烧炭工人设法救出了冯云山。冯云山得知洪秀全为了营救自己已经回花县，遂决定也回花县。这年十一月，二人在家乡会面。

一八四九年夏，洪秀全同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在他们离开紫荆山期间，以神灵附体方式传言者不只杨秀清和萧朝贵，其中有的“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①杨秀清和萧朝贵的传言则起了团结拜上帝会会众的作用。洪秀全以革命大局为重，承认了他们的传言，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取得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六），第八六六页。

成为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成员。

至此，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形成，他们是：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还有韦昌辉和石达开。

冯云山，广东花县人。是洪秀全的同学、第一个革命战友。冯云山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一个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接受教育和献身革命的道路。他虽然出生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自幼诵习经史，但投身革命后，深入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经过痛苦的磨炼，成长为农民革命利益的代表。冯云山和洪秀全一起创造紫荆山革命根据地，是金田起义的决策人之一。他首创太平军目、太平天历等革命制度，在太平天国的早期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活动和思想，对洪秀全有很大的影响。

杨秀清，广西桂平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雇工家庭，自幼丧父母，以烧炭为生，也当过运输工，识字不多，但富于组织能力。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动烧炭工人过程中发现了杨秀清，教育他参加了革命队伍。杨秀清在拜上帝会早期革命斗争中，起了不少作用，但他把洪秀全所认可的代天父传言的最大权威拿在自己手里，并藉此擅权，埋下了日后危害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团结的祸源。

萧朝贵，广西武宣县人。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徙居桂平县紫荆山，以打柴烧炭为业。也当过运输役工。萧朝贵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极度憎恨旧秩序，渴望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当冯云山在紫荆山宣传拜上帝会时，萧朝贵毅然参加革命，忠实坦率，勇敢刚强，在太平天国的早期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金田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韦昌辉，广西桂平县人。地主兼典当商，捐得监生，出

入衙门办事，又是豪绅身份。在地主阶级内部倾轧中，韦昌辉受过打击，坐过牢，赔过几百两银子，为报私仇投机加入拜上帝会，并且混入领导核心。这个阴险狡诈的阶级敌人，把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带进了革命队伍，成为从革命营垒内部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罪魁祸首。

石达开，广西贵县客家人。是当地土豪大姓，富有财物。因为那里土客斗争尖锐，石达开难以安身，投机加入拜上帝会，也混进了领导核心。此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处处标榜封建主义的“信”和“义”，怀有很大野心，成为破坏革命队伍团结，分裂太平天国革命的罪人。

从拜上帝会领导成员的阶级状况来看，贫苦农民的革命派掌握着领导权，但也混入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给日后的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领导核心形成过程中，武装起义所必需的条件也逐渐酝酿成熟和准备就绪。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一、金田起义

在洪秀全的领导下，拜上帝会很快发展为广西农民起义势力中最有生气的革命组织，它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严重恐惧和仇视，当地地主武装——团练，曾千方百计地企图镇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多次粉碎了地主武装的进犯，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拜上帝会秘密地进行各种准备。首先是创立军法，以便把群众用军事编制严密地组织起来。根据起义时已刊刻的《太平军目》来看，全军的基本单位是军，每军一万三千一百五十

六人，由军帅统率。每军分五师，设师帅。每师分五旅，设旅帅。每旅分五卒，设卒长。每卒分四两，设两司马。每两分五伍，设伍长，每伍有四个圣兵，包括伍长共五人。

其次是筹措费用。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生活和军事上的需要，规定人人不得私有财产，参加革命的人“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①，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

再其次是军械的制造。“冯云山被捕获释后，入金田和韦昌辉密谋起事，开炉打铁，日打农具，夜打武器，丢入犀牛潭，起义时，云山说得神人托梦，潭中有武器，发动村人车水，果然捞得刀枪不少。”^②据《桂平县志》记载：一八五〇年拜上帝会会众千余人铸军械于白沙圩，“开炉铸炮，月余乃去。”^③至于瑶族人民为太平军打造刀枪的生动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一八五〇年，广西又一次遇到饥荒，清政府和当地地主依然不顾农民死活，残酷催粮逼租，农民起义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遍及全省。这年秋，清政府把镇压李沅发起义的刽子手向荣调来广西任提督，并调云南、贵州和湖南三省兵各二千到广西，劝谕各地地主举办团练，镇压起义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拜上帝会完成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洪秀全向各地会众发出了“团营”的号令，满怀战斗激情的革命群众，有的杀掉了骑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敌人，有的烧掉了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六），第八七〇页。

② 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著：《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第四十三页。

③ 重修《桂平县志》，卷十七、二十三。

田契，有的变卖了仅有的家产，有的烧掉了房屋，整家、整族、乃至整村，扶老携幼，奔向紫荆山金田村汇合。其中有紫荆山区的基本群众三千余人，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千余人，桂平饥民千余人，博白、陆川一带会众五、六千人。从社会成分来看，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在拜上帝会中也占着很大的数量和重要地位。从族别来看，拜上帝会包括了几个兄弟民族，除了汉族以外，最多的是壮族，还有瑶族和苗族。这些再也不愿当奴隶的人们，决心打碎旧世界的锁链，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拜上帝会领导人洪秀全和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右军主将韦昌辉、左军主将石达开等率全体战士，在金田村的广场上，庄严宣布起义，并发布军纪命令：“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惟，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①这种严格的纪律，充分标明了这支军队和统治阶级的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平军战士不盘辫子，蓄发易服，头包红巾，表示同清朝统治者实行彻底的决裂。

拜上帝会起义后，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前来表示合作。天地会在广西、湖南等地有很大的势力，群众基础较广，它在太平军胜利进军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的天地会首领，如罗大纲后来还成为太平天国的名将。但是，由于天地会和拜上帝会的信仰有所不同，组织纪律也比较松弛，因此有些头目又随即脱离太平军他去。

随后，洪秀全宣布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己为天王，杨

^① 《天命初旨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六十三页。

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军师是太平天国仅次于天王的重要职位。

太平天国的大旗在南中国的上空迎风飘扬，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开始了。

二、定都天京

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清朝统治阶级惊恐万状，急忙任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向荣为广西提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调军队进行围攻。李星沅病死后，又由大学士赛尚阿接任钦差大臣。清军武器好，粮食充足；太平军武器简陋，粮食缺乏。但是，太平军是革命的队伍，军纪严明，士气高昂，深受广大劳动人民拥护；清军是反动腐朽的军队，将帅倾轧，兵无斗志，烧杀抢掠，为老百姓所痛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太平军在武宣、象州和桂平等县境内多次打败清军。七月间赛尚阿到广西，增调兵力达三万人之多。太平军于九月十一日趁中秋月色，自桂平县的新墟出发，突围至平南县。清军发现太平军已突围，慌忙北上追赶，向荣率部于十五日到达官村扎营。太平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劫营战斗，打得向荣几乎全军覆没，清军“所有军火炮械，随营粮饷，兵士衣装”，全被太平军缴获。太平军于九月二十五日乘胜占领永安州（今蒙山县）。

清军在大败之后，内部一片争吵混乱，只有乌兰泰少数军队跟追到永安，在城外隔水为营。太平军在永安从容补充休整，采购粮食军火，颁行天历，制定各种政治制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又实行圣库制度。

宣布“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①

一八五二年春，包围永安州的清军增多了，引起了太平军物资接济的困难。四月五日，太平军在周密的军事计划下，得贵县银矿工的外援，于夜晚大雨之后，安全退出永安，在古苏冲受到清军伏击，洪大全被俘，清军把洪大全看作太平军的重要首领，押送北京杀害。太平军奋勇击溃清军，进至桂林城外。在那里，太平军击伤乌兰泰，但未能攻克桂林城。太平军继续北上，于六月三日攻克湘桂边界上的全州。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之一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冯云山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宣传家和组织者，对革命贡献很大。他的牺牲是革命的一大损失。

太平军攻克全州后弃城继续北上，进入湘南，停留盘旋了三个月，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文告，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

这三篇檄文的主要内容是：（一）庄严宣告：中国的天下，是中国人民的天下，不是清朝反动统治者的天下，清统治阶级和菩萨、阎罗妖一样，都是魔鬼，是人民的公敌，太平天国革命是“替天诛妖”的正义事业；（二）声讨清政府的滔天罪行，控诉他们“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

^①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六十五页。

(三) 警告各地团练不得再与人民为敌，希望各省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表示愿与三合会党团结一致，“同心同力以灭清”。

这三篇战斗檄文，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思想的新发展。枪林弹雨的革命战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无数新鲜的经验充实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内容。除去宗教色彩，文告抓住了太平天国革命和清政府这个主要矛盾，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清政府，深刻地揭露批判了清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罪恶，有力地鼓舞了千百万群众的斗志。太平军在湖南，受到广大农民和挖煤工人以及天地会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加入革命队伍，使太平军人数扩充了十倍，军容壮盛，声势远扬，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了。

一八五二年九月，太平军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不幸中炮牺牲。萧朝贵是太平天国创始者之一，著名的勇将，他的牺牲是革命的又一大损失。

太平军攻长沙不克，于十一月离长沙北进。十二月三日抵益阳，得到了一千多只船，太平军就利用这批船只北渡洞庭湖到岳州。当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清军为防止太平军北进，在岳州扣留了商船五千多只。太平军来到岳州，大批船只尽为所得，许多船户、纤夫参军，立为水营，战斗力大大增强。太平军沿长江水陆并进，进攻武汉。十二月下旬攻克汉阳、汉口。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攻克战略要地武昌。这是太平军出师以来第一次占领省城，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太平军进入城内，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大张旗鼓地镇压了一批坚决与太平天国为敌的反革命。太平军特别注意军纪，认真保护人民，并在各街道上设官巡查。在武昌

城设立圣库，每日向革命队伍成员分发油、盐、柴、米。并颁发命令没收清政府的金银，勒令地主官僚交纳金银财物。太平军还散发《天条书》等革命读物，向群众“讲道理”，武昌城内政治空气为之大变，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象火山熔岩喷发一样映红了武汉的上空。太平军又广泛开展了扩军工作，人民踊跃参军，称为“拜上”。据记载，全城男子十之八九，女子十之一二，都参加了太平军，群情沸腾，达到了“红巾复首众皆狂”的盛况。

太平军攻克武昌，地主阶级的总头目咸丰皇帝吓得“寝馈难安”，大小官僚也乱作一团。清政府慌忙派向荣为钦差大臣专管湖南、湖北的军务，又增派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琦善，率军由河南进入湖北，以防太平军北上；一个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扼守湖北、江西间的长江江面，以防太平军东下。又先后任命了曾国藩等八人分别在八个省分主办团练。清王朝开始发现自己力量薄弱，不足以镇压革命。因此企图仿照五十多年前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办法，利用地方地主豪绅势力来阻遏革命。

曾国藩的湘军是一支由湖南省的团练发展起来的地主武装，是太平天国最为凶恶的劲敌。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一个大恶霸地主，当时已爬到礼部侍郎的官位。一八五三年清政府责成他办理湖南团练，他奉命之后，全力投入这项反革命事业，先建成一支陆军，一八五三年秋一度出省去南昌同太平军作战，结果大败，逃回湖南，继续招兵买马。一八五四年二月，曾国藩练成水、陆两支湘军共一万七千余人，他带了这伙匪兵与太平军作战，出发之前，发布《讨粤匪檄》，对太平天国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他以维护封建伦常礼教来

攻击太平天国的朴素平等观，以保持封建私有制来反对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并大肆诽谤太平天国拜上帝不拜“孔老二”是“窃外夷之绪”，号召各地地主阶级和反动知识分子为保卫孔孟之道和封建统治而反对太平天国，煽起一股反革命的妖风。

一八五三年二月九日，太平军雄师五十万，分水陆两路大军进取南京。旌旗蔽空，帆樯连云，千船健将，两岸雄兵，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清军闻风丧胆，不战而溃，十八日占九江，二十四日克安庆，三月八日抵达南京城下，十九日攻占南京，斩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三月三十一日太平军打下镇江，四月一日占领扬州。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一个与清朝地主政权相对峙的中国农民革命政权诞生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金田起义时太平军的基干队伍不过一万多人，到定都天京的时候，已是号称百万大军了。太平军的节节胜利，队伍的不断壮大，说明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追至天京东南钟山一带扎营，称为“江南大营”，分遣提督驻营镇江城外。另一个钦差大臣琦善进驻扬州城外，称为“江北大营”。这两个大营是当时清王朝和太平军对抗的主力。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从各地调兵遣将，军费支出骤然增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四千万两左右，而军费支出每年达一千多万两。于是清政府拼命加捐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〇四页。

加税，“时而催征粮饷，时而取派军需”，敲骨吸髓，苛索不已。其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起了最恶劣的影响的是“厘金”。一八五三年，江北大营在扬州附近仙女庙开始试办“厘金”，以后陆续在全国各省普遍推行。它的具体做法是每隔十里左右设立一个征税的站，对经过的一切货物进行征税，名义上是每站抽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作为过往税，实际上远不止百分之一。经过重重税卡，货物运到目的地后，价格当然就要大大提高了，这就严重妨碍了各地货物的流通，阻碍了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依靠这种无耻的“厘金”制度，每年刮得约一千万两银子，成为它支付浩大军费的重要来源。

三、北伐、西征和天京外围的战斗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全国处于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之中。一八五三年二月，云南哀牢山彝民起义；五月，福建红钱会起义，小刀会起义，皖北捻军起义；六月，台湾小刀会起义；九月，广西天地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以后数年还不断地发生新的起义，革命火焰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清朝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之后随即制定了北取北京，西征皖赣的军事计划。

北伐是太平天国战略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的老巢北京，以期一举推翻清朝中央政权。洪秀全规定的北伐方针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于五月八日从扬州出发。当时长江以北苏、皖、鲁、豫等省捻军到处起义，对太平军北伐是个极好的配合。

北伐军于十三日攻占浦口，二十八日攻克凤阳。吉文元、

朱锡珉率领后续部队先后与北伐大队会合。这支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怀着直捣北京，杀死“妖头”的雄心壮志，势如疾风暴雨，横扫苏、皖、豫三省，攻下豫北军事重镇朱仙镇。但是，北伐军离革命中心天京越来越远了。音信难通，粮食物资供应困难，又面临天险黄河，船只全被敌人烧光了。然而，天大的困难吓不倒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他们沿河而上，终于在巩县得到洛河上的运煤船工的帮助，成功地渡过了黄河天险。北伐军穿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一鼓作气，十月底就攻到了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北伐军兵临京津，是太平天国的两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地主阶级朝野上下一片悲鸣。咸丰皇帝准备向热河逃跑，北京城内的官僚地主闻风丧胆，纷纷作鸟兽散，外逃达三万余家。但是，反动的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政府急调重兵，屯结在天津西北的杨村，和北伐军相持。急行数千里的北伐军，军力疲困，沿途又没有很好发动群众，粮草寒衣均告缺乏，在久攻天津不克后便转入了守势。一八五四年二月，全军粮尽，放弃静海，三月退至阜城，以待天京派出的援军。在阜城战斗中吉文元中流矢牺牲。

一八五四年二月，北伐援军从安庆出发，经河南，转江苏，于三月底攻克山东临清。距北伐军所在的阜城仅二百华里，但未能会师。四月，援军撤出临清，于南退途中完全损失了。五月初，林凤祥、李开芳从阜城突围到东光县的连镇。月底李开芳率领一部分北伐军又从连镇突围到山东高唐。林凤祥守连镇十个月，一八五五年三月，为清军僧格林沁部攻陷，林凤祥挥舞大刀，杀开一条血路，不幸中箭身负重伤被

俘。三月十五日，在北京被清政府处以“寸磔”的酷刑。林凤祥就义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后来，太平天国封林凤祥为求王，以表彰他的功勋和英勇忠烈。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七日李开芳率八百多人自高唐突围，退至在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引河水灌冯官屯。五月，李开芳率八十余人出降。降后无耻地向敌人表白：“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①随后即被解送北京杀死。

血战两年，纵横六省，长驱五千里的太平天国北伐军，终因孤立无援，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失败了。太平天国领袖们没有派出足够的兵力，扫荡中原，攻占北京，失去了一举推翻清政府的大好时机。但是，北伐军扫荡了北方的反革命势力，牵制了清朝大量的反革命军队，对于捍卫、巩固天京和日后北方人民斗争的发展还是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英雄们那种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可歌可泣的勇敢战斗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的。

西征军也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出发。西征的战略目的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上游，屏障天京，切断清朝中央政府与长江以南的联系，攻取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以取得粮食及各种物资的支援，一举奠定江南。西征所要攻取的这些地区，本来是太平军曾经攻占过的，但因为太平军一路上攻下一地，又放弃一地，没有建立政权固守，以致这些地区很快又恢复了清朝的统治，这在军事上是个失策。

① 《蛮氛汇编》。

西征军由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领，沿长江西进，六月十日克安徽省会安庆，廿四日围南昌，虽然打败了前来解围的地主武装，但未能攻下南昌，撤围后于九月廿九日攻克九江。十月连克黄州、汉口、汉阳，因军力准备不足，退守黄州待援，一八五四年一月攻克庐州（合肥），二月在黄州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统率的清军，吴文镕自杀。

西征军随即又占有汉口、汉阳，一面围攻武昌，一面向长沙进军，遇到了曾国藩统率的湘军的顽抗。

一八五四年四月间，太平军在长沙北面的靖港把湘军水师打得一败涂地，曾国藩投水自杀，被他的随从捞起。在湘潭的太平军不幸被湘军打败，遂放弃对长沙的进攻，退守岳州。武昌在围攻了三个月之后，终于在六月底攻克。

太平军退守岳州后，曾国藩乘机重整湘军，加强作战力量。七月底，湘军开始反扑，攻陷岳州、武昌等城，并于十二月进犯九江。林启容率领太平军在九江坚决固守，屡挫湘军。一八五五年一月，太平天国派军西援九江，在湖口诱使一部分湘军水师驶入鄱阳湖，随后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二月，罗大纲等率小艇实行突袭，重创湘军外江水师，夺得曾国藩座船，曾国藩又一次投水寻死，被附近小船捞起，仓皇逃去。太平军沿长江南北夹江西上，于一八五五年四月第三次攻克武昌。太平军又分兵取江西，会合由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军，攻克江西全省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县。江西省成为太平军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地。

一八五三年冬，敌江北大营调兵围攻扬州，天王派赖汉英前往援救，在扬州附近的三汊河大败清军，救出扬州守将曾立昌部，退至瓜洲。

一八五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率军围镇江，天王调西战场军队由秦日纲率领东援，和镇江守军合力冲破围城清军。四月三日，太平军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困江北大营，并乘胜克扬州。六月，太平军撤出扬州，回师大破围攻镇江的清军，吉尔杭阿自杀。接着，太平军就在天京外围围歼江南大营。石达开奉命率三万人从江西回援，秦日纲等也从镇江回师天京，形成了对江南大营的包围。六月二十日，太平军分几路冲击清军营垒，鏖战终日，杀得清军狼奔豕突，全营溃散。钦差大臣向荣率残部败退丹阳，又气又急，一命呜呼。清政府又任命和春为钦差大臣，继续捣乱。

经过三年的反复斗争，到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取得重大胜利。湖北东部、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也先后被击溃。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四、各地天地会和捻军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推动了全国各地反清起义的蓬勃展开。南方各地天地会会众纷纷举起义旗，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北方捻党也揭竿而起，驰骋于黄、淮大平原上，与几十万清军追逐搏杀，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

天地会是长江以南各省人民的反清组织之一，在鸦片战争前早已存在，遍布南方各省。各地天地会独立活动，互不隶属，也没有总的领导机构。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的天地会已不断举行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天地会的起义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其中以两广、两湖和上海的天地会支派的斗争最为激烈。

广西一直是天地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全田起义后，有很多天地会会众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离开广西后，留在当地的天地会众继续同清军斗争。一八五二年九月，胡有禄、朱洪英率领天地会起义。一八五四年十月在灌阳县建立“升平天国”。一八五五年三月，他们应太平天国之请，向湖南进军，往天京会合太平军。

广东天地会在陈开领导下于一八五四年六月在佛山起义。起义群众头扎红巾，称为红巾军。攻占了广州附近几十个州县，并围攻广州达数月之久。由于英法侵略军帮助清军运兵，把武器、粮食运入城里接济清军。红巾军没有攻下广州。一八五五年陈开率领一支红巾军西入广西，攻克太平天国发源地桂平，建立“大成国”，一八六一年八月失败。何禄率领另一支红巾军向湖南进军。

两广天地会起义军大批进入湖南，湖南天地会又群起响应，经由江西投向太平军，太平军也从武昌沿湘赣边界南下迎接，可惜未能全部会师。一八五五年九月，西路的胡有禄、朱洪英被湘军战败，胡有禄被捕，遇害于长沙。朱洪英于第二年返回广西，一八五八年转战入贵州，后来参加太平军，作战于湘桂等地。一八五五年底，东路的何禄受伤牺牲，余部返回广东，只有一部分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会师。

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同时，福建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小刀会传到上海。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上海小刀会积极准备起义响应。这年九月，青浦、嘉定二县农民在周立春领导下举行抗粮起义，攻下嘉定县城，派人到上海同小刀会联系，小刀会决定立即行动。九月七日黎明，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的领导下宣告起义，三千多起义军迅速占领了上海

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建立了革命政权。根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传统宗旨，这个政权称为“大明国”，以刘丽川为第一首领，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各地在沪的小刀会会众和上海郊区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在一万七千多人。起义军设总部于东门旧学宫，豫园点春堂也设有指挥所，在十二天之内攻占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十五日，刘丽川正式向各国领事宣告：革命政权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①同时刘丽川派人向洪秀全报告起义经过，请求天王迅速派员前来。奏文书写两份，分别从水陆两路递送。水路递送的一份为清军所劫。陆路递送的一份是否到达天京，虽然无从详考，但太平天国是知道小刀会的胜利起义的。太平天国拟订了支援小刀会的计划，并做了准备工作。由于清军严密控制了镇江至上海的水路交通，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起义军又改称为太平天国，刘丽川的职衔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清政府慌了手脚，急忙抽调军队，由江南大营帮办许乃钊率领，赶赴上海镇压起义军。小刀会曾以主力进攻太仓，准备占领太仓后与苏州的小刀会起义相配合，夺取省城苏州，但在太仓受阻。不久，清军和地主武装攻陷嘉定，周立春被俘牺牲。在清军的压力下，小刀会放弃了上海以外的地方，把队伍集中在上海县城，同敌人进行浴血战斗，多次打败清军。

一八五四年六月，清朝上海地方当局与英、美、法三国

^①《北华捷报》，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六十二页。

订立了“海关征税规则”，由三国指派侵略分子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攫夺了上海海关管理权。接着又订立了“上海租界地皮章程”，允许帝国主义在租界内建立行政和警察机构。把原供外人租地建屋的地界变成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外国侵略者在得到了这些侵略权益后，就明目张胆地帮助清军镇压小刀会起义军。英、美、法侵略者在上海县城北面筑了一道墙，隔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阻止城外农民对小刀会的接济。

一八五五年一月，法国侵略者伙同清军发动了一次猖狂进攻。黄浦江的法国兵舰用大炮向城里轰击，掩护法军和清军攻城。法军二百多人从东北角被炮火打开的缺口中窜进城里，被起义军砍杀不少，急忙奔跳出城，跟着窜进城里的清军也被起义军打得乱窜乱逃。敌人吃了这次败仗后，一时不敢再发动进攻，就加紧封锁。

在敌人围困下，城内起义军弹尽粮绝，决定突围，到镇江参加太平军。一八五五年二月，起义军在刘丽川率领下冲出县城。刘丽川在虹桥附近同清军的激烈搏斗中牺牲。一部分突围出去的起义军到天京加入了太平军，另一部分到江西参加了当地天地会的起义，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小刀会的英勇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但他们只着重在城市的斗争，没有更早冲出上海城，去农村同农民结合斗争，最后终于在敌众我寡和粮尽弹绝的劣势下陷于失败。

捻军是淮河流域穷苦人民的反封建组织，在鸦片战争前几十年就已出现，称捻子，分布在淮河流域的皖北、苏北、山东、河南等地，参加者主要是农民。他们平时从事日常的劳动，需要集中时，由各地首领集合队伍。捻军缺乏严密

统一的组织，经常是忽聚忽散，因而始终没有形成象太平天国那样强大的队伍。但是，捻军提出了“劫富救贫”的政治口号，坚持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

太平天国起义后，捻军开始举行武装起义。一八五三年五、六月间太平军北伐队伍经过皖北，亳州的捻军首领张洛行聚众在雒河集（今涡阳县）起义，结成一支较强大的队伍，联合另外几支捻军，攻克蒙城、亳州等地。在同清军作战过程中，捻军感到有统一行动的 necessity，一八五五年七月主要几支捻军的首领在雒河集会盟，共同推举张洛行为盟主，称“大汉明命王”，以五色旗分别组织各路捻军，设立了“总巳”、“司马”、“先锋”等官职。从此捻军由分散逐渐到集中，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式，拥有数十万人马。

清政府调集军队来镇压，一八五六年春夏之间，在雒河集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六月十九日，雒河集为清军所夺，捻军向南行进，七月十八日，占领了皖豫边界的三河尖，在那里坚持斗争。张洛行、龚得树等率领捻军主力，从一八五七年初开始，先后占有淮河以南的霍邱、正阳关和六安等城市，与太平军联合对抗清朝的“剿捻”军和湘军。同时在淮河以北，捻军所筑的圩堡林立，人民执械守卫，打击反动力量，是太平天国在北方的一支强大的友军。此外捻军还经常有一部分力量轮流出征，驰骋于山东、河南、湖北、江苏一带，所过之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把革命的火种四出传播，因此，愈到后来，出征的规模愈大，次数愈多，地区愈远。从一八五八年起每年都有捻军从皖北大规模出征河南、山东。所经各地人民闻风而动，如山东就有鲁西白莲教起义军、宋

景诗的黑旗军、鲁南的幅军、邹县习文教起义军、长枪会起义军等。一八六二年秋，清政府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一指挥“剿捻”军事。一八六四年四月，捻军在豫南与太平军赖文光部会师，声势大振，与清军战于中原、西北战场上。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和各项制度政策

一、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制订了各项革命法制和政策，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努力巩固政权，建设农民的理想天国。一八五三年冬，经洪秀全批准，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英雄们反对封建制度，建设新社会的蓝图和总纲领，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土地问题是整个纲领的核心。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重新分配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据此，它规定将全部土地按好坏分为九等，一亩早晚两熟，产量为一千二百斤者为上上田，产量减一百斤降低一等，年产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然后按农民每家人口数目平均分配，男女分得同样多的土地，每家好田、坏田搭配：“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分得的土地比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少一半。

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天朝田亩制度》还规画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式的社会蓝图。这个社会组织以农业为基

础，政治、军事、生产、生活、教育融合一起，以二十五家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叫做“两”；四个“两”组成一个“卒”；五个“卒”组成一个“旅”；五个“旅”组成一个“师”；五个“师”组成一个“军”，分别由“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统率。全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家出一人为兵，平时由各级领导“督之为农”，遇警则“杀敌捕贼”。在“军帅”以上，每县还设立一名“监军”，相当于县长，每州设一名“总制”，为一州之长。总制和监军由上级委派，称“守土官”。“军帅”以下官员称“乡官”，由群众自己推举，每年公举一次。乡官每三年根据贤、恶情况陞、贬一次，也由逐级公举。同时规定每家必须种桑织布，养母鸡五只母猪两只，农副业包括麦、豆、苧麻、布帛、鸡、犬等，除留下每人的口粮外，全部交给国库，不得私有。每二十五家设一个国库，遇有婚丧之事，另由国库按一定标准支付粮食等物品。老弱孤残等也由国库供养。每二十五家，即每“两”中还配置一定数量的手工匠，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手工劳动，规定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此外，每“两”还设一个“礼拜堂”，儿童们每天到这里由“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的书籍，到礼拜天，全体群众都到礼拜堂“听讲道理，颂赞祭奠上主皇上帝”。各家间如遇有争吵，由“两司马”评判曲直，如一方不服可上告“卒长”，再不服再向上告，直到争执解决为止。这样，每个“两”都成为财产公有、自给自足、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社会生活单位，全国由千万个这样的单位组合而成。太平天国期望用这样的方式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愿望，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

平”的地上理想“天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纲领有强烈的革命性：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剥削制度，具有彻底的反封建意义。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残酷剥削农民，这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①几千年来，广大农民为了挣脱封建剥削和压迫，曾付出了无数鲜血。在以往的农民起义中，曾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但都缺乏详细明确的内容，而《天朝田亩制度》却把农民长期以来的这种愿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提出了详细明确的反封建纲领，并展示了一幅理想的幸福社会的蓝图，这是亿万农民所梦寐以求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反封建积极性，引导千百万农民为摧毁万恶的封建制度而战斗，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列宁曾经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②《天朝田亩制度》是两千多年来农民革命史上最光辉的革命纲领。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又是空想的和不能实现的。它的绝对平分土地的办法和给广大农民设计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它的分田办法也不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同农村土地和人口分布的复杂情形是脱离的；而且太平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七——五八八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

天国管理的地区很不稳定，在紧张的军事斗争环境中，也没有条件来实行这样一次复杂的土地改革工作。更主要的是，它所设计的生产、生活方案，要求把整个社会经济都变成清一色的绝对平均的小农经济，每一个社会成员不但平均保有一样的土地，而且连一切生活品也一律一个样，都永远固定在很低的水平上，这就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前进，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于实行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①

《天朝田亩制度》包含的这个革命和空想的矛盾，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有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又是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提不出新的切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这是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象《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反封建的伟大纲领，实在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了不起的创举。

二、太平天国实行的各项国内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是空想的和不能实现的，太平天国实际上也并未完全按照这个制度规定的那样去平分土地和组织社会生活，但在许多方面是贯彻了这个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的。

太平军所到之处，杀地主，烧田契，捣寺庙。许多地主或死或逃，江、浙一带地主有很多逃到上海，“江浙子遗，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〇九页。

无不趋往上海洋泾之上。”原来耕种这些地主和寺庙土地的农民，就不再向地主和寺庙交租了。有的地区太平天国还把“田凭”发给农民，这些农民在实际上和法律上都有他们自己的土地。

也有不少地区的农民自发起来斗争，拒绝向地主交租，或者少向地主交租，太平天国一般也支持农民的这些斗争，那些地方未杀未逃的地主也就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例如江苏无锡，“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想。”^①浙江绍兴，“去冬同佃户收租，如乞丐状，善者给数斗，黠者不理。”^②当时有一个地主知识分子记载他一八五三年在天京郊外陈墟桥蔡邨同一个农民的谈话。他看到那里的农民都仇恨清朝官吏，便问一个农民：你们为什么恨清朝官吏？农民回答说：因为清政府向我们征收钱粮。这个地主知识分子再问：太平天国不也向你们征收钱粮吗？农民回答说：是的，但是我们向太平天国交钱粮后就不再向地主交租了！^③这个记载，证明了太平天国管辖区的农民曾确实不向地主交租，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在许多地区也仍然采取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太平军和农民群众的斗争有力地削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内，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消灭。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为了应付庞大的军政开支，决定开征田赋，实行“照旧交粮纳税”^④，即向土地所有者

① 《平贼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二七九页。

② 范城：《质言》，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三期。

③ 汪士铤：《乙丙日记》卷二，第十九页。

④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三），第二〇四页。

(地主和自耕农)征收田赋,准许地主收租完粮,结果在许多地方导致维持旧有的土地关系。例如,长洲、元和、吴县,“业田者俱设局收租息米,每亩四、五斗不等。”^①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国库制度,在整个社会上虽然没有实行,但在革命队伍和某些城市内却是雷厉风行地执行过的,而且对革命的发展曾经起过推动作用。金田起义前夜,太平军建立的圣库,就是国库制度的前身。在永安、长沙等地,洪秀全又一再命令全军禁藏私财。到达天京以后,在天京城内实行公产制度;设立典圣库、典圣粮、典买办、典油盐等职官,负责供给全军的生活需要。规定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盐各七斤,官兵之间只有吃肉多少之分,其他一律平等,很象《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情况。

《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工商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改变很大。工业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本来是把农业和手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只是作为农闲时的副业,没有独立地位,这种政策和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它和土地政策一样,不可能在社会上普遍推行。但是太平天国根据公有制原则和军事上的需要,曾经在天京集中管理各行手工业。天京的诸匠营与百工衙就是公营的手工业生产组织,诸匠营有七种:木营(建筑、木器),土营(战时挖掘地道,平时为建筑工人),织营(织绸缎),金匠营(制造金银器饰),金镌营(刻书籍和印章),绣锦营(画工)。百工衙有制造武器的典炮衙、战船衙……,生产食品的豆腐

^① 德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一〇一页。

衙、天茶衙……，制造服装的缝衣衙、国帽衙……以及油漆衙、典竹衙、典石衙、钟表衙、铸钱衙……等等。诸匠营派指挥领导，百工衙或派指挥、或派总制、或派监军领导。这种在军事期间的公营手工业组织和一般的手工工场是不同的，因为它只是供应需要而生产，生产出来的货物直接分配到消费者手里，并不经过商业的媒介。手工业工人吃饱穿暖之外也并不领取工资。这种集中管理的公有制手工业生产，在满足革命的各种紧急需要方面起了保证的作用。

商业方面：《天朝田亩制度》中没有提到商业，本着“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的原则废除商业。这种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结果是“所无者仍须添购，物又渐乏”，因此开始在各地设立一些公营商店，如天京“设肆于北门桥，转卖之各馆，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①这种公卖政策在供应革命需要和调节各地货物方面虽然起过良好作用，但究竟不能长期普遍采用，因此天京以外各地都允许自由贸易存在。到了后期，太平天国不得不开放市场，号召“工商者复其工商，各安其旧，无忘故业，公平交易，并无相欺。”^②愿开业者发给“商凭”（营业执照），并警告不法商人“既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高抬市价，如敢垄断渔利，有害民生者”^③，必予查究。严厉打击奸商，执行保护贸易的政策，商业方呈现出繁荣的气象。

乡官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太平天

①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四），第七一六页。

② 《安民告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七〇四页。

③ 《金匱商凭》，同上书，第八七四页。

国管辖地区差不多都建立了乡官组织，这种具有朴素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权基层组织，在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和维持地方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军帅以下各级乡官由各地公举本地人充任。但实际上，公举者固多，直接委派者也不少。因为这种方式比公举快速便当，适宜于战时。乡官的职务首先是催征钱粮，供应军需，其次是带领乡兵，执行军事任务，有时直接配合太平军作战。反动头子曾国藩对这一点最害怕，他说江西各地农民“甘心蕃发助战”，“每战动辄数万人，我军为之震骇。”^①乡官有时还派人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其他如维持地方治安，救济灾民，禁吸鸦片，处理一般民间诉讼等工作，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从革命利益出发，大力提拔青年人到重要岗位上去，不讲究论资排辈，不拘一格选拔人材。象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一大批青年将领，很多都是童子兵和普通战士出身。通过战火的考验和锻炼，增长了才干，从战争学会了战争，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优秀战将。这些新生力量，在千军万马中叱咤风云，冲锋陷阵，是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行解放妇女的政策，是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政治上，太平天国把妇女看作姊妹，主张男女平等，太平天国的妇女享有参军、参政、参加劳动、应考、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受教育的权力；在经济上，太平天国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经济待遇和男子一样，给妇女解放以物质基础；在婚姻制度上，实行“凡天下婚姻不论

① 《曾国藩家书》。

财”^①，废除买卖婚姻，提倡一夫一妇，禁止缠足，不准买卖奴婢，取缔娼妓，强奸妇女者“斩首示众”，保护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天平天国的妇女，由于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政权机构中有女官，据记载，仅各王府中的女官就有六千五百八十四人之多。在太平军中有女营、女将，打起仗来很勇敢。“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②，就是太平军中男女并肩作战的生动描绘。在经济上她们参加“女工营”，负责后勤工作，织布缝衣，做饭扫街，为革命贡献出一切力量。一个外国人在天京看到：“在街上行走时，所见到妇女在路上者之众多，确是一种新现象，她们衣服装饰大都甚好，其外观十分可敬。许多骑马往来驰骋于路上，其他则徒步而行，大多数是大脚的”。在这里，中国妇女第一次冲破两千年来压在自己头上的封建枷锁，扬眉吐气，写下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对外政策

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深入中国领土，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已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洪秀全曾经指出：万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据此，太平天国坚持了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立场，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三二二页。

^②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六十八页。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后，外国侵略者就准备支持清政府，公开镇压太平天国，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八五三年三月初，太平军向长江下游挺进，南京指日可下，江苏巡抚指使上海道吴健彰向英、美、法领事乞援，要求外国兵船助守南京。英国政府立即调集兵船自香港来上海，准备对太平天国下毒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公使马沙利也积极主张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一手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手“乘皇帝还拥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①但由于太平天国军事形势的飞跃发展，和清朝封建政权在长江两岸的土崩瓦解，外国侵略者不敢贸然实行武力干涉。英国公使文翰向英国外交部说：“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帝（指清政府），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指太平军）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②太平天国革命的辉煌胜利，筑起了民族自卫的巨大屏障，迫使外国侵略者不敢为所欲为。狡猾的侵略者便伪装中立，屡次“访问”天京，窥探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伺机进行侵略。英国公使文翰于一八五三年四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十二月，美国公使麦莲于一八五四年五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包令于六月，先后“访问”天京。文翰到天京，向太平天国送了一个照会，还附了一分《南京条约》。在照会中威胁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

① 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二〇四页。

② 转引自《历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第十四页。

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妄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英国从清政府手里取得的权益。文翰还假惺惺地表示英国不帮助清政府。太平天国领导人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你们就是帮助清政府，也是无用的。拒绝了侵略者的要求。法国公使、美国公使也参加了胁迫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大合唱。法国公使还挑衅地提出所谓保护天主教的无理要求。太平天国严正驳斥：太平天国未曾压迫天主教，断然拒绝了法国侵略者的干涉。

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们初次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对这些披着羊皮的狼的认识，还处在表面的感性的阶段，看不清侵略者的反革命本性和它必然勾结中国封建势力镇压革命的本质，特别是拜上帝会脱胎于基督教，因而产生了一种错觉，把那些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工具的外国侵略者也当成了“洋兄弟”。洪秀全写了一个“赐西洋番弟诏”，其中有这样的话：“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因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缺乏高度的警惕性，不能区别外国侵略分子和外国人民，而笼统地准予“自由出入，随意进退”，以致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吃了侵略者的大亏。但是，太平天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反对鸦片贸易，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外交原则。例如，驻镇江的太平天国官员就曾严厉指责英人不应再贩卖鸦片；当文翰率舰闯入太平天国水域时，太平军镇江、瓜洲炮台开炮警告，英舰被迫停船说明原委，始得通过，这些都表现了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革命精神。一八六〇年后，外国侵略者完全撕下了“中立”的假面具，悍然帮助清政府以武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坚决与外国侵

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全面进攻，必然引起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革命农民高举反孔的大旗，向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思想堡垒孔孟之道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群众运动。这场斗争是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内反孔和尊孔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革命农民和封建地主阶级生死搏斗的反映。洪秀全在开始革命活动时，就深深感到，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砸碎禁锢人民思想的孔孟之道的精神桎梏是办不到的。他把旧世界“妖魔作怪”的根源归结为“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因此甘冒封建主义的天下大不韪，砸碎了孔子的牌位，带领千百万革命农民造地主阶级的反，造孔老二的反，揭开了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序幕。

在太平军胜利进军中，所到之处，不仅扫荡地主阶级的牛鬼蛇神，而且用战火摧毁地主阶级用以愚弄、统治群众的庙堂和各种神象，烧毁了湖南道州、郴州的孔庙，湖北德安的孔丘塑象，山东临清的文庙大成殿，安徽潜山的文庙木主，天翻地覆，摧枯拉朽。太平天国捣毁孔庙的革命行动无异是挖了地主阶级的祖坟，反动派捶胸顿足，破口大骂，攻击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房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壁水

圆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①但是，革命是骂不倒的。太平军战士们不管风吹浪打，照样在江宁学宫的“圣殿前杀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是何等的痛快啊！

一八五三年，在革命的高潮中，太平天国正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明确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在法律上宣判了《四书》、《五经》的死刑。洪秀全并带头不许儿子读《四书》、《五经》。严禁地主知识分子藏读孔孟之书，一个目击太平天国焚烧孔孟之书的地主分子，怀着恐惧和仇恨的心情，编了《新乐府》嘲笑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③烧毁浸透毒液的孔孟的书，对地主阶级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对太平天国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快事。

为了抵制孔孟之道对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还对起义以来发布的文件，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清除其中的封建污浊，重新订正刊行，如《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引有《易》、《中庸》、《诗》、《书》的话，在新颁行的《太平诏书》中全部删去。《原道救世歌》中“第二不正忤父母”节，原有“历山号泣天为动，鸟为耘只象为耕，尊为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岂轻”四句，系忠君孝道的说教，亦予删掉。《原道醒世训》曾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章，因出自《礼记·礼运篇》，也将这一章一百三十四字尽行删除。同时，在洪秀全

① 《贼情汇纂》卷十二，《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三），第三二六——三二七页。

② 《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三一—三页。

③ 《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四），第七三五页。

亲自主持下，成立了删书衙，在除“邪话”立“真话”的政治标准指导下，对《四书》、《五经》中“诱惑人心，紊乱真道”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经过删改的《四书》、《五经》失却了昔日“经”的尊严，如《诗经》被洪秀全亲自改名为《诗韵》发行就是一例。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的反孔思想到革命后期仍然绚丽夺目。在一八六二年刊布的记载洪秀全早期革命活动的《太平天日》中，就把太平天国和孔教的根本对立以神话的形式反映出来，借用天父上主皇上帝之名义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记叙了严厉责罚孔丘的一段故事：天父、天兄、洪秀全和在场的天上的人们，都愤怒批判了孔丘帮助地主阶级兴妖作怪的罪行。但是，孔丘死不悔改，竟然“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大怒，派洪秀全率领天兵天将追回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①但仍给了孔丘处罚。这个通过神话形式批判孔丘的故事，描写在天上，发生在地上，是太平天国反孔群众运动的一个生动写照。

太平天国对孔孟大兴问罪之师，采取捣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批判孔丘等一系列革命行动，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封建专制政权是地主阶级一切权力的基干。两千多年来，儒家宣扬的“君

^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六三六页。

权神授”和忠君思想，把地主阶级的政治总头目皇帝，美化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谁敢冒犯，就被诬为大逆不道，处以极刑。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就不听这一套，把皇帝斥为“阎罗妖”，把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呼为“妖徒鬼卒”，统统都在打倒之列。族权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直接帮凶。儒家鼓吹的“孝悌归仁”和“三纲五常”，随着地主政权的被打翻，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太平军所到之处，破坏宗族祠堂，杀逐封建地主族长，有的则被编入牌尾和老民馆，强迫其为太平军服役。族长老爷们的威风，扫地以尽。布满农村的宗祠、支祠以至家族系统的权力，也动摇起来。由阎罗天子、城隍老爷、土地菩萨组成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组成的神仙系统，构成了鬼神系统的神权。太平天国英雄们蔑视这个地主阶级虚构的鬼神“权威”，指出：“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像”都是封建统治者用来“迷惑苦累世人”的蛇魔。不仅没有什么可怕，而且必须加以诛灭。太平军所到之处，几乎扫荡了一切神仙鬼怪的偶像。中国的女子，除了受地主阶级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外，还受夫权的支配。孔丘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喧嚣，就是这种封建夫权的理论依据。地主老爷们认为男尊女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太平天国提出了“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主张，并付之于贯彻执行，给封建夫权以沉重的打击。

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的反孔斗争，击中了封建统治思想的要害。屠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大刽子手、“孔家店”的卫道士曾国藩惊叫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

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①太平天国在思想战线上开展的反孔斗争，是中国农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必然有力地推动政治上的解放运动。太平天国革命能够坚持十四年纵横十八省的英勇战斗，与这场气势磅礴的反孔群众运动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的革命，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不能比拟，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特点。它再一次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革命的总要反孔；凡是倒退的、反革命的总是尊孔。然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究是一场农民战争，她虽然把农民革命的平均主义武器磨得雪亮，在中国思想革命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但毕竟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也就不可能深刻揭露孔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因此，就决定了太平天国不能从根本上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反孔斗争的烈火被地主阶级的尊孔毒流所代替。

^① 《讨粤匪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第九十八页。

第三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一节 沙俄侵占大片中国领土。英、法、美扩大侵略的阴谋活动

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正处于封建农奴制崩溃的前夕，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奴、工人起义不断爆发，沙皇专制政权的危机日益严重。沙皇政府竭力向外扩张，以此加强自己的权势，维持其国内的反动统治。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国内市场由于农奴制的束缚而十分狭窄，也迫切要求夺取新的领土和资源。封建主义的对外领土掠夺和资本主义向外寻求市场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它们推动着沙皇政府不断地向欧洲、向东方、向中国进行扩张，千方百计地扩大帝国的版图。沙俄逐渐成为一个极端反动的更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在欧洲，它是支持一切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充当“欧洲宪兵”，到处镇压革命运动；在亚洲，它是“东方民族的恶魔”，把侵略魔爪伸向亚洲各地，特别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侵略目标。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还远不止这些，它的目的是夺取世界霸权，不仅要“把整个欧洲都拿过来”，而且狂妄到要变太平洋为俄罗斯帝国的内海。“这个

侵略计划将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北美洲西海岸，夏威夷，库页岛的南部以及阿穆尔河口进一步作为俄国的殖民地。再加上俄国已拥有堪察加，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便使得俄国将成为整个北太平洋的霸主。”在这一整套侵略计划的支配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就必然成为它妄想独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庞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沙皇俄国加紧向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区扩张，不断侵入我国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

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黑龙江地区一向抱有野心的沙皇政府，利用英国入侵中国的机会，不断派遣各种打着“科学探险”、“勘查”旗号的侵略队伍，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行非法活动。他们除了刺探整个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外，主要想搞清两个问题：一、黑龙江是否通大海，海轮是否可以进入河口；二、库页岛是一个海岛，还是一个半岛？黑龙江如果通海，那它就不仅是沟通外贝加尔地区和堪察加之间的交通要道，而且还为俄国开辟了一条直通太平洋的方便之路。它就会成为俄国在远东的生命线。黑龙江、库页岛等地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远在万里以外的俄国人对这个地区缺乏最起码的地理知识，所以一直到一八四九年为止，这样两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俄国佬大为苦恼的无法解决之谜。沙皇政府多次派人像窃贼一样潜入中国黑龙江地区要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但都是徒劳往返。一八四七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他上任后立即成立“后贝加尔哥萨克军”，积极准备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并派海盗式冒险家涅维尔斯科伊充当侵华

先锋，率武装“探险队”乘“贝加尔”号船只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一带“探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于一八四九年秋完成了“解谜”的使命而向沙俄政府报告说：黑龙江内可行海船，库页岛确是个岛屿。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写道：“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是贝加尔以东地带，而且可以控制得很牢固。因为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取得了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日趋稠密和工商业日趋繁荣的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纳贡者和属地。”^①一八五〇年，涅维尔斯科伊一伙非法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口庙街地区，并以沙皇尼古拉的臭名改称尼古拉耶夫斯克。他公然发布通告说：“鞑靼海峡沿岸和直到朝鲜边境的整个黑龙江边区，连同库页岛在内均属俄国领地。”^②这一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极受尼古拉称赞，他亲自授给涅维尔斯科伊勋章，悍然宣称：“俄国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升起来，就不应当再降下去。”^③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二年，“探险队”在黑龙江下游和滨海地区偷偷摸摸地继续活动。一八五三年，尼古拉一世下令侵占中国库页岛。

一八五三年五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彼得堡召开了讨论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御前会议，会上尼古拉指着地图上从尼布楚往东直至太平洋岸的黑龙江地区，得意忘形地狂叫：“这样一来，这是我们的了！”接着他指示陆军大臣说：“请就此事和中国人进行交涉。”^④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第十四号文件。

②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极东部的功勋》。

③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极东部的功勋》。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三十八章。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穆拉维约夫根据沙皇的命令和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大祭司巴拉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十分详细”的情报，制订了侵占黑龙江北岸的所谓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他除了调动大军外，还厚颜无耻地为沙俄政府出谋献策，鼓吹要赶紧利用“中国的内讧”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一八五四年五月，穆拉维约夫率领船只七十余艘，运载大批军队和枪炮弹药，横蛮地经石勒喀河闯入黑龙江，公然在下游一带屯兵筑垒，实行军事占领。一八五五至一八五七年，沙俄不顾清政府多次抗议，接连三次运来大批哥萨克军队和“移民”，配以“重炮物资”和“要塞武器”，擅自在黑龙江左岸建立大批军人屯村、炮台和兵站，妄图长期占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的中国领土。正如恩格斯在一八五七年所指出：“**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①

沙俄在加紧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同时，还把侵略魔爪伸入我国西北地区。我国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一直是处于清政府管辖下的。随着沙俄向中亚的扩张，魔爪逐渐伸入到这片中国的神圣领土。早在鸦片战争前，沙俄政府多次派遣官员潜入中国巴尔喀什湖地区进行所谓“勘查”“测量”和在湖内“捕鱼”等非法活动，俄国军队还非法侵入这一地区，在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之间强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一页。

筑侵略据点，扼住两湖之间通向塔城的通道。鸦片战争后更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一八四七年，沙俄侵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强占科帕勒等地，并建立市镇和兵站。与此同时，沙俄一再要求清朝政府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为通商城市，于一八五一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向中国无税销售商品和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立居留地等特权，加紧了对我国西北进行渗透和侵略。一八五四年，又侵占了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

综上所述，如果说英、法、美等国是从中国南方入侵的海盗，那末，沙俄则是从中国北方入侵的恶魔。

沙皇俄国的这些侵略活动，激起了中国边疆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强抵抗。一八五〇年，沙俄侵略者在距黑龙江口一百六十公里的特林刚一登陆，马上就有两百多村民愤怒地将他们团团围住，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一八五五年，沙俄侵略者为了强占中国西北塔尔巴哈台地区的一座金矿，开枪打死打伤十多人。当地人民愤怒万分，转眼就聚集了五、六百人，严厉谴责他们的暴行，烧毁了他们在当地的贸易圈子，并把他们赶走。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迫使沙俄侵略者不敢贸然在中国边疆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

二、英、法、美企图在中国扩大侵略

十九世纪中叶，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涨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在残酷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后，英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占世界第一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力图攫取更多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

场，中国仍然是它扩大掠夺的主要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开始遭到破坏，但就全国范围来说，自然经济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而战后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也使中国没有多少白银来购买其他外国商品。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急切地要求扩大中国市场，向中国倾销大量工业品，同时也绝不愿意放松罪恶的鸦片输出。为了既扩大中国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又保持罪恶的鸦片贸易，英国资产阶级早就催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他们要求在中国北方和内地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进一步降低中国的关税和子口税；要求派遣公使进驻北京，以便从政治上控制清政府；还要求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正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这种贪婪无厌的侵略野心，英国政府便不惜再一次诉诸武力，一手策划和挑起了“极端残暴的”“海盗式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显著发展。一八五一年起，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在法国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竭力在海外开辟殖民地，不断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法国侵略者早就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通过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对华贸易有了增加，但这种增长远远不能满足法国资产阶级的奢望。他们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强烈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特别想扩大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一八四四年的《黄埔条约》里，清政府被迫允许法国在我国通商口岸设立天主堂。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力图取得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以实现其利用宗教来进行侵略的野心。因此，法

国和英国沆瀣一气，联合发动了一场新的对华侵略战争。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其速度之快居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自一八四四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对华贸易有所发展，鸦片走私更为猖獗，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高额利润，因此力图扩大中国市场，以推销更多的美国鸦片和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曾公然表示：“美国人为商业或其他目的，有权进入中国境内之任何地区。”他认为：“只要整个内地都开放，中国就会成为美国工业品之最有价值的市场，其价值大于美国现时所能进入的全世界一切市场之总和。”不过，美国的侵华野心虽大，但实现这一野心的力量当时还很不足。这种情况决定它采取奸诈的两面手法：一面伪装“中立”，扮演“调解人”；一面趁火打劫，倚仗英法的武力对清政府恣意勒索，均沾侵略利益。美国政府的这种恶劣态度正如美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所供认的那样：“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奉派赴世界的彼端（指中国），手携篮筐，站在树下，静待树上的同伴将果实摇落，甚至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木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①美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就是以这样一个无耻的角色出场的。

伴随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九年又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自美国开始，象传染病一样蔓延到欧洲大陆。英国和法国恰恰在这个时候，发动了侵华战争，作为加紧开辟和压榨殖民地市场，逃避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而美国之所以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膺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六三页。

积极充当帮凶也出于同样的目的。这就充分地说明战争是资本主义进行掠夺和奴役的主要手段，战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

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四年英、法、美三国公使“访问”天京，妄图要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朝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阴谋没有得逞，侵略者决定利用中国的“动乱”，在清朝皇帝还可以“继续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的时候，先向清政府索取“干涉的报酬”，而后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英、法、美三国决定在“修约”问题上做文章，企图通过“修约”达到扩大侵略的目的。

关于“修约”，一八四四年《中美望厦条约》曾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亦载有与此相同的条款。中英《南京条约》中并无此项规定，但英国无耻地援引“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强要修改条约。显而易见，这完全是侵略者捏造的理由。十二年修改条约的规定，只是条约的附带条款，不是什么特权的给与，怎么可以用来作为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根据呢？何况前引条款已明确写明：“条约一经议定……不得轻有更改。”只是说“在贸易及海面各款”、“稍有变通”，怎么可以拈来作为要挟“修约”从而勒索更多特权的理由呢？正如《泰晤士报》的无耻供认那样：“英国营业的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底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①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者的强盗嘴

^① 转引自马克思：《划艇亚罗号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三十七页。

脸。据英国所提出的修约要点是：中国全境开放，至少是长江自由航行；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内地税；外国公使驻北京；鸦片贸易合法化；准许华工出国等等。这就远远超出了“稍有变通”的范围，实际上是要求重新订立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美、法两国支持英国的修约要求，以便从中渔利。

一八五四年，〈南京条约〉满十二年，英使包令就援引最惠国条款伙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再次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为诱饵，胁迫清政府修改条约。他们携带上述修约要点到广州，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英使的修约说帖中有“彼此会同设法肃清海滨盗匪”的条文，美使也提出：“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①

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时，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借口公务繁忙，避不见见，并回复他们说，条约没有作重大修改的必要。三国公使不肯罢休，便联合到上海向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提出修约的要求，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作为清政府同意修改的交换条件。与江、浙买办势力勾结较深的吉尔杭阿完全支持修约要求，竭力主张“允其所请”。咸丰帝认为这些“助剿”的代价太高，暂时他还不相信外国侵略者真心助战，加以拒绝。这时，英法和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日趋激烈，英法无暇再发动对中国的武装进攻，修约交涉暂时中止。

一八五六年，中美、中法〈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满十二年。美国侵略者又向清政府进行了一次修约交涉。美使伯驾在来华途中经由伦敦、巴黎，取得了英法两国的支持。这时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第二十页。

克里米亚战争已于二、三月间结束，英法两国侵略者已作出关于在中国扩大侵略的共同结论。英国公使提出“交涉”必须用舰队北上进逼京城，“一支威武的兵力在场，对于任何重要目标的达成，都是绝对必要的。”^①由于当时在华舰队的力量不足，英法两国侵略者对美使伯驾的修约活动只在外交上给予支持而没有参加。伯驾也没有达到修约的目的。十月间，英国侵略者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来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节 英、法发动侵略战争和 《天津条约》的订立

一、“亚罗号”事件和英、法联军发动侵略战争

一八五六年十月，中国水师在停泊于广州附近的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和其他有嫌疑的十名水手。“亚罗号”为中国人所有，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一八五五年九月曾向香港英国当局购过为期一年的船籍登记证，时已满期，所以没有挂英国旗。这件事，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英国侵略者为了挑起事端，蓄意歪曲和利用这一事件。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商船，并且捏造说船上悬挂有英国国旗，曾被中国兵勇侮辱。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照会，要求将被捕的海盗全部送回，并公开道歉。叶名琛是昏庸顽固、

^① 《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致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函》，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七八九页。

腐朽透顶的封建官僚，得到巴夏礼的照会后，最初虽加驳斥，但最终因惧怕扩大事态，采取妥协态度，将所捕获的十二人送交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得寸进尺，大耍流氓无赖手段，拒绝接受，说这是海军的事，并下最后通牒，限令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蓄意挑起战争。叶名琛对外国侵略者的挑衅，既不进行驳斥，也不作任何战守准备，坐等挨打。十月二十三日，英国侵略军闯入省河，向广州附近各炮台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开始。

当英国军舰向广州步步进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看乡试马箭，若无其事地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①他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②禁止水师抵抗，等待侵略军自行撤退。英国侵略军乘机于二十九日分成几路进攻广州城。英军攻破广州外城，一度冲进内城，四出攻掠，纵火焚毁民房五千余栋，总督衙门也被抢劫一空，英国侵略军的暴行，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无比愤慨，奋起抵抗。英军遭到中国人民的自发反抗，只得退出广州，等待援军，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乘机煽动战争。首相巴麦斯顿故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宣称“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同胞在地球上遥远的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强迫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伦敦《泰晤士报》大肆渲染，露骨地说：“由于这次敌对行动的爆发，现存的各种条约都作废了，我们大可按照我们的意愿自由自在地和中华帝

①② 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上，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一〇一页。

国安排关系了。”^①英国已经摆开架势，准备扩大侵略了。

法国侵略者早就对中国抱有野心。法国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进行侵略活动，一向十分猖獗。法籍神甫马赖在广西省西林县以传教名义进行间谍活动，一八五六年二月，被当地官厅逮捕处死。消息传到巴黎，法皇波拿巴就以保护教会为名，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因此，法国接到英国提议后，立即借口所谓“马赖神甫事件”，决定与英国共同向中国出兵。一八五七年，英国派额尔金，法国派葛罗为全权大臣，率海陆军出发，七月到十月，英、法联军五、六千人先后到达香港。

沙俄见有机可乘，一方面积极支持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并在“调停”的幌子下与英、法相配合，企图得到和英、法、美三国同样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陈兵边境，以武力胁迫清政府订约割地，承认既成事实，以达到吞併我国大片领土的罪恶目的。俄使普提雅廷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赶到香港，美使列威廉也在同一个月到达，他们表示支持英法的侵华战争。英、法、俄、美结成了对华侵略集团，发动一场“极端不义战争”^②。

十一月，额尔金和葛罗商定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骤，决定先侵占广州。十二月英、法两国向叶名琛提出照会，要求修订条约，进入广州城，赔偿军费等项，限十日内答复。叶名琛的态度是怎样呢？一方面，拒绝了英、法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下令解散团练，撤去海防，摆出一付“和平”

① 转引自马克思：《划艇亚罗号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三十七页。

②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十四页。

的样子，企图取得侵略者的谅解。他还求神拜仙，迷信乱语“过十五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必无事”。叶名琛这种腐败昏庸的态度，曾有人讽刺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①他以这种态度对付外国侵略者，无异为侵略军扫清道路，打开大门。十二月二十九日，英、法侵略军攻陷广州，叶名琛逃匿。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投降，侵略军入城，大肆抢掠，库银二十余万两也被抢去。侵略军俘获叶名琛，把他押送到印度加尔各答拘留起来。叶名琛在囚禁中为洋人写诗作画，无耻地自称“海上苏武”，一八五九年死于加尔各答。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后，便组织了三人委员会，让卖国投敌的原广东巡抚柏贵在这个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下继续任职，充当他们的傀儡。柏贵为虎作伥，出告示收缴民间武器，禁止人民的反抗运动。

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的态度截然相反，又一次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外国侵略者展开了坚强的反抗斗争。

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后，发兵进攻广州，到处烧杀淫掠，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州人民和部分爱国士兵奋起反抗，城厢内外，水陆乡勇，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放火烧掉了敌人盘踞的十三行洋楼，把英军赶回船上。一次，有四只放火筏突然顺流而下，朝着一艘英国军舰直撞过去，使这艘军舰濒于毁灭。又一次，一艘英国

^①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货船停泊在港口，几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船旁，活捉了英国船长。还有一次，英国邮船“提斯特尔”号尾系划艇一艘，满载从广州抢来的珍玩重器，到虎门停泊，夜间突然遭到数百艘中国小船围攻，吓得侵略者慌忙割断划艇绳索，狼狈逃窜。英艇停泊的地方，每夜都有中国小艇进行袭击。侵略者处处挨打，昼夜不得安宁，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一八五七年一月，广州人民斗争更加激烈。几百艘中国沙船和划艇，多次同时在各线出击，围攻英舰，英军招架不住，只得滚出广州，等待援军，再发动新的进攻。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在强敌入境的严重形势面前，广东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三元里九十六村人民又一次举起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正义大旗，联络南海、番禺两县义民在佛山镇成立以反侵略为宗旨的团练局，集义兵数万人，拿起武器，打击汉奸，实行坚壁清野，大义凛然地宣布：“夷人入其界者，登时格杀勿论”。^①他们英勇击退侵略军的巡逻队，又粉碎了侵略者的走狗劝说他们放下武器的阴谋，使侵略者望而生畏。顺德、东莞、新安等县人民，也纷纷起来自卫。

一八五八年六月初，东莞县乡勇把挑战书贴到敌人盘踞的将军衙署门前，写道：“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②巴夏礼亲自率领一支一千多人的侵略军前来榕树头骚扰，东莞乡勇预先埋伏在树林中和僻静小道上，待侵略军进入伏击圈后，齐出截杀，一

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三，第九页。

② 华廷杰，《粤番始末》卷上，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一二三页。

举歼敌数百人。侵略军纷纷逃窜，陷在水田的淤泥中，拔不出脚，狼狈万状；巴夏礼也跌下马来，几乎被俘。英国侵略者攻占广州后，竟在黄埔树立旗帜，当地人民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于夜间将旗绳割断，使旗颠仆。广州人民勇敢机智的战斗，打得敌人胆战心惊，龟缩在广州旧城内不敢动弹。巴夏礼无可奈何地承认：“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三千英军，还有约半数的英法水兵在一起，被衣服褴褛的团练八千至一万人所威吓，所困扰。”^①

在广东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港、澳爱国同胞和国外爱国华侨，也纷纷起来反抗外国侵略者。在香港和澳门英国人机关和家庭中服役的两万多名中国教师、工人、办事员和其他雇员一齐罢业抗议。沙捞越爱国华侨和当地人民共同举行起义，痛击英国侵略者，有力地声援了广东人民的斗争。

英国侵略者曾叫嚣：“象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②在广东人民的打击下，侵略者的这种妄想化成了泡影。

中国人民这种正义斗争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热烈赞颂。他写道：“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③

① 兰波尔：《巴夏礼传》第一卷，第二八五——二八六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十三页。

③ 恩格斯：《波斯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二十一至二十二页。

三、英、法联军北犯大沽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准备北上进攻京、津，以便对清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美、俄公使积极支持英、法联军北上。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英舰十多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北上，陆续到达白河口外。四国公使各自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立即举行谈判。清政府直求总督谭廷襄和耆英前去谈判。英、法侵略者故意在清政府所派的代表是否具有全权大臣资格的问题上多方挑剔，拒不与议，以便拖延时间来加紧战争准备。俄、美两个强盗则伪装中立，表示愿意在清政府和英、法之间进行“调解”，实际上是麻痹清政府的警惕。美国专使的行径异常狡猾，他得知英、法决定次日发动进攻的消息后，立即训令谈判代表要绝对保守秘密，并“不动声色地马上中止进行中的谈判”，“丝毫不让中国人知道联军意图”^①。美国使节完成了欺骗的任务，悄悄地躲在一边，“静候联军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便可以得到他们所争取到的一切”。俄国公使更加卑鄙，一心想借英、法之力，牟取俄国私利。当时英、法、美三国军舰都停泊在白河拦江沙以外，英、法侵略军头目每逢进口，都必定要到沙俄军舰上与普提雅廷会见，普提雅廷也常常前往拦江沙外英、法、美船上，去通风报信，出谋献策。

五月二十日，英、法侵略军已准备就绪，对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英、法军舰开炮轰击大沽炮台，掩护步兵登陆，清政府负责指挥战争的官员，毫无准备，“一闻炮声，心胆

^① 转引自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一四一页。

先怯”^①，纷纷逃命，只有下级官兵奋起抵抗，开炮还击，并在炮台上开展肉搏战，死守炮台，使炮台三次失而复得。最终因无援兵，遂使大沽炮台失陷。

大沽炮台失守，清政府十分恐慌。谭廷襄是一个同叶名琛同样昏庸腐朽、畏敌如虎的封建官僚，他连忙要沙俄公使普提雅廷到天津进行“磋商”。普提雅廷临走前，与英、法侵略军头目共商对策，再次大肆煽动说：“只有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答应各项要求。若有迁延，清政府有可能在津、京一带部署防御，进行抵抗。”普提雅廷到达天津后，又写信给美国公使，要他敦促英、法侵略军“不要坐失良机”，说这样大家都能得到很大好处。额尔金、葛罗之流，对这一建议当然十分欣赏。五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并扬言即将进攻北京，压迫清政府屈服。当时，天津人民纷纷起来自发抵抗，斗争意志十分高昂，使侵略者感到惊慌。可是，清朝政府既害怕外国侵略者，更害怕京、津一带人民拿起武器反击侵略者，他们把人民的反抗诬蔑为“内变”，叫嚷“御外以靖内为先”，谭廷襄实行“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②的投降方针，自动放弃天津，退驻到离城很远的地方。他还指派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专为侵略者服务，从安排住所，到供给牛羊、鸡鸭、蔬菜、乘马、肩舆等等。只要侵略者“一与之言，无不响应”。交战一方对另一方招待得这样殷勤周到，这种事情只有卑鄙无耻的清朝官僚们才干得出来。当时天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四，第二十三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二，第三十一页。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惧夷者官也，非民也，惧夷之甚者大官也，非小官也。”^①这反映了实在的情形。

当时清朝政府正将庞大的兵力集中在南方，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起义。清统治者还十分担心京、津一带由于遭受严重旱、蝗灾害，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随时可能爆发起义，他们认为“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②，决定向侵略者投降，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咸丰帝在敌兵压境，门户洞开的情形下，更是惊惶失措，连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到天津求和。

六月初，谈判开始，狡诈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纵横捭阖，软硬兼施，一会儿以英、法将发动新战争相威胁，一会儿又佯作同情清朝政府愿出面斡旋，诱迫清政府于六月十三日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美国侵略者也以同样手法，于六月十八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而英、法侵略者气焰更为嚣张，额尔金、葛罗甚至拒不出面，仅派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等参加会谈。他们在谈判时态度极其骄横狂悖，胁迫清政府全部接受前此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不但在项目上不准讨价还价，就是更改一字也不允许，甚至连条约中文本的译文，也得由他们决定。清政府慑于侵略者的淫威，终于接受了全部条款，六月二十六、七两日，分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四十二款，附约六款。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六，第三十三页。

② 同上，卷二十七，第二页。

规定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

英、法、美、俄四国通过新的不平等条约，大大扩张了在华侵略权益。《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公使驻北京。以前，外国公使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与地方官吏打交道。派公使驻京，外国侵略者就可以从政治上直接控制清政府。

(二)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改台南）、淡水、潮州（后选定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从此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了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游。

(三)英国人，法国人可入内地通商、游历；外国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

(四)外国兵船可驶入长江各通商口岸。这就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沿海和沿长江的防务，进一步丧失了军事上的独立性。

(五)规定外国人之间的所有纠纷，以及他们的一切刑事犯罪行为，中国官员都不得过问。涉及中外两国人的民事案件，必须由外国领事官会同中国官员审办。这就进一步扩大领事裁判权，实际上保证侵略者任意为非作歹不受惩罚。

(六)对英国赔款四百万两，对法国赔款二百万两。

《天津条约》还规定修改税则，一八五八年十一月，清政府派员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订定新税则：（一）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改名“洋药”，每担收税银三十两。（二）外国人用品免征进口税，其他进出口货物照新定税则纳税，即一般进出口货物按时价百分之五抽税。（三）洋货运销内地，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子口税，免缴厘金和常关税。（四）各口税收划一办理，邀请英人帮办税务。上海海关管理权已于一

八五四年被外国侵略者攫去，侵略者就根据这一含混规定，硬要各口海关都按照上海海关“划一办理”，任用外国人为税务司，从此海关管理权全部落入外人手中。在这种税则下，大大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上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严重地阻扼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而旧的手工业也必然大遭破坏，表明了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四、沙俄逼订《璦琿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除了和其余三个《天津条约》相同的规定外，还特别规定：“所有未定边界，由两国派员秉公查勘。”这是企图借勘界为名，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恩格斯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这一阴谋，指出：俄国“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①。在中俄边界上沙俄侵略者正是这样干的。

一八五七年初，沙俄在派出普提雅廷使团前来中国从外交上进行讹诈的同时，在军事上密令穆拉维约夫加紧准备，加强对黑龙江地区的占领。到今年六月，穆拉维约夫已在黑龙江一带和蒙古边境集中步兵一万六千人，骑兵五千人，炮兵一千人，并在伊尔库茨克等地集中大批后援部队，随时准备对中国开战。他当时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武装侵略计划，准备在这年秋天，当普提雅廷无法在外交上达到其目的时，即分兵三路入侵中国：一路进攻库伦，另一路进攻璦琿，第三路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九页。

越过额尔古纳河深入黑龙江以南地区。”^①穆拉维约夫露骨地叫嚷：“我们必须用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既然英法有权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其条件，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种权利呢？”^②

一八五八年五月，正当英、法侵略军北上进逼京、津，清政府内部慌作一团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指示穆拉维约夫要利用中国政府对付西方强国而急于想和俄国调整好关系的机会，和清政府进行谈判。于是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侵略军再次闯入中国黑龙江地区，以武力为后盾，气势汹汹地要求清政府开始边界谈判。他于五月二十一日，即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后第三天，突然乘兵船直趋瑗珲，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骇人听闻的领土要求。谈判一开始，俄方就拿出事先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河（黑龙江）为界字样，断不能改”，强迫奕山签字画押。谈判过程中，穆拉维约夫恬不知耻地声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沙俄舰船一再武装航行于中国内河黑龙江，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要塞，是为了所谓“帮助防范英夷”，不但有利于沙俄，也“有利于中国”。他根据这个强盗逻辑，提出领土要求，并要居住在黑龙江北岸的中国鄂伦春、赫哲、费雅哈等各族人民，迁往江南，同时他还使用种种威逼手段，“举止猖狂”，扬言如果不从，俄国就要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在谈判的同时，俄兵船在黑龙江举行示威，炫耀武力，黑龙江上和对岸“枪炮声不断”。奕山这个懦夫早在一八四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被英国大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五十六章。

② 同上。

炮吓破了胆，现在，沙俄的大炮对奕山又奏奇效。他报告清政府说：对俄国“本不当迁就了事，均应查照旧例，分定为是。第势处万难，若不从权酌办，换给文字，必致夷酋愤激，立启衅端。”^① 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横蛮要求。五月二十八日，奕山被迫订立了中俄《璦琿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沙俄割去，仅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民“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为两国共管之地”。就这样中国的一条内河黑龙江变成了俄中之间的界河，在近代史上我国领土这样大片的丧失还是第一次。沙俄政府“庆祝”《璦琿条约》的签订，将璦琿对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布拉戈维申斯克）。穆拉维约夫也因侵华有“功”，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破格封他为“阿穆尔（黑龙江）伯爵”。

对于这个不平等条约，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指出：“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② 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③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五。第十四—十五页。

②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四—三十五页。

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七页。

第三节 英、法侵略联军再次燃起战火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一、英、法侵略者重燃战火

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欲壑是永无止境的。《天津条约》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条约，但它们仍不满足。一八五八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新的发展，推动着它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在《天津条约》签订后就断言：“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①事实正是这样，外国强盗得寸进尺，苛求无厌。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认为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太少，《每日电讯》叫嚣说：“条约中有关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②。决定找新的机会，再挑起战争，扩大侵略，攫取更多的权益。而清政府这时却在幻想挽回一些所谓有损“天朝尊严”的条款。《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联军从天津退到上海。一八五八年七月，咸丰皇帝命桂良、花沙纳南下到上海与英、法侵略者谈判通商税则等问题，提出清政府以“全免税款”为条件，要求侵略者删除条约中规定的“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赔偿兵费”等四项条款。桂良等到上海后，不敢向侵略者提出删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咸丰帝无奈，还想在外国公使进京换约问题上挽回一些所谓“天朝”的尊严，提出公使不得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十一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四页。

坐轿及多带随行人员，见皇帝要行跪拜礼。腐朽反动的清政府只要能保全皇帝的体面，什么民族利益都可以出卖给外国侵略者的。

为了使清政府俯首帖耳地实现《天津条约》规定的条款，并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英国于一八五九年派公使卜鲁斯来华换约，并命他带领“充足的海军兵力”作为后盾，蓄意再次用武力进行要挟。六月初，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率军舰到大沽口，借口进京换约，强行要求驶进白河。清政府叫外国使节走北塘，遭到英、法公使无理拒绝。

二十五日，英、法军舰突然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企图用武力强行登陆，打开从天津进京的通路。中国士兵被迫还击，奋起抵抗，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踊跃支援，“馈送面饼食物，于矢石交下之时，运赴营盘，络绎不绝”^①。经过炮战一昼夜，击沉敌人军舰五艘，打伤六艘，俘虏两艘，打死打伤英、法军四百多名，英军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他的副手则伤重毙命，法国舰队司令也被打伤。英、法侵略者在舰上竖起白旗，仓皇退出海口。在大沽战役中，美国舰队司令达特纳高喊：“血比水浓”（按：意即同种族比异族更亲密）的口号，公然命令发炮助英法作战，但也挽回不了败局。

大沽之战是外国侵略者有意寻衅而挑起的，中国守军被迫实行抵抗，完全是正义的行动。马克思指出：“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九，第十九页。

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问地也是有理的。”^①

狡猾狠毒的美国侵略者，一方面援助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另一方面却于大沽战后悄悄地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由北塘登陆去北京，与清政府交换了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

英、法侵略者在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引起了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争吵和混乱。英国报纸大肆咆哮，再次发出战争狂叫，要“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每日电讯》写道：“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应该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们为俄国在帝国满洲边境所取得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②这种狂妄的叫嚣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贪婪的侵略野心和残暴凶狠的本性。法国也在国内积极策划新的侵略战争。

清政府虽然在上年打了个胜仗，但是它却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上，对外但求妥协，根本无意作持久的抵抗，屡次命令僧格林沁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十三页。

②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十二——四十三页。

功挑衅”。而且还幻想乘胜与英、法谈判，对《天津条约》作若干修改。于是撤去北塘的防御设备，以便英、法使节登陆换约。但侵略者不理睬这一套，决计派兵再战。

二、天津、北京陷落和《北京条约》

一八六〇年春，英国派额尔金为全权公使，贺布为海军司令，格兰特为陆军司令；法国政府派葛罗为全权公使，谢尔纳为海军司令，蒙达朋为陆军司令，率兵舰和运输舰二百余艘、海陆军二万余人，陆续开到中国。七月，闯到大沽口外。不久，一场新的更为猖狂的侵略战争就展开了。

一八六〇年八月初，英、法军舰三十多艘，乘虚而入，由北塘登陆，继而进攻新河、塘沽，包抄大沽口的后路。二十一日攻陷大沽，僧格林沁逃回通州，侵略军从白河长驱直入，天津陷落。侵略军每占一地，都遭到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抗击。当侵略军进犯新河时，僧格林沁所部士兵，勇敢抵抗，马队三千人几乎全部阵亡。

天津失陷后，英、法联军提出开天津为商埠，增加赔款，公使带兵进京换约，常驻京城等条件。咸丰帝令桂良和直隶总督恒福（这时花沙纳已死去）等往天津交涉，承认天津开商埠以交换公使驻京一款，增加赔款、带兵换约两条绝对不许。侵略军进行要挟，宣布谈判破裂。九月上旬，侵略军向通州进军，咸丰帝急忙派怡亲王载垣到通州议和。但是通州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因为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换约时带一千名军队入京，并要清政府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这是清政府所难于接受的。其实侵略者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他们所需要的是直接向北京进攻，胁迫清政府接受全部要求。九月下旬，侵略军攻占通州，进逼北京。咸丰帝率领后妃和一些大官

僚；仓皇逃奔热河，令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作为投降的代表。当侵略军逼进北京城外时，“督办和局”的奕訢逃到长辛店藏匿。北京城墙高大，城内还有好几万清兵，侵略者估计不容易攻破，便趁机提出要占领北京一个城门，作为议和的条件。胆小如鼠的清朝王公大臣无耻地答应了那个狂妄要求。十月十三日，侵略军不发一弹，占领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几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京城就这样未经抵抗就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所占领。

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起，就兽性大发，所到之处，屠杀焚掠，奸淫虏掠，无恶不作，尤其是侵入北京后的抢劫和烧毁圆明园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

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海淀，周围有三十多里，是清朝统治者榨取人民血汗经过一百五十余年扩建经营而成的壮丽宫苑，园里精美无比的建筑，是中国劳动人民精心制造的园林艺术的典范，也是世界上最豪华瑰丽的宫殿之一。圆明园还藏有各种无价的珍宝、罕见的典籍、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外国强盗疯狂掠夺了圆明园。法国公使葛罗供认：“以掠夺圆明园为高潮的抢劫的结果，一个士兵口袋里有了二万、三万、四万、甚至一百万佛朗，……据说一个团指挥官的珍珠和金钢石，就值八十万佛朗以上。”^①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是：“据估计，被掠夺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磅。”^②外国强盗抢走圆明园的文物财宝以后，

① 柯士丁：《英国与中国》，第三三六页。

② 《北京的和平》，见《泰晤士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四日。

为了灭迹，放火把它烧毁。侵略军还在北京近郊大肆烧杀淫掠，这些就是外国资产阶级标榜的所谓“文明”。

中国人民决不许外国资本主义强盗横行霸道。当英、法侵略军一爬上北塘时，就遭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九月间，天津有王兴邦、隋登初等率领群众焚烧敌船，截杀敌兵。十月间，北京西郊谢庄的猎户冯三保招集村民打败了一百多个侵略军的进攻。他的女儿冯婉贞为了防备侵略军重新回来进行报复，立即组织一批青少年猎手在丛林中埋伏，果然，侵略军开来五、六百人，并拖着大炮，企图轰平谢庄。冯婉贞看到大队敌军走近时，乘敌不备，突然一跃而起，带领猎手杀向敌军，经过激烈战斗，敌人战败狼狈逃窜。眼看敌军退去，婉贞对众人说，敌人退去是想利用炮火轰击我们，只要我们奋力冲锋，冲到敌人跟前，用刀劈，剑刺，敌人的洋枪洋炮就不能发生作用。于是，众人高呼：“冲锋！”冲散了敌人阵脚，使“彼此踏杂，纷纭拏斗，敌枪终不能发”。战斗到天黑，打死打伤侵略军百多人。敌人“弃炮仓皇遁，谢庄遂安”。^①英、法侵略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中国人民沉重的打击，致使侵略军“畏百姓甚畏于兵”。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反抗侵略的道路。

卖国的清政府却和人民走着一条根本不同的道路。就在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同时，恭亲王奕訢正在无耻地和侵略者互换照会，接洽投降。圆明园余烬未熄，清政府已在沙俄公使的“调停”下，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各项要求。于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先后签订了中英、

^① 徐珂：《晚清琐闻杂记》。

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也于同时互换。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

(一)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二)增开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华工出国；(四)割九龙司给英国；(五)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包括《天津条约》赔款在内)，由海关税收扣缴；另“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六)交还教产给天主教堂。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甫在葛罗指使下，又在条约中文本中偷偷地加入“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文。

十一月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与奕訢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详下节)。

美国国内这时南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驻华公使华若翰已先期回国，没有签订新约。但根据“利益均沾”的规定，美国侵略者实际上也获得了《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各项侵略特权。

三、沙俄逼订《中俄北京条约》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璦琿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为两国共管之地”。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侵略者就开始强行并吞这一地区了。一八五八年到一八五九年，沙俄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几十个军人村屯，用武力拆毁那里的中国卡伦(哨所)，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和守土官吏。穆拉维约夫直言不讳地供认：“现在我正下令将一切中国官吏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即东岸)驱逐到左岸去。并命令将抗拒者用武力加以拘捕。押往璦琿。”一八五九年五月后沙俄以海兰泡、伯力为侵略据点，不断派遣武装船队和所谓“勘察队”，侵入乌苏里江，在兴凯湖、绥芬河、琿春一带。一八五九年底，穆拉维约夫接到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密令，在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时，“应立即派兵实际占领上述边境——乌苏里江右岸。一旦季节到来，当地方情况允许时，立即派船占据满洲各港。”^①在这一指令下，穆拉维约夫等侵略头目更大规模地调兵遣将，强占沿乌苏里江和直至朝鲜沿海各港口等许多地方，驱逐中国官吏，强立界牌，妄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迫清政府承认。一八六〇年六月，沙俄侵略者进一步占领中国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强盗原形，暴露无遗。

在武装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同时，沙俄政府又派遣伊格那提耶夫出使中国，加紧压迫清政府签订新的割地条约。一八五九年六月至次年五月，伊格那提耶夫在北京大肆活动，恣恻不休地要求将乌苏里江以东割给俄国，声言如果不遂所欲，中国就要冒同时对英、法、俄作战的危险。清政府驳斥说：“乌苏里河右岸，……系中国地方，岂能擅行借给外国占住。倘有人到贵国侵占地方，贵大臣等岂肯允从。”^②并多次指出，乌苏里江绥芬河等处，“距兴安岭甚远”，“与贵国（沙俄）毫无毗连之处”^③，根本说不上“查办地界”的问题。伊格那提耶夫讹诈未成，愤愤离京。前赴上海与英、法侵略者加紧勾结，积极充当他们的帮凶。

一八六〇年夏，英、法联军北上进攻天津、北京，伊格那提耶夫把白河沿岸清军防务的“准确情报”告诉了法国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六十六章。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十七第一页。

③ 同上书卷四十一，第一页。

人^①，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十分狼狈，这时伊格那提耶夫马上献策，要英、法侵略者采取“强硬行动”，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联军从天津北犯前，他又据充当特务的北京俄国传教士固礼密报，得悉清政府“正在通州集结大批军队，皇帝的全部重炮队已从通州向北京调动”，连忙把这项重要军事情报通知额尔金和葛罗。并怂恿他们“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指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②联军进犯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又同他们一起研究攻城计划，向他们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并将俄人私自测绘的北京地图交给英国人使用。当时英军将领奥勒古满意地写道：“俄使伊格那提耶夫将军正在我们的营帐中，他已将一分我从未见过的最好的北京地图借给我们，这张地图比我们自己的更好，更详尽，他把所能提供的有关北京的全部情报给了我们。”^③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伊格那提耶夫急忙赶到北京，帮助英、法侵略者开展对清政府的逼降活动。他一方面假装成清政府的“公正保护者”，恬不知耻地宣称“只有俄国真诚地对清朝友好，只有它能够挽救你们”；另一方面大肆恫吓，说什么“在目前情况下，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④伊格那提耶夫就是这样无耻地帮助英、法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当时法国人坦白承认：“我们全靠伊格那提耶夫将军的斡旋，

① 加迪：《法国在东亚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

②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

③ 奥勒古：《一八六〇年对华战争·书信和日记》。

④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

才使恭亲王迅速地作出决定。”^①英、法侵略军一从北京撤退，伊格那提耶夫立即向清政府索取进行“斡旋”的“报酬”，提出大量领土要求，公然威胁说：如不接受这些要求，“俄国可以严厉地惩罚你们。……你们国家与我国有一万俄里长的陆地边界，俄国在你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给以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你们知道俄国有多少陆军，知道我们的一个分舰队停泊在渤海湾。”他又说：“把联军叫回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只要致函英、法公使说他们同中国订立的条约不牢靠，需要修改就行了。”^②清政府这时惊魂未定，在伊格那提耶夫百般恫吓之下，深怕“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佛（法）为患”^③，于是完全屈服。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伊格那提耶夫与奕訢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共十五款，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所有的大片领土，由《璦琿条约》中的所谓“共管”，变为同黑龙江以北一样，割归沙俄。从此，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中国领土又被沙俄一口吞掉。

沙俄背信弃义地撕毁确定中俄东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悍然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这种穷凶极恶的强盗行径，不能不激起我国人民的反抗怒火。

身受其害的东北人民，对沙俄的侵略暴行，无不切齿痛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刨夫”（以采捕为业的贫民），不能容忍沙俄肆无忌惮地侵占国土，在徐得林、张登瀛的串连下，先在小绥芬河一带自发组织起来，设营十二座，在短

① 易理逊：《一个译员在中国的日记》

②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短的两三个月里，就从乌苏里江到东南濒海地区的苏城一带，增加到一百五十余座，共一万多人，星罗棋布，随时打击俄军。当地少数民族，踊跃助守卡伦，侦察敌情，赫哲族的妇女，用砍柴斧头同沙俄强盗搏斗，表现出凛然无畏的精神。一八六〇年五月，居住在阔吞屯附近的赫哲族三十户，二百六十九人，因不堪沙俄压迫，带着牲畜船只，迁移到松花江一带，誓死不做沙俄的殖民地奴隶。分布在琿春以东滨海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也大批迁到琿春。黑龙江北岸村屯的居民，自发地反抗沙俄入侵，坚决拒绝侵略者逼迫他们出卖粮食的要求。一八六八年，乌苏里江东南青岛地方的人民，不甘屈服于沙俄的殖民统治，发动起义，同沙俄殖民强盗进行战斗，杀死杀伤俄官兵数人。沙俄从海参崴调遣兵船，围攻青岛。起义人民同苏城等地人民联合起来，将“黄岛、石庙子、蛤蚂塘一带俄卡焚毁”，并将守卡俄国官兵杀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了二三千人。外国侵略者的走狗清政府，竟派副都统乌勒兴阿同俄官会商“剿办”，丧心病狂地向俄官保证“所有被击逃出者，我（清）兵务必戮杀净尽。”这次起义虽然在沙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沙俄残暴统治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俄北京条约》又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一八六二年，两国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的原则规定议分西界，谈判时，俄国代表大耍花招，在“常住卡伦”字面上做文章，硬要以“现在中国常住卡伦为

界”，并拿出早已画好的把中国的常设卡伦以外的领土全部划入俄国版图的地图，图上用红线表明的边界线，远远超出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和边界走向，妄图割占更多的中国领土。按照清朝的制度，边界卡伦分为三种：一、常住卡伦，即设在一个固定地点历年不移动的；二、移设卡伦，即有季节性的如春秋两季迁移的卡伦；三、按情况需要而时添时撤的卡伦，称添撤卡伦。卡伦是边防军的驻所，并不是界址的标志。常住卡伦往往设在边界以内数十里数百里乃至成千里的地方，因此，在常住卡伦的外面有大片土地是中国的领土。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沙俄代表蛮横地坚持以常住卡伦为边界线，强迫清政府按照俄方提出的划界方案签字画押，声称“如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回国，只好派兵强占”^①。沙俄侵略者在进行外交讹诈的同时，大规模调兵遣将，依照它的“划界方案”实行实际的占领。在中国西部长期侵略活动的沙俄侵略分子巴布科夫无耻地供认：他们也像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我国（沙俄）与中国东方国界完全同类事件中所掌握的那种办法”，即“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我们外交上的要求”^②。沙俄侵略者不仅派兵侵占中国常住卡伦以外的大片领土，并多次出动军队袭击博罗胡吉尔等卡伦，甚至扬言攻取喀什噶尔和伊犁，进行军事恫吓。但是，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他们对沙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例如，一八六二年侵略分子到斋桑湖地区进行所谓“测量”等侵略活动时，遭到中国人民群众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九第二十一页。

②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三篇第六章。

的打击。沙俄侵略者惊呼：“他们甚至敢于同我国（沙俄）地形测量工作组中的哥萨克护卫打架，……（并）声明他们将不容许在他们的牧区里进一步进行地形测量”^①。又例如，一八六三年五月，当沙俄侵略军侵入中国博罗胡吉尔卡伦时，我国军民奋起向这些不速之客攻击，沙俄强盗伤亡多人，中尉部队长安东诺夫当场被打死。^②侵略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一贯投降卖国的清政府，于一八六四年十月，在俄国的武力威迫下，与沙俄签订了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通过《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侵略者通过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十足的野蛮和无耻结合在一起的反动政策，未放一枪一弹，不费一兵一卒，就轻而易举地霸占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四个半浙江省。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中，沙皇俄国是劫夺中国领土最多的一国，也是镇压中国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间，“实际从海盗式的中英战争中最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但是，早已背叛列宁遗训的苏修叛徒集团，对当时被列宁愤怒痛斥为“象野兽一样”侵略中国的老沙皇，却大肆涂脂抹粉，百般辩护，苏修叛徒集团伪造的《中国近代史》，胡说什么沙俄与西方列强不同，对中国奉行“力求建立睦邻关系”的政策，“沙皇政府既未曾主动地把

①② 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三篇第五章。

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也未曾主动的维护一八六〇年以后的一系列条约”。《真理报》还为该书的出版大吹大擂，专门写了评论，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把老沙皇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鲸吞中国大片领土，说成“这种关系的睦邻形式却是主要的”^①。但是老沙皇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是无法抹煞的历史，侵吞中国大片领土是明摆着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妄图用伪造历史、颠倒黑白的无耻手段，为老沙皇昨天的卑鄙的侵略罪行辩护，并妄想以此为他们今天的扩张主义政策制造依据，这是拙劣的，徒劳的。相反，它却告诉人们：苏修叛徒集团已全盘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正在沿着老沙皇的扩张主义老路走下去，苏修叛徒集团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但是，时代不同了，中国人民已站起来了，苏修叛徒集团想用老沙皇的那一套来对付伟大的中国人民，必然是自掘坟墓。

四、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全面勾结

侵略中国，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一贯的对华政策。对侵略者屈膝投降，对人民残酷镇压，这是封建地主阶级始终不变的反动本性。虽然中外反动势力在争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奴役的特权中，常常发生矛盾和争吵，但是，他们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则是完全一致的。当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威胁着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时候，中外反动派便勾结起来，合伙镇压中国革命。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侵略者不但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权利，而且迫使清政府驯服地和他们合

^①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真理报》。

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扩大侵略利益是绝对必要的前提；清朝统治者经过侵略者的一打一拉，意识到外国侵略者并非要消灭它的王朝，而是要它更驯服地出卖民族利益，就能得到侵略者的欢心，侵略者就会帮助它绞杀人民革命。恭亲王奕訢就提出，外国侵略者只是“肢体之患”，而人民革命才是“心腹之害”^①的卖国理论，甘心充当外国侵略者的鹰犬。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早从一八五四年起，外国侵略者已经和清朝地方封建买办势力开始勾结，镇压人民革命，例如在上海镇压小刀会，在广州镇压三合会，这种勾结还带有地方性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订立，清政府已由被迫屈服，进而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控制。在签订〈北京条约〉的宴会上，外国侵略者弹冠相庆，加紧和清政府勾结，法国公使葛罗宣称：“又请于海口助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②沙俄公使对奕訢表示：“发逆在江南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合击，必可得手。”^③英国则声称：“一旦真诚的外交关系（！）开始，我们就可以给你们任何援助。”至于美国，早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就公开支持华尔的“洋枪队”，屠杀中国人民了。中外反动势力就在这种“打拉”政策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勾结起来。

此后，清政府就无耻地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而西方资产阶级为要使自己在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第十八页。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第一页。

③ 同②。

中国抢得的权益全部兑现,也必须保住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让它有能力履行条约。如《天津条约》内关于长江通航和汉口、九江、镇江等地开为商埠等侵略要求,实际上就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太平天国的具体协议。所以,这场侵略战争一结束,外国侵略者便在“助剿”的名义下,撕下“中立”的伪装,提刀上阵,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第四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英勇斗争

第一节 韦昌辉、石达开的变乱

一、太平天国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一八五六年的夏季是太平天国军事、政治上的全盛时期。西征军的节节胜利，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声势壮盛；江北、江南大营的被击溃，清军主力溃散殆尽，天京的威胁解除；全国各地反清起义高涨，清政府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形势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太平天国的内外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随着革命的胜利，敌人在各条战线上的挣扎也更为疯狂。清政府采取了“有剿有抚”的反革命策略，除了在军事上加紧反扑外，加强了对革命队伍内部的破坏工作，打进来，拉出去，妄图从内部来瓦解、削弱太平军。例如混在南京城里的奸细张继庚（廩生），到处造谣挑拨，说“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并七次向江南大营头子向荣递送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和民情的情报。外国侵略者也公开叫嚷：“照现在形势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①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反

① 《天京见闻录》。

映到太平天国内部来。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首先，有大批人涌入太平军，这就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很多人是真正为革命而来的，有些人是随大流而加入的，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机分子、地主分子或是敌人的间谍。如何纯洁内部、清除敌人？如何对新入伍的大批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提高对革命的认识？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革命就将受到严重阻碍。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它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只能用拜上帝会的宗教说理和严刑峻法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当然不能解决这项艰巨复杂的任务。革命队伍的日益不纯，剥削阶级思想的不断侵入，日益严重地影响革命队伍的士气、团结和纪律。

其次，自从革命发展到大江南北、获得了大片根据地和包括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以后，太平天国的物质条件比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要好多了，但接着产生了如何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问题，特别是素称繁华之地的江南一带，剥削阶级的力量和影响是较大的，对于太平天国战士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来说，如何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起义之初，太平天国从领导到一般战士，都过着艰苦朴素的战斗生活，但在进入南京之后，一些领导者经不起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滋长了享乐思想，他们动用众多的人力、物力兴建王府；制订各种繁文褥节，讲究排场等级。这种追求享乐思想和行动，使他们逐渐脱离广大战士和群众，互相间的团结也开始涣散，拉山头，争夺个人权力的现象日益发展，给阶级异己分子发动反革命变乱提供了机会。

二、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

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混进太平天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是埋在革命堡垒内部的定时炸弹。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投机革命，钻进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窃取了北王和翼王的要职。太平天国的广大将士在洪秀全领导下，浴血奋战，打出了一派大好革命形势。但是，韦昌辉和石达开的地主阶级本性和反动立场却丝毫未变。他们在革命队伍内部，兴风作浪，结党营私，逐步形成了反革命的宗派集团。阴谋伺机篡夺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力，改变太平天国的革命路线。阴险狡诈的韦昌辉，早就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①，他一贯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对洪秀全极力逢迎，对杨秀清百般谀媚，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有意制造和扩大杨秀清和洪秀全之间的矛盾，准备伺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洪秀全对韦、石的行动虽然有所察觉，也加以处责和调职，但是，洪秀全毕竟是农民革命领袖，不可能辨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革命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简单地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看成是“兄弟”之间的一般过失，识不破他们的反革命的真面目。而杨秀清威逼天王图谋夺权所造成的矛盾，给了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可乘之机。

杨秀清在永安被封为东王后，一直执掌着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于洪秀全的领导和广大革命军民的支持，杨秀清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在入城后，受到剥削阶级意识的侵蚀，享乐思想，等级观念，权力欲都日益滋长。一八五六年夏，太平军打败清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外部威胁。

^① 《贼情汇纂》第一卷，《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三)，第四十八页。

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擅权野心恶性大发展，专横跋扈，竟然借“天父”下凡的名义，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迫洪秀全封他“万岁”，公然要取洪秀全的地位而代之。杨秀清这一行动严重地危害了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团结，严重地损害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引起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不满。洪秀全忍无可忍，秘密地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以及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韦昌辉接到洪秀全密召，认为发动反革命叛乱夺取太平天国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立即带了亲信部从三千人赶回天京。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韦带兵到达天京，当夜就包围东王府，把杨秀清和杨的眷属、侍从以及在东王府内的部下全部杀害。洪秀全知道后，责备韦昌辉不应滥杀无辜，韦昌辉奸诈地表示愿受鞭刑处分，诱骗杨秀清的部属去看他“受刑”，利用伏兵残杀了杨的大批部属。韦昌辉象疯狗一样，在天京城内滥施淫威，大肆杀人，历时一个多月，被他杀害的太平军将士共达二万多人，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中、上级干部。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革命残酷的阶级报复，是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政变。

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之日，秦日纲从丹阳回到天京参加屠杀。石达开在武昌闻讯，于十月赶回天京，看到天京大屠杀的情形，曾责备韦昌辉不应该多杀无辜。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连夜出走安庆，韦昌辉杀了石达开一家人，继续乱杀文武大小男女，甚至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韦昌辉这一连串反革命罪行，激起广大太平军战士的愤慨，在洪秀全号召下，“合朝同心”讨贼，将这个反革命罪魁及其死党歼灭。韦昌辉对天京历时近三个月的恐怖统治才告结束。

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说法，把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歪曲为什么“洪杨内讧”或“杨韦内讧”，是“农民阶级落后性——反动性、保守性、狭隘性，在革命中，在进入城市后日益滋长的结果”，甚至要洪秀全“应负首要的责任”。暗藏的反革命地主分子发动武装叛乱，血腥屠杀革命军民，这明明是地主阶级向农民革命疯狂进攻，怎么能说是“内讧”呢？对于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暴乱，洪秀全当然要发动太平天国将士坚决予以镇压，为什么要对韦昌辉的反革命罪行“应负首要的责任”呢？这是明目张胆地往革命农民的脸上抹黑，是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韦昌辉一类阴谋家开脱罪责，是对历史的恶意歪曲。

三、石达开的分裂出走

被地主阶级誉为“读经书、通兵法”的地主豪富石达开，混入革命队伍后，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路线和各项制度政策，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在他的辖区内，他扯起孔教“仁义”的破旗，笼络地方豪绅胥吏，派充乡官，向地主倒田退租，推行一条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路线，使地方革命政权蜕化变质。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永安封王的五个人只剩他一人，太平天国合朝文武希望他回天京主持朝政。

石达开于韦昌辉被诛后，回到天京，想趁机擅权。洪秀全鉴于杨秀清专权的教训，对石达开存有戒心，在任命他“提理政务”的同时，还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与石达开同理政事。石达开极度不满，竟独树一帜，分裂革命。一八五七年六月，石达开裹胁十多万精壮部队走上分裂的反革命道路，不再听命于太平天国领导，企图远征四川，自立一国。一八六〇年，石达开率部队到达广西，招兵买马，

改换太平天国的制度，公开背叛革命事业。广大受骗上当的太平天国官兵，对石达开的分裂活动极为不满，强烈要求返回天京。在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余名将领的带动下，不顾石达开的压制，毅然“万里回朝”。这支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部队，冲破艰难险阻，于一八六一年九月回到江西广信，与在这里作战的太平军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天京，太平天国群情振奋，洪秀全特授这支部队“扶朝天军”的光荣称号，以表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石达开搞罪恶的分裂主义路线，弄得众叛亲离，可是他至死不悟，仍然梦想当“四川王”，于是重拉队伍，走出广西，经由贵州，进入云南，进取四川。一八六三年五月，在四川大渡河口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敌人围困，抱着“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①的可耻目的，投降了敌人，结果他的部下全部被杀，他也被敌人押至成都后杀死，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韦昌辉的反革命大屠杀和石达开的分裂叛变，使太平天国革命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害，太平天国自此由盛转衰、由进攻转入防御，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斗争阶段，它给后来的革命者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它说明了：要保证革命的胜利，必须纯洁自己队伍，严防阶级敌人的混入和破坏。鲁迅先生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②纯洁内部，防止“投机者的潜入”，对革命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事。它说明了：革命者必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尤其是在革命

① 《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七八一页。

② 《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八十五页。

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更要警惕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和糖衣炮弹的侵袭，防止在胜利时犯骄傲的错误。它还说明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对于革命事业的前进是异常重要的大事，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也只有革命者团结一致，敌人的阴谋诡计才不易得逞。

第二节 太平军的重振和洪仁玕的 《资政新篇》

一、前线军事形势的逆转

韦昌辉、石达开的反革命变乱，不仅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倾覆清朝的大好时机，而且大批革命骨干的惨遭残杀，主力部队的被石达开诱走，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革命队伍的团结、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前线的军事形势急剧逆转。已处于狼狈境地的清军，又重整旗鼓，向太平军反扑。

一八五六年十月，石达开撤走武昌城外的援军赶回天京。武汉太平军孤立无援，只好突围，十二月武昌、汉阳失守，湘军又顺流而下，于一八五七年一月猛扑九江。九江太平军在林启容率领下，面对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沉着应战，消灭了大量敌人。一八五八年五月九江被清军攻陷，林启容率全军一万六千人展开巷战，全部壮烈牺牲，连敌人也惊叹：“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①九江失陷后，清军直逼战略要地安庆。安徽战场上也由于军力薄弱，苦守了十个月的三

^① 《曾国藩全集》，世界书局版第四册，《家书》，第一五二页。

河镇最后失守，许多州县相继被清军占领。江苏战场上和春、张国樑重整江南大营后全力围攻镇江。镇江太平军守将吴如孝于一八五七年十二月突围归天京，镇江失守。一八五八年四月江南大营清军再次逼近天京。钦差大臣德兴阿又占领了江北的瓜洲，江北大营势力复炽。天京陷入了重围。

二、太平军重振军威——三河大捷、扫平江北、江南大营

太平军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仍有力量和敌人较量。这时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依然如火如荼，敌人内部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还未完全勾结起来，清政府内部各反动势力之间也不能协调其动作。

在革命危机的严重关头，洪秀全全力整理朝政，毅然提拔了一批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还有李秀成。团结了太平天国的广大革命战士，力挽危局。其中特别是陈玉成，在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陈玉成（一八三七——一八六二年），广西藤县人，贫雇农出身，十四岁跟随叔父陈承谿前往金田参加革命，屡立战功。一八五四年在再克武昌时立奇功，被提升为殿右十八指挥，不久又因功升为殿右三十检点，这时他才十七岁。天京变乱之后，革命处于困难时期，他不畏艰险，毅然挑起革命重担，东征西讨，万苦不辞，表现了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洪秀全封他为成天豫前军主将，主持太平天国军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将领。

一八五八年八月，陈玉成等太平军将领在安徽桐城县的枞阳镇召集会议，定计先破江北大营，打通天京粮道。陈玉成从鄂皖交界撤兵东走，攻克庐州。九月，陈玉成联合捻军

与天京的太平军前后夹击，大破德兴阿、胜保军，江北大营溃散，太平军再克扬州，天京与江北的交通恢复。

这时湘军悍将李续宾率湘军主力连陷皖北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诸县，进犯太平军皖北的重要军事据点三河镇，陈玉成率部驰援，经过激战，歼灭了李部六千人，李续宾上吊自杀，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也被击毙。湘军头子曾国藩懊丧地供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①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哀叹：“百战之余，覆于一旦，全军皆寒，不可复战。”^②三河大捷使安庆的形势大大稳定下来。

三河大捷后，陈玉成乘胜追击，再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湘军被迫退至皖鄂交界地方。一八五九年三月，陈玉成部攻破六安，进围官亭，全歼守敌，活捉安徽巡抚李孟群。六月，天王以陈玉成成功卓著，晋封他为英王。

与三河之战同时，发生了李昭寿的叛变。李昭寿是皖北的捻军首领，有时投降清朝，有时又投机革命，反复无常。这时他奉令守御天京附近长江北岸的滁州、全椒、来安三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李昭寿军二万人投降清军，不久他的同党薛之元也叛变投敌，把更靠近天京的江浦献给清军。致使天京受到严重的威胁，太平军的大部队只得从三河前线急调回援，在天京附近同敌人战斗。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后，于一八五九年十月打败叛徒，稳定天京北面的局势。同一个月，池州守将韦俊（韦昌辉的弟弟）向湘军投降，所部的许多将领

① 《曾国藩全集·书札》。

② 胡林翼：《致司道》，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十。

和士兵坚持革命立场，反对投降，起而向韦俊反攻，夺回了池州。

打败叛徒李昭寿后，虽然从北面保卫了天京，但是，江南大营仍从东南加紧围攻天京，太平军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于一八六〇年二、三月间疾趋杭州，攻占该城，引诱江南大营分兵赴抗，然后太平军放弃杭州赶回天京，会集各路人马于四月底猛攻江南大营，清军大败，向东溃逃。太平军乘胜向东追击，张国樑在丹阳落水淹死，和春逃到常州浒墅关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到上海被清政府革职。太平军再次打平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多年被围的危险局面，军事形势大为好转。

三、太平军东征苏、常和痛打外国洋枪队

天京解围后，洪秀全召集了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如何乘胜夺取胜利，出席的人有：洪仁玕、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和李秀成等，会议决定先东征苏州、上海地区，再利用江浙地区的人力、物力，西进夺取江西、湖北，粉碎湘军的进逼。

一八六〇年五月，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率领大军乘胜东进，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和江浙两省靠近太湖的许多城镇，包括江阴、吴江、太仓、嘉定、青浦、松江、嘉兴、富阳、临安等二十多个州县，建苏福省，以苏州为首府。

当太平军向东南沿海进军时，上海的买办商人和清朝官僚开始与侵略者公开勾结起来抵抗革命军。他们出钱雇佣外国匪徒和流氓组成洋枪队，进攻太平军，屠杀和劫掠人民。有个美国匪徒华尔，早年曾在美国的鸦片走私船上工作，随船到过中国两次，返美后在中美洲过了多年的劫掠生活。一八六〇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受雇于“孔子号”炮舰，这是一只苏

松太兵备道向美国人买来用以攻击太平军的汽船。太平军进攻苏常的时候，华尔在美国驻沪领事的指使下，拟定了一个组织外籍军队协助清军绞杀太平军的计划，送给大买办杨坊，杨坊十分赞赏，介绍华尔去见苏松太兵备道吴煦。吴、杨二人愿意出资供华尔组织外籍军队，约定华尔薪俸为每月三百五十两，士兵每月三十两，每攻下一个城，另外再给华尔赏金三万两，掠夺到的财物由华尔和他的部下分享。华尔招募了约一百名想发横财的外籍官兵，组成了一支洋枪队，他们大多数是从外国兵舰和商船逃出来应募的，华尔和他的副手法尔思德、白齐文等三个美国人带着这支洋枪队，于六月向松江太平军进攻。太平军在几分钟内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一个月后，华尔又招收了约二百名菲律宾浪人，再次向松江反扑，用大炮炸药攻城，与太平军发生肉搏战。二百余兽兵，死者六十二人，伤者包括华尔在内一百〇一人。当洋枪队即将全军覆没之际，大量清军涌到，太平军寡不敌众，退出松江。八月二日华尔又率新招募的洋枪队进攻青浦，受到太平军痛击，华尔受重伤。他的部队又由白齐文统率，第二次向青浦进犯，又被打得大败。

太平军进军苏、常的时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北上进攻大沽之际，吴煦和钦差大臣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竟向英、法侵略军乞求援助。经商定由吴煦等筹措饷银和军需，英、法侵略军助清军守上海县城。五月二十六日英、法公使宣布“保卫”上海，派了一支由侵略军和洋行捕役临时杂凑而成的五千人的部队占领上海县城，后来还分兵驻扎江湾和徐家汇。侵略军每月从吴煦那里取得饷银和军需费用达一、二十万两之多。太平军在青浦打败洋枪队后，

乘胜进至上海近郊，击败清军，围攻县城。负责东征军务的李秀成不仅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缺乏警惕，甚至还幻想与外国侵略者结成“新盟”，把进攻上海的消息通知外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不干扰外国人。八月十八日，李秀成率三千太平军进驻徐家汇。外国侵略者阻止太平军解放上海。太平军在上海县城的西门和南门与英、法侵略军作战，受到不少伤亡。这时嘉兴太平军被清军围攻甚急，上海的太平军只得于八月廿二日撤回援嘉兴。太平军东征的最后目标，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而受到了严重挫折。

四、安庆保卫战和太平军进军浙江

当太平军胜利东进时，西线战场形势又紧张起来。湘军在经过休整之后，从龟缩的城堡里爬出来，向太平军猛扑。一八六〇年春，湘军主力曾国荃部进犯安庆。太平军和清军进行了为时达一年之久的安庆保卫战。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重要战役，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十分重视，洪仁玕说：“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①湘军头子曾国藩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②因此双方皆倾全力争夺安庆。

一八六〇年，陈玉成率领的十万太平军和捻军联军，进驻安庆以北的桐城，与湘军在挂车河激战，湘军以逸待劳，太平军则远行疲困，结果失利，退至桐城东北的庐江。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八五二页。

② 《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曾国藩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二册，《奏稿》第三三一页。

洪秀全根据敌我双方阵势和既定军事计划，决定，把太平军分为二路，先去夺取湘军的后方基地武汉，使敌人有后顾之忧，不能久围安庆。这是正确可行的战略。北路太平军由陈玉成指挥，沿长江北岸西进；南路由李秀成（当时已被封为“忠王”，与陈玉成一起主持天国的军事）指挥，沿长江南岸西进，约定二路兵马同时到武汉，南北夹击，夺取武汉。而李秀成不肯执行交给他的任务。他片面地重下游，轻上游，反对进取武昌。在洪秀全严令之下，他才勉强率军西行。

陈玉成的部队于一八六一年三月从安徽霍山出发，很快进入湖北，攻下许多地方，于三月底到达武汉附近。湘军异常恐慌，它的第二号头目胡林翼急忙调水陆军去武汉，也来不及解救，急得吐血，狗命垂危，武汉城内的清政府官员则慌慌张张地准备逃命，形势对太平军是很有利的。就在这时，英国海军舰队到达汉口，立即出面干涉太平军对武汉的进攻。陈玉成的部队由于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加以南岸李秀成带的部队迟迟不来，而安庆的局势又很紧张，因此，没有进攻武汉。陈玉成以部将赖文光所部留驻黄州，等待李秀成的部队，自己率主力回救安庆。

李秀成害怕中外反动势力，行动上消极怠慢。他带着军队一路招兵买马，扩展私人势力，到一八六一年六月才进入湖北。当其部队到达武昌县时，李秀成却在兴国接见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他在侵略分子的恫吓下，不敢去进攻武汉。还借金执尔由武汉下驶之便，给陈玉成和赖文光带去两封要函，结果都被这个英国外交官扣留，后来成了英国博物馆的展览品，也成了李秀成勾结侵略者，出卖太平天国利益

的罪证。李秀成不顾战争的全局，放弃进攻武汉，把大军全部撤向江西、浙江，对安庆保卫战置之不顾，断送了在上游争取胜利的战机。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干部对李秀成这种背叛行为都十分愤慨。

坚守安庆的二万多太平军战士，在叶芸来、吴定彩的率领下，与优势的清军进行了长期的浴血苦战，表现了太平军战士的无比忠贞坚强。一八六一年九月，安庆在援绝粮尽的情况下终于失陷。“清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存留”^①。经过安庆保卫战，太平天国中最英勇善战的陈玉成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尽，再也不能复振；安庆的陷落，又等于天京大门的钥匙落入敌手，这一切对太平天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在安庆保卫战期间，侍王李世贤部在江西被湘军左宗棠部所阻遏，未能打开局面，于一八六一年春返军入浙。清军闻风溃逃，李世贤部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攻占了浙江大部分州县。同年秋，李秀成也从江西入浙江。他们先后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攻克宁波，十二月三十一日攻克杭州。但也无济于太平天国战略上所受的损失。

五、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在全国反清斗争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太平天国为扭转由于韦昌辉阴谋政变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的危局，在军事上作了顽强的努力，在几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多大的起色。洪秀全起用族弟洪仁玕主持朝政，曾试图作一番改革，但也没有付诸实现。洪仁玕（一八

^① 富礼勋：《天京游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三），第九五八页。

二二年二月——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在金田起义后,由广东花县去广西,准备加入革命队伍,当他到达桂平县时,太平军已转往永安,未及跟上,仍回广东。后因清政府缉拿洪秀全的亲族,洪仁玕便逃往香港,在外国牧师处教书,同外国人接触较多,受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第二年,他曾赶往天京,路上受阻未成。一八五九年,太平军已处于困难境地,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从香港到达天京,深受洪秀全器重,封为干王,总管太平天国的政事。洪仁玕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内外形势,很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他根据在香港多年接触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知识,提出了一个施政纲领,叫《资政新篇》,这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其主要内容有:

(一)在革新政治方面,主张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重视报纸的作用,尊重社会舆论,听取群众意见,以收“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的效果;提出“权归于一”,以加强洪秀全为首的中央集权,反对分裂,防止“弱本强末之弊”;还主张建立钱谷库和会计制度,健全乡官乡兵等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

(二)在经济建设方面,主张兴办近代新式工矿企业,发展交通,兴修水利,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制造火车轮船,发展邮电事业,等等。

(三)在社会改革方面,主张革除不良习俗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破除传统迷信,禁止买卖人口、使用奴婢和吸食鸦片;主张发展文化教育,兴办卫生事业,奖励学习科学技艺,提倡“文以纪实”的文风,在新创的历书中增加有关农业生

产的知识。

（四）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同各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商和交往，反对外国干涉太平天国内政，不准诽谤太平天国的“国法”，不许外国人擅自进入中国内地，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他企图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引导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轨道上去。洪秀全对《资政新篇》非常重视，逐条批注，镌刻颁行。其中向西方学习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正反映了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愿望。洪秀全唯独对以下两条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条是对设立新闻官，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另一条是对戒杀问题，批道：“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反映了洪秀全提防敌人利用新闻自由破坏革命的警惕性，和对阶级敌人坚决斗争的革命立场。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无法实施的。当时，不仅没有现实的阶级基础来实行这个纲领，而且太平天国正处于困苦艰险的战争环境之中，它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团结太平天国内部，振作奋发，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发动更强大的攻势，当然也无暇去实施这个纲领。作为一个全面的政纲来说，《资政新篇》没有触及《天朝田亩制度》已经提出的土地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缺点。尽管这样，《资政新篇》还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和思想影响的政治纲领，它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改变祖国的旧貌，跟上世界发展趋势的强

烈愿望，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第三节 太平天国抗击内外反动派的英勇战斗

一、中外反动派紧密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制服了清朝政府，攫取了大量侵略权益，它们把开放长江各口等特权视为既得利益，而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的反侵略斗争，就成了侵略者的眼中钉。因之，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干涉就日益疯狂起来。英国首相巴麦斯顿叫嚷：“中国全局的事情现已改变了。从前中英为仇敌，今则我们与中国政府已有极友善的关系，……如果藉我们予以友善的援助，而能致令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且看前途商业之大发展啊！这商业是可以预期必兴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讲得更露骨，他公开扬言：“如英人不欲牺牲在华利益，为自卫计，迟早将与太平军冲突。为避免严重纠纷，惟有维持现尚控有中国四分之三之北京政府”。^①充分暴露了侵略者迫不及待地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狰狞面目。

清政府一贯奉行“灭发捻为先”的反动政策，现在外国侵略者表示愿意“助剿”太平军，使它喜出望外。它为了讨好侵略者，不但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权益，一一奉送给他们，而且还拍卖了条约所没有规定的大量权益。例如，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清政府任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八七九页。

命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把全国的海关总管理权送给了侵略者。是年终，太平军攻占浙江进军上海，面临灭顶之灾的江浙地主，买办商人和清朝地方官僚，建议清朝“借兵助剿”，要洋大人出兵救命的嚎叫，嚷成了一片。清政府急忙命令江苏巡抚：“所有借师助剿”，“应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义，以资联络。”^①大刽子手曾国藩也叫嚷：“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②清政府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决心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由于中外反动派扩大了他们的反革命勾结，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平军不仅要和凶残的封建豺狼作战，还必须和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强盗对阵。此后的战斗更加艰苦了。但是，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不畏强暴，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战斗。

二、同外国侵略军鏖战江、浙战场

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决定共同镇压革命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英国侵略者向太平天国提出：不得侵及上海、吴淞周围百里地带以及汉口、九江周围百里以内，不得扰及镇江英领事署所在的银岛等无理要求。太平天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断然予以拒绝，并在攻克杭州后于一八六二年一月进兵上海，十六日攻克奉贤，十七日克南汇，十八日克川沙、金山，占有了高桥镇以南的全部浦东。上海西面的太平军也进围洋枪队所盘踞的松江，前锋部队于二十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第三页。

② 《遵旨通筹全局折》，《曾国藩全集·奏稿》。

日进至吴淞附近。

买办商人、上海地方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经过紧张的策划，于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三日成立了“中外会防公所”，筹集款项，建筑军事工程，派员侦察太平军情况。二十日，太平军进至吴淞时就遭到清军和法国军舰的袭击。二月二十二日，英国海军提督何伯、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率领英、法侵略军和一部分洋枪队从上海出发，向高桥进犯。从此开始了中外反动派的新的联合进攻。高桥战役中，太平军打伤了白齐文。接着，又在离上海县城六十里的萧塘与侵略军激战，太平军炮火不如敌人，许多战士牺牲。华尔的洋枪队于此役后改称为“常胜军”。四月初，侵略联军进犯罗家港、七宝、王家沙等太平军阵地。太平军在罗家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亡命之徒华尔带领“常胜军”三次猛扑，都败下阵来。联军司令何伯也被打伤了腿，侵略军狼狈溃退。接着，侵略联军又进犯嘉定、青浦、奉贤等地，太平军在奉贤的南桥镇重创敌军，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在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鏖战之际，另一支凶恶的反革命武装——李鸿章的淮军开到了上海。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一八五三年奉旨回籍办团练，在和县、含山县、裕溪口、庐州一带与太平军作战，血腥屠杀太平军，后投入曾国藩军营当幕僚，为曾国藩所赏识。一八六一年，清政府授命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李鸿章奉命在皖招募乡勇，以备东援镇江。一八六二年春，李鸿章以原团练骨干为基础，按湘军规式编成一支七千人的淮军。当时上海官绅乞请曾国藩派兵东援上海。曾国藩即令李鸿章赴援。一八六二年四月，“中外会防局”

雇用英轮船七艘，在英舰的护航下，把这支反革命军队接到上海。从此，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军阀武装——继湘军之后的淮军，在帝国主义、买办的豢养下，在太平军的血泊中建立起来了，大卖国贼李鸿章靠了这支反革命武装爬上了政治舞台。不久，曾国藩推荐李鸿章当上了江苏巡抚。

淮军到达上海后，配合侵略军，疯狂向太平军猛扑，夺取上海周围的据点。一八六二年五月，太平军大举反攻，在太仓破清军营垒三十座，在嘉定大败英国陆军司令史迪佛立，收复了县城。在解放青浦的战斗中俘获“常胜军”副将法尔思德。侵略者发现“叛军（指太平军）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上海洋商众议，因嘉（定）、青（浦）败退，颇损外国兵威，私相诟怨，以英法提督办理不妥。”^①李鸿章也向清帝报告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敢出击。”^②

侵略军对太平军“不敢出击”，但是他们对于老百姓则是为所欲为的。他们每攻占一地都要分取掳掠所得。攻下嘉定时“四门有夷兵，见贼即杀，少有脱者。百姓沿街求救……然玉石难分，死者过半……闻城中有三年之粮，金银亦不少，悉为西兵守住，不容携带分毫。”^③他们退出嘉定时“把一切见到的物件都抢走。……当（洋枪队）士兵离城之际，后面跟着的是牛羊儿童及妇女——这都算是被劫掠的货品”，还将该城焚毁。被中外反动派屠杀的有初生的婴儿到八十岁的老人。英、法侵略军和洋枪队掳获年轻妇女，奸污以后再把她

① 李鸿章：《上海西兵情形片》，《奏稿》卷一，第二十八页。

② 李鸿章：《西兵退出嘉定折》，《奏稿》卷一，第二十页。

③ 姚济：《小沧粟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六），第四九六页。

们货卖为娼。^①

在宁波，英海军大佐唾乐德克和法海军上尉狄尼联合附近清军于五月间向太平军进攻。太平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击毙了狄尼，最后在予敌人大量杀伤后，主动退出了宁波。反动派还从上海调一部分“常胜军”参加宁波方面的进攻，并就地组织了有英、法两国流氓分子参加的中英混合军（又名“常安军”、“定胜军”，由唾乐德克统率）和中法混合军（亦称“常捷军”，由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少佐勒伯勒东率领），会同英、法两国军舰从宁波向西进犯。太平军在保卫慈谿战斗中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太平军在上海附近打得侵略军不敢出击，六月间进抵郊区徐家汇、虹桥、法华镇等地，八月间再次进抵郊区静安寺。这时曾国荃部湘军抵达天京城下，天京告急。洪秀全调上海方面的太平军回援天京。浙江的太平军同时也赶回天京助战。

华尔被击毙后，宁波的“常胜军”退回上海，由美国浪人白齐文继任统领。白齐文盗匪成性，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杨坊家里，抢走了四万两饷银，还把杨坊痛打一顿。李鸿章便决心把白齐文撤职，请求英国政府派遣一个正式军官来担任“常胜军”统领。英国政府授权英国军官可以在中国政府服役，那个曾经参加过抢劫和焚烧圆明园的英军工兵队指挥官戈登，放下他已进行了一个冬天的测绘上海附近详细地图的罪恶勾当，于一八六三年三月担任“常胜军”统领。李鸿章的淮军会同“常胜军”于五月进攻太仓，六月进攻昆山。

^① 《潘曾瑑等书信》，《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一二四页。

由于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敌，太平军在大量杀伤敌人后，主动放弃了这两城。淮军和“常胜军”向苏州窜犯。从九月到十一月，太平军在苏州奋勇抗敌，侵略分子戈登也不得不承认“战斗得非常英勇”，“阵地非常坚固”。但是太平军中郜永宽等八个将领暗中通敌乞降。从天京前来援救的李秀成，不仅不予处置，反而明目张胆地纵容叛徒投敌，他对叛徒们说：“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① 随即在十一月三十日带亲兵离开苏州。四天后，郜永宽等惨杀了反对投降、忠贞不渝的慕王谭绍光，把苏州拱手献给中外反革命联军。李鸿章入城后把郜等八人一起杀死。叛徒们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苏州的失陷，标志着苏南根据地已经陷于绝境。但广大太平军将士，继续英勇顽强地同中外反革命联军奋战。一八六四年三月金坛之战，大败“常胜军”，击伤戈登；江阴华墅之战，“常胜军”“三个指挥官，有的被打死，有的被生擒”。四月常州之战又毙伤敌军二十余名。但终因众寡悬殊，丹阳于五月中失陷。

浙江方面，中外反革命联军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攻绍兴。太平军于一八六三年一月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击毙“常捷军”头子法人勒伯勒东。二月，又来进攻，太平军又击毙“常捷军”的新头子法人达耳地福和英海军参将定龄。三月，太平军因弹药缺乏，主动撤出绍兴。左宗棠湘军自江西向浙江进犯，严州、龙游、汤溪、兰溪、金华相继失守。左宗棠军和“常捷军”向杭州进犯。太平军在杭州、富阳、余杭三处重点设防，严阵以待。中外反革命军遭到太平军迎头痛击，付出重大伤

① 《李秀成自述》。

亡后，才于九月陷富阳，一八六四年三月，陷余杭、杭州。

三、天京保卫战和太平军余部的英勇战斗

太平军东征计划受挫后，主力被分散于东、西两个战场，外国侵略者的大规模武装干涉，使东战场的形势益日恶化，中外反革命军队步步向天京进逼。在西战场上，自一八六一年九月安庆失陷，陈玉成退守庐州。一八六二年初，他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人率三万人远征西北。这支部队入河南后，与当地捻军配合，进入陕西，开辟了西北战场。西进的战略目的是牵制敌人，扩大队伍，积蓄力量，待机重振淮南的战局，以捍卫天京。

一八六二年四月，庐州失陷，陈玉成带领余部退往寿州（今安徽寿县），被当地的地主武装头子苗沛霖诱捕，解送到清军胜保营里。这位在战场上勇猛如虎、叱咤风云的年青将领，在敌人面前同样发扬了革命英雄的浩然正气。据《陈玉成被擒记》记载：陈玉成被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睨眄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吾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者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①伟大的农民革命英雄、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将领英王陈玉成，就是这样英烈忠贞地坚持革命气节，视死如归。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英王被杀害于河南延津西教场，时年仅二十六岁。陈玉成的牺牲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无法估计

^① 引自罗尔军《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

的损失。

远征西北的陈得才、赖文光听到陈玉成被俘的消息，星夜从陕西东出，于九月间进入湖北，准备越过大别山，回援天京。十月，太平军在天京附近对湘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打得曾国藩“胆已惊碎”，飞调“常胜军”应援。“常胜军”又不敢前来。但太平军也存在困难，缺冬装，少军粮，将士饥寒，各将领又不同心协力，不能再坚持围攻下去，才使曾国荃得侥幸守住营垒。陈得才军被阻于大别山前，不能东下，不得不放弃回援天京的打算，再度远征陕西。天京太平军在进行了四十六天的会战以后，放弃在天京打硬仗的办法，于一八六三年三月渡江北征，想引湘军到北岸作战，以解除对天京的包围。可是老奸巨滑的曾国藩没有上钩，他采取“攻其必救”的策略，仍然用主力进攻天京。北进太平军又被召回。在南退途中，军士战死、落队及饥寒病死等失去十数万人。两次解围战失败了，天京处于更加危急的境地。从一八六三年夏起，天京就已处在饥荒中，洪秀全以宁愿饿死也不屈服的崇高气节，号召全城军民吃野草充饥，他自己带头吃“甜露”（野草），表示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八六四年二月，曾国荃军攻陷天保城，天京仅有的一条对外通道也被切断，粮食和物资供应断绝，情况更加困难。随着苏南、浙江的沦陷，天京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清军百计环攻，都为太平军一一击退，仅五、六两月，就歼灭清军四千余人。六月一日，洪秀全因劳瘁病逝，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洪秀全去世后，太平天国的处境更加险恶了。但是，太平军将士同心同德，决心与天京共存亡。六日幼天王洪福瑱即位。七月三日，地保城失守。清军逼

近天京城脚，挖掘地道进攻。太平军誓死相拒，伤毙敌军极多。七月十九日，清军从地道轰塌地保城附近城墙二十余丈，蜂拥而入，屹立十一年的太平天国首都终于陷落了！太平军在城破后，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把湘军先锋朱洪章带领的三千清军打死一半。守城军在敌众我寡的肉搏战中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无一降者。

清军包围天京两年多，对于天京城内的财富，极为眼红，一旦进了天京，便施展出抢劫烧杀的本领。据当时目睹者的记载：“官军进攻，亦四面放火”。曾国荃部下提督“萧孚泗在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貲，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抢劫之外就是屠杀，“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①清军在天京抢掠烧杀，连破城时轰塌的缺口也顾不得防堵，这就给幼天王洪福瑱一个突围的机会。他冲出城墙缺口，在广德州与洪仁玕会合，一同退到湖州。李秀成逃到天京城外为曾国荃军捕获。曾国藩从安庆赶来，亲自审问。李秀成向敌人摇尾乞怜，变节投降，为敌人出谋划策，主动提出了一个恶毒的“招降十要”，妄图把当时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太平军余部几十万人招降到敌人方面去，让敌人消灭这些革命力量。但曾国藩在李秀成写完供状的当天，把他杀死了。李秀成之死，正是一个叛徒的可耻下场。但是长期以来，王明、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却百般肉麻地吹捧李秀成，把这个叛徒打扮成“圣贤豪杰”、“民族生存的灵魂”、“领导历史运动的巨匠”，以至是所谓“民族的无价之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六页。

宝”等等，把狗屎捧上了九天。他们为什么把一个无耻叛徒吹得如此天花乱坠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无耻的叛徒，是帝、修、反的忠实走狗，他们狂热地吹捧李秀成，鼓吹叛徒哲学，实际上就是在吹捧他们自己，粉饰他们的叛徒行径，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他们篡党窃国复辟资本主义积蓄反革命力量。

天京虽已陷落，太平天国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国破主亡”的情况下，仍然浴血奋战，至死不屈。

天京失陷前不久，浙江方面只保有湖州，大部分部队如李世贤、汪海洋等十余部都转入江西境内。天京失陷后，各将领无人统一指挥，大体分成湖州军与江西军两部。一八六四年七月，李鸿章军、左宗棠军和“常捷军”会攻湖州，八月黄文金护卫洪福转战皖、浙边境，黄文金病死，余部入江西，洪福和洪仁玕等被捕。洪仁玕在狱中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写下了表彰太平天国辉煌业绩的“自述”，又“签驳”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后^①，怀着对太平天国“有日必复生”的崇高期望，从容就义。洪福也被杀害。江西军李世贤、汪海洋等于十月攻入福建，福建民众群起响应。清军配合英、法海军进攻。一八六五年夏，太平军余部转战至广东东部，一八六六年二月，汪海洋战死。部将谭体元孤军被围困在黄沙嶂，率军抗敌，力竭跳崖，被俘不屈而死，成为太平军抗清到底的又一名英雄。

在西北战场上的赖文光得知天京失陷的消息后，忍着无限的悲愤，提出了“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②的战斗

① 《沈葆楨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折》，《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八一六页。

②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八六三页。

目标，按照太平天国的军事编制，重新编组捻军的队伍，易步为骑，“以走疲之，则可常活”的高速流动战术，和敌人在河南、山东一带展开了殊死搏斗。一八六五年五月在山东曹州全歼僧格林沁军，击毙僧格林沁。清政府调曾国藩督湘、淮军进攻，屡次为捻军所败，清政府又改派李鸿章督战。一八六六年秋，赖文光派张宗禹一部捻军往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自此捻军分东西两部，赖文光率东捻军攻山东，张宗禹率西捻军由河南转入陕西。清政府除派李鸿章率湘淮军进攻东捻军外，另由左宗棠率湘军进攻西捻军。东西捻军虽都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但是在没有根据地的条件下长期流动作战，逐步陷于被动。一八六八年春，赖文光在扬州附近瓦窑铺因伤被俘，写下慷慨悲壮的自述，满腔热情地讴歌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抱着“一死以报国家”的赤胆忠心，英勇就义，东捻军失败。一八六七年底，西捻军从陕西经山西入直隶，原欲进攻北京，吸引清军，以救东捻军，为清军所阻，于一八六八年秋转入山东，被困于黄河、徒骇河、运河之间，为清军勾结外国侵略者的炮船所扑灭，张宗禹率十八骑突围后，不知所终。捻军起义共历时十六年，战争地区扩大到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凡八省。捻军健儿们威武豪壮，流血牺牲，打得敌人胆战心惊，疲于奔命，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

中外反动派在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地主阶级马上猛扑过来，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

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①在经济上“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②

天京沦陷前夕，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清朝皇帝就咬牙切齿的下令，对太平军必须“尽绝根除，毋使一名漏网”。^③大刽子手曾国藩公然叫嚣对革命人民要“一意残忍”。程朱理学家们也赶忙祭起儒学的黑旗，为地主阶级大造反攻倒算的反革命舆论，胡说什么：“当变乱之际而以生人之心杀人，即或少过，所救已广”。“杀恶人乃行仁之术也”。^④这就是说，实施孔丘“仁政”的内容，就是把一切革命力量斩尽杀绝，非如此不能使地主阶级的统治苟延残喘，还美其名曰：“除暴安良”，“行仁有术”。这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杀人哲学。反动派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冯云山等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阶级报复。天京失陷后，清政府派人到洪秀全、冯云山家乡官禄埭、禾落地村灭洪、冯九族。冯家现在已经没有后人。在太平天国首义地区，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了“清乡”、“铲村”、“挖坟”、“烧屋”、“夺田”等一系列反攻倒算措施。广大革命群众重又被打入血泊和火海之中。据英国人呤喇的记载，单在一八六〇年八月至一八六四年九月，在苏浙战场上被屠杀的太平天国军民总数达二百八十七万二千五百五十人之多！封建统治阶级这种灭绝人性的阶级报复，使所有太平军、捻军占领过的地区几乎都变成了“几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

①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五一页。

②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七八页。

③ 《清实录》，同治三年元月。

④ 方宗诚：《与马命之书》。

人民皆死亡”^①的破落废墟。就这样，地主阶级又在农民的血海和白骨堆上夺回了他们失去的天堂。

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人民都是为了恢复和加强地主阶级的专政。随着中外反动武装的军事进攻，地主阶级的还乡团又卷土重来，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革命风暴摧毁的各级反动官府，重新给人民铐上封建政权的镣铐。清朝皇帝命令他的军队：每攻占太平军一地，“即由军营派员”，恢复封建地方政权，“办团守御”。^②天京沦陷后，曾国藩立刻恢复两江总督衙门，强行反革命专政。苏州沦陷三天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即到苏州重建反动政权，一切“循照旧章办理”。清政府还不遗余力地扩张地主豪绅的权力，设立“保甲局”，加紧“编查保甲”，“令其互相稽察举报”，实行保甲联坐，严密监视人民。广大人民重又陷入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罗网。

在太平军占领区，许多农民得到了土地，有的佃户则少交租或不交租，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封建政权一恢复，地主阶级立刻进行倒算。一八六三年，清朝皇帝命令各省督抚在攻陷太平军占领区后，立即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夺回交给地主。曾国藩占领南京后，公开贴出田地“各归业主”的复辟告示，成立所谓“善后局”，专门搞反攻倒算。各地地主在清政府保护下，如狼似虎，趁机大肆抢夺农民土地。结果出现“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经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③的局面。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湘、淮军头目，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② 《剿平粤匪方略》第一五〇卷。

③ 丁日昌：《抚吴公牍》，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一六四页。

无一不成了霸占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李鸿章兄弟六人，强取豪夺，在安徽合肥等地兼并土地达六十万亩。^①在霸田的同时，地主阶级还猖狂地进行“清租”倒算活动，追欠太平天国革命后农民“欠交”的历年地租。安徽黟县发现的某公堂地主的租簿，就是这一罪恶活动的铁证。一八五五年，太平军进入黟县，当地农民即奋起进行抗租，“拖欠”、“少缴”地租。账簿上记载一八六四年以前的十八年间，经常有十八户佃农抗租，“欠租”共达一百七十二次之多！天京沦陷后，这个公堂地主即照当地地主的办法，大搞“清租追欠”活动，开出“欠租清单”，逐户追缴。不仅追逼太平天国时代的“新欠”地租，还追勒祖宗几代的“上欠老租”，一斤一两也不放过。“租簿”中的三张追欠清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张清单中被追欠的佃户共二十三户，仅谷子一项，一八四六年以前的老欠共二千二百五十一斤八两，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的旧欠共五百九十六斤四两，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期间的“新欠”共二千七百十斤一两，总共是五千五百五十七斤十三两，等于二十三户佃农每年田租额（一千零四十一斤八两）的近五倍半！其中如佃户吴老开的逼欠清单，一八四六年前祖上遗下的“老欠”为三百零五斤四两，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的旧欠是一百五十九斤，太平天国时期的“新欠”是四百十二斤，共欠八百七十六斤四两，他原来每年的租额是谷七十二斤，这样一次就得追缴年地租额十二倍的“欠租”^②！这种敲骨吸髓骇人追欠，赤裸裸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豺狼本性。佃农们缴不出租，他们就夺田赶走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一八九页。

② 《黟县佚名地主租簿》，转引自《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农民，或呈报官府追逼。有些地方的地主，设立“收租局”、“租栈”、“催租局”等盘剥机构，和官府串通一气，“一任有田者之所欲而为”。农民抗租，地主阶级就对农民施行肉刑严逼，轻则“掌责鞭挞”，“甚者繫两足以倒悬于船舫，或褫裳袄，拘之铁索，以冻饿于风雪之中”。^①这就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惨遭迫害的真实写照。

地主阶级对鼓舞农民起来造反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化，恨之入骨，妄想铲除。曾国藩叫嚷：“涤荡兵气以兴文教为急”。他急的是摧残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化。原来被描写为“汗牛充栋，人人见习”的太平天国印书，几乎全被烧光；他急的是恢复被太平军摧毁的孔庙、孔象、书院、学宫和寺庙；他急的是在江南一带重开科举，恢复八股，以笼络士大夫阶层。而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恢复被太平天国砸烂了的孔孟之道。曾国藩说：“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②又说：“将欲黜邪逆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这样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③曾国藩的用心极为险恶，他就是要用“仁”“礼”来束缚人民于封建的忠孝“轨范之中”。就这样，太平军占领过的地方，人民又被戴上了封建主义文化的枷锁。但是太平天国在人民群众的心坎里播下的革命种子，是中外反动派永远也无法铲除掉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及其在史学界的代理人胡说什么：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时常迫得”

① 陶煦，《租赋》。

② 《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一册，《文集》第二十页。

③ 《江宁府学记》，同上书第一四三五页。

封建统治者“不能不对农民给些让步，使得农民得以稍为休养生息，因而把生产力发展又或多或少地推进了一步。”这是对历史的极大颠倒。太平天国失败后，封建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进行的比蛇蝎还狠毒的反攻倒算，彻底粉碎了这种谬论。它以血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只有反攻倒算，决没有“让步政策”。鼓吹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就是妄图使革命人民对反动派产生幻想，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反动派的“明智”上，是要革命人民对反动派让步。

第四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失败原因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农民战争，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火车头的作
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平等的主张，特别是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平分土地的主张，要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国，激起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热情，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十八省），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和清朝反动政府对峙达十四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页。

之久。太平军所到之处，杀贪官，逐地主，将地主豪富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人民，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使一部分农民摆脱了地主阶级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束缚，给清朝统治集团以致命的一击，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太平天国未能完全实行自己提出的理想纲领，但它在紧张的革命战争中，仍然作了顽强的努力，进行了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解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统治区经济欣欣向荣，曾经投身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英国朋友呤喇写道：“每个村庄，每个农户，所有的幸福人民都在照料蚕宝宝过冬，或则从最后一批蚕茧中抽丝，或则耕翻田地。”^①出现了“丰年景象”，这和清朝统治区连年灾荒、经济凋敝的衰败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毛主席教导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太平天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光辉真理，也证明了农民无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的声势浩大的反孔斗争和它颁布的光辉革命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冲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牢笼，给孔孟之道以沉重的打击，它赋予太平天国战士以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在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封建主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第三八五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八页。

义的伟大斗争中勇往直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斗争，也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特别是《天朝田亩制度》的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所描绘的农民的理想天国，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它的绚丽的革命异彩，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称颂。

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爆发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它面临的已不只是一定要推翻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且还要抵抗侵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这是它同历来的农民战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革命既是农民战争的高峰，又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成为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的一切蛮横要求，严词拒绝；对他们的武装进攻，坚决回击，多次打得它们狼狈不堪，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洋枪队统领美国流氓华尔、法军总兵勒伯勒东和买忒勒以及大批侵略分子，被太平军击毙在战场上。同时，还活捉了洋枪队副统领法尔思德，打伤英国海军上将贺布和洋枪队后任统领英国强盗戈登。这些令敌人胆寒的战绩，严正警告了一切侵略者：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人民这一正义斗争的历史中，占了重要的一章。太平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天国的英雄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敢于革命、前仆后继、坚毅顽强、宁死不屈的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战歌，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同敌人斗争的勇气。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①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就从太平天国的斗争精神中，得到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启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从小就爱听洪秀全的革命故事，并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许，起而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政府。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当时在亚洲爆发了印度的民族大起义（一八五七——一八五九），波斯的巴勃教起义（一八四八——一八五二），婆罗洲人民和华侨共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一八五一——一八五六），而太平天国是亚洲革命运动的主流，它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虽然这些自发的起义彼此并没有联系，但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上是一致的，所以客观上又是互为声援的。同时，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直接缩小了世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市场，不能不起着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马克思当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②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这一科学论断的无比正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二页。

②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页。

确，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于一八五七年首先从美国开始，接着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各国的政治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密切地注视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文章，愤怒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卑鄙和野蛮，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关怀和支持。

在读完了惊心动魄的太平天国革命战史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惊天动地的农民大革命，最后竟会失败了呢？这是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①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开始瓦解，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近代工人阶级，因而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要求解放，敢于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这是农民阶级的基本面。“但是农民究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的纪律，以便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八页。

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①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所以在革命纲领、革命纪律和总结革命经验三个方面，都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缺点和错误，最后不能不陷于失败。

在革命领导方面：洪秀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站在农民革命的立场上，创立了拜上帝会，创造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但是，这些纲领和理论还不能象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理论那样引导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如《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提出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是未能全部付诸实行，而《资政新篇》又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也就不可能提出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路线，从而制订出切合实际情况的纲领和各项政策，也就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革命纪律方面：革命的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太平天国初期，由于太平军有严格的纪律，深受群众的拥护，促进了革命前期形势的胜利发展。但是，由于农民革命队伍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武装，革命初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内部团结没有一直坚持下去。在革命取得胜利时，往往为胜利所陶醉，容易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他们不愧是革命的英雄，可是在封建习惯势力的袭击下，却没有击退敌人进攻的思想武器，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损失。而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却乘机从

^① 《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内部破坏革命。地主阶级阴谋家韦昌辉发动血腥的反革命政变，使太平天国大伤元气；地主阶级野心家石达开分裂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地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叛贼苗沛霖勾结清军诱杀了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将领陈玉成；叛徒郜永宽等残杀慕王谭绍光，出卖了苏州城；叛徒李秀成暗中勾结中外反动派，出卖太平天国革命利益，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一切都表明，腐朽的封建思想腐蚀了革命的战斗的农民队伍，而一小撮暗藏的阶级敌人又大肆破坏革命的纪律和团结，从内部攻破了革命的堡垒。

在革命经验方面：由于太平天国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所以，缺乏用科学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例如，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的胜利进军期间，没有重视在沿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放弃了一些占领过的城市，定都天京后，又不得不回过来再去攻取。在反攻中，又过份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仍然没有吸取过去不重视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教训。又如，对各地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起义斗争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积极主动地去联合他们，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这都说明，太平天国不能象无产阶级那样科学地总结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也是招致失败的一大原因。

以上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它所面对敌人，不但有本国的封建主义，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致使敌人的力量超过了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外国侵略者，英、法、美、俄等国，或是直接出兵，或是供给清朝武器，都来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军三次进抵上海附近，也都是因外国侵略军和洋枪队的直接干涉

而未能攻占上海，太平军的攻武汉以救安庆的策略也是因英国海军的干涉而遭到破坏的；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地盘都是外国侵略军帮助湘、淮军一道攻陷的。沙俄先后送给清政府八尊大炮、五百发炮弹和一万支枪，用来屠杀中国人民。那些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刽子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都不止一次地吹捧外国侵略军在镇压革命中“实属出力”。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之一洪仁玕，在就义前，沉痛而愤慨地指出：“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①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②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大血债。我们子孙万代不要忘记这笔血债。

第五节 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

一、贵州的苗、教军起义

贵州东南部的清江、台拱一带，是苗族聚居的地区，周围的三千余里，旧称苗疆。清朝雍正、乾隆时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了苗族的世袭土司制，逐步把苗疆直接置于清朝官吏的统治之下。清朝统治集团利用汉族地主、苗族封建土司（贵族）对苗族人民进行重重的压榨。沉重的田赋，无尽头的徭役，骇人听闻的高利贷盘剥，使苗族人民陷入了无法生活的绝境，“秋冬确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变价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八五三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〇页。

缴官者。良苗至食草实树根，终岁无粟米入口，……”。清初以来，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太平军席卷江南定都天京后，贵州苗族、汉族人民即举旗响应，燃起了反清起义的烽火。

一八五四年三月，贵州南部杨元保领导的斋教军在独山起义。九月，贵州北部杨风领导的斋教军在桐梓起义。

一八五五年春，苗族雇农张秀眉在贵州台拱率众起义，团结侗族、水族、布依族、回族人民战斗在贵州东部、南部广大地区，打击苗、汉地主、豪绅，和以汉民为主体的号军互相呼应。

一八五五年十一月，红号军在铜仁起义（贵州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用红、白、黄、青等颜色的头巾、号挂、旗帜区分队伍，故称为号军）。一八五八年一月，白号军在思南府城北的鸚鵡溪起义，占领龙泉县南的偏刀水作为根据地。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三月，黄号军在不平越起义，一八五九年七月，青号军在仁怀起义。一八六〇年，太平军进入贵州（石达开部属），清军乱作一团，恼怒万状，无力对付起义军，苗军、教军势力更盛。贵州西北部的苗民在陶新春领导下起义，与张秀眉军相呼应，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几乎完全垮台，仅余省会贵阳和一些孤立的都市。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六五年调湘军入黔镇压，受到号军、教军、苗军的顽强抗击。一八六七年清政府又先后从云南、四川、广西抽调军队围攻起义军，清军有洋枪洋炮，又有外国侵略者随队教练，起义军受到了很大损失。一八六七年清军攻陷猪拱箐，苗军首领陶新春被俘牺牲。一八六八年二月黄号军根据地荆竹园失守，五月白号军根据地偏刀水陷

落。号军损失几尽，苗军失去了一支有力的友军。一八六九年湘军攻台拱，起义军大破湘军，取得了一次很大的胜利，但孤军作战，局面越来越困难。一八七〇年台拱失守，张秀眉率余众退入深山，坚持战斗。一八七二年，张秀眉被俘遇害，贵州各族人民坚持了十八年的反清起义，被绞杀在血泊之中。

二、云南彝、回民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激荡下，云南彝族地区的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一八五六年，苏辉祖、罗朝凤领导彝、汉人民在巍山举行抗粮暴动。一八五七年，顾祖保率领彝族人民在武定起义，占领州城，得到了富民、罗次、禄劝、元谋等县彝、汉人民的响应。同年，路南、宜良、陆良、澂江等县彝、回各族人民举行联合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封建势力。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七六年哀牢山爆发了彝族雇农李文学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早在一八五三年秋天，镇南县（今南华）爆发了彝族贫民杞采顺领导的彝民起义，转战于哀牢山麓。一八五四年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四川峨眉人）、李学东（彝族，四川峨边人）因负伤掉队，由广西到了哀牢山区。他们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反清宣传，深得彝族贫苦农民的拥护。一八五六年五月，彝族人民在天生营（弥渡县）誓师起义，拥戴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当众任命王泰阶为“参军”、李学东为“上将军”，提出了“铲尽满清脏官，杀绝汉家庄主”的战斗口号，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发布了讨清檄文，檄文慷慨激昂地说：“我哀牢彝民，历受汉庄主欺凌，

僻居山野，贫苦为生，几十世矣。自满贼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彝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白发爹娘，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方今刃及颈项，岂容奢冀免死？矛逼胸膛，何望乞怜求生？本帅目睹惨状，义愤填膺，爰举义旗，驱逐满贼，除汉庄主。望我彝、汉庶民，共襄义举，则天下幸甚，我哀牢庶民亦幸甚！”^①农民政权还宣布“庶民原种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执行“不分彝汉，彝汉同利”^②的政策，并注意团结其他少数民族，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汉、回、苗、傣、白、哈尼等族人民陆续加入起义队伍。彝民起义逐渐汇聚成为哀牢山区各族人民联合进行的反封建、反压迫斗争。哀牢山北距大理不远，彝族起义军和回民起义军声势相连，互为犄角。一八五六年起，他们屡次配合作战，打败清军。到一八六八年，起义军控制了哀牢山区的巍山、弥度、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源、新平、元江、墨江等十余县的大部分地区，生产逐步发展，铁工具、武器等都能自己制造。一八七〇年，清军疯狂反扑，王泰阶战死。一八七二年，李文学率兵三千援助大理回民起义军，又被俘牺牲。余部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战斗，英勇不屈。一八七六年，哀牢山区坚持战斗达二十三年之久的云南各族农民起义最后失败。

云南回民起义爆发于一八五六年。回族在云南与汉族杂居，分布很广。清政府对回、汉人民实行民族压迫，经常制造回汉纠纷，从中操纵取利。一八五四年回、汉豪绅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发生矛盾，清地方官吏挑起武装械斗，进而以

^{①②} 刘尧汉，《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第二十三——二十四页、二十八页。

“阴谋作乱”为名，在昆明等地对回民进行大屠杀，激起了回民的剧烈反抗。一八五六年，云南各地回民纷纷起义。不久汇合成两支，一支以马德新、马如龙为首，活动在云南东部、南部地区；一支以杜文秀为首，活动在云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的起义队伍，在汉、回人民的支持下，占领了大理，建立了政权。大理政权实行了整顿变法、减轻赋税、保护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得到了汉、彝、傣、景颇、纳西等各族人民的支持。东部、南部的回民武装包围了昆明，屡次打败清军，云贵总督恒春自杀。但后来马德新、马如龙被清政府用高官厚禄和分化政策所收买，二马成了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走狗。

云南回民起义后，英、法侵略者认为是乘机侵略云南的好机会。法国派出“调查团”到云南进行阴谋活动，没有结果，以后就专力帮助清政府，供应清军大批军火，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勘查红河的权利，从事对云南的侵略活动。英国也派遣特务到云南活动，妄图控制大理政权。杜文秀竟接受了部下刘道衡提出的“请大英大法二大国速灭清朝以定中华”，“永为二大国不侵不叛之臣，而更为之效死”的卖国建议。一八七一年杜文秀派人前往伦敦乞援。后来，大理政权日趋衰微，英国侵略者的阴谋没有得逞。一八七二年，清军攻陷大理，杜文秀服毒自杀。次年，清军继陷腾越等地，云南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一八五九年十月，李永和、蓝朝鼎在云南昭通率部起义，随即向四川进军。他们从云南昭通前往四川时，只是一支不到百人的队伍。到了四川攻克自贡以后，当地农民和盐场工人大批参加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一八六〇年十

一月成了一支三十万人的起义大军，势力遍及整个四川。但是起义军的活动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上，政治上缺乏一套纲领措施，组织上分散活动，不相统一，战略战术也处于散漫的流动式的活动阶段。清政府调湘军入川镇压，一八六二年蓝朝鼎在突围中牺牲，李永和也被俘牺牲。蓝朝鼎余部由蓝朝柱率领活动于川北、川东和鄂西。后来进入陕西和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的入陕军会合。

三、西北少数民族起义

西北回民和云南回民一样，受着重重的压迫和剥削。到了同治初年，兰州一隅已经发生饿殍载道、人相食的惨象。一八六二年三月，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部入陕。六月，四川农民起义军蓝朝柱部入陕。陕南一带回民在洪兴、任武号召下纷纷起义响应，占领了渭水两岸的华州、大荔、渭南、高陵、临潼等地，打得地主团练、清军闻风而溃，起义队伍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屡次围攻省城西安，大败清钦差大臣胜保军于潼关，震撼了整个西北，甘肃河州、西宁、肃州（酒泉）的回民也相继起义。清政府改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陕，采取分化手段，收买起义军首领叛徒孙玉宝，致使起义军受挫，一八六三年，洪兴、任武牺牲。一八六四年，川滇起义军蓝朝柱在盘屋与多隆阿军激战，击毙多隆阿，蓝朝柱被俘牺牲。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回救天京，洪兴、任武的余部退入甘肃。甘肃回民也展开大规模的反清活动，金积堡、河州、肃州成为三个起义的中心。陕西也继续有起义军兴起，其中以陕北董福祥一支势力较大。西捻军又进入陕西，与陕、甘回民军互相呼应，西北回民革命势力进一步发展。

一八六七年春，清政府命刽子手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收买了回军叛将董福祥，把他的部下十余万人加以改编，配合自己所带来的老湘军，用洋枪洋炮向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展开疯狂进攻，到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攻破陕甘回民起义军最后一个中心肃州城，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左宗棠，每占一城，纵兵大杀，西北人民称他为“左屠夫”。

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也掀起了规模很大的反清斗争。一八六四年，新疆回族、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清起事首先在库车爆发，南北各城纷纷响应。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等地反清政权林立。这些政权先后为反动封建主所窃夺，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分裂祖国活动，英、俄两国乘机侵略新疆，其经过将在下面的边疆危机一章中叙述。

第五章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甲午 战争前中国社会經濟 和階級关系的变化

第一节 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控制的 加强及其对华经济侵略的扩 大和深入

一、外国侵略者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全面地勾结起来，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流的人民革命。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政府加强控制，清朝统治机构迅速半殖民地化，在中央和地方出现了适应外国侵略者需要的新机构。

首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和西太后发动了适应外国侵略者要求的宫廷政变。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英、美、法等国的交涉事务是由两广总督兼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改以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务。侵略者曾屡次要求清政府建立专门机构，改派中央大员和他们交

涉,《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就指名要卖国求荣的奕訢出任这个新机关首脑。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照会清政府威胁说,他不承认任何地方官吏有权办理外交,从今以后只认奕訢为交涉对手。奕訢等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旨意,奏请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八六一年,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管理大臣。奕訢签过《北京条约》,桂良签过《天津条约》,文祥曾任粤海关监督,三人都是有媚外经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名义上是管理和各国有关的一切事务,如外交、派遣留学生、购买铁路器材、枪炮、兵舰、聘请工程人员等等,实际上是适应外国侵略者需要,专办媚外、卖国外交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机构,它的设置,是清朝反动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清政府还根据奕訢的提议,在南北口岸分设两个通商大臣^①。经过一个时期的演变,北方的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称为北洋大臣;南方的由两江总督兼任,称为南洋大臣。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不只限于办理通商事务,通商以外的对外交涉也都办理。他们对总理衙门不是隶属关系,只是所经办的事在上奏皇帝时,要行文告诉总理衙门。

外国侵略者又通过支持咸丰帝妃叶赫那拉氏发动的宫廷

^①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四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清政府适应侵略者的要求,于一八四四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一八五九年改由两江总督兼任。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增开商埠十一口,清政府根据奕訢的建议,在南北口岸分设两个通商大臣。南口的通商大臣由江苏巡抚薛焕兼任,北口的称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由奕訢的得力助手崇厚专任。大约经九年长时间的演变,南、北洋通商大臣才分别成为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兼职。

政变来影响和控制清朝统治者。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于一八六〇年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第二年八月死在那里，咸丰帝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年）生的刚满六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咸丰帝遗命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政权。那拉氏在咸丰帝生前，即协助批签奏牍，出谋划策，参预朝政。咸丰帝死后，她一心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力。暗中同在北京经办美国外交的奕訢联络，发动政变，将与她对立的载垣、端华、肃顺分别处死，宣布太后垂帘听政，以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等为军机大臣。这次宫廷政变，是通过奕訢取得英国侵略者的支持的，这使外国侵略者所瞩目的媚外势力掌握了清朝中央的实权。普鲁斯得意地说，外国人“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一个倾心同外国友好交往的派别，并且有效地帮助这一派掌了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①这次政变后，中外反动势力更紧密地勾结起来了。

其次是海关总税务司的设置。外国侵略者在加强对清政府控制的过程中，把持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早在一八五四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外国侵略者就窃取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侵略者又夺去了其他各口的海关。一八六一年一月，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成立海关的总管理机构，隶属于总理衙门。一八六三年，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赫德担任这个职务达四十五年之久），他制订并推行了一套为帝国主义侵略利益服务和大权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海手中

^① 《普鲁斯致罗素密函》。

关制度。由于整个海关为侵略分子所把持，因此，它和总理衙门的隶属关系完全是名义上的。海关总税务司有用人和行政的全权。整个海关的高级人员，包括各级各部门的主管人员，全由侵略分子担任，某些机要部门甚至根本不容中国人参与。中国人任职于海关的，绝大多数属于杂务、差遣等工役性质，少数则办理一般文稿或缮写、校对工作。各海关的税务司，只对总税务司负责，清朝政府的命令如果没有总税务司同意，常被拒绝。总税务司实际上是遵照帝国主义的意旨控制中国的海关，根本无视中国的利益。

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更多的依赖海关的税收，就使总税务司不仅在财政经济上控制清政府，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几乎都有赫德参与其间。马士说：总署“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协助。而总督、巡抚和道台们则总是征询各口税务司的意见，以便照计而行。……外国公使们始终支持它的权威。”^①甚至清政府于一八六七年任命张凯嵩为云贵总督、吴棠为四川总督，就是依据赫德的建议。可见外国侵略者通过把持海关，逐渐对清政府的外交、内政各方面起着直接的支配作用。

第三是外国公使入驻北京控制清朝政府和蒲安臣的出使。两个相互平等的国家，各派自己的公使驻扎在对方的首都，办理两国间的交涉，本来是正常的事，但那时外国派公使驻北京，却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修约交涉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三卷，第四一六页。

中，外国侵略者列为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公使驻北京。他们为什么那样迫切地要求派公使驻北京？早在一八五五年美使伯驾谈到公使驻京的作用时就曾露骨地说：“中国政府，从远方不能驾驭，到了它的身边，它就变得驯顺多了。”^①一八六一年，英、法、美、俄等国公使根据《天津条约》分别入居北京，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凌驾于清政府之上，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在总理衙门办事的署礼部左侍郎薛焕奏称：外国公使“始不过侵我权利，近复预我军事，举凡用人行政，渐行干预”^②。外国侵略者甚至还策划清政府任命帝国主义分子为使臣，派往各国办理“交涉事务”。

一八六八年，清政府在英美公使和赫德的怂恿下，任命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英国人柏卓安为使团的左协理，法国人德善为使团的右协理，又派满族官员志刚和汉族官员孙家谷两人为使团“合办”，组成一个派往有约各国呈递国书和签约的正式使团。这个不伦不类的中国使团于一八六八年二月底由上海启程，四月初到达美国。蒲安臣在纽约的一次宴会上竟胡说：中国已准备邀请传教士“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③。并代表清政府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缔结了《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可以自由在中国设立学堂，可以任意掠夺华工。马士说：“对美国政府来说，主要的实际收获是鼓励中国移民。这点正是加利福尼亚州所殷望的，当时该州……正想要便宜而丰富的劳动力以开发该州的

① 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十五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第四页。

③ 转引自丁名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一七九页。

资源。”^① 蒲安臣使团还到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等国，一八七〇年二月到达俄国，蒲安臣病死，这出愚弄清政府的丑剧才告结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外国侵略者的完全控制中国海关，蒲安臣出使的种种丑剧，都表明了清政府日益买办化，中国社会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二、外国商品输入、原料掠夺的激增及其在中国创办工厂企业

《天津条约》使中国的门户开得更大了；增加了许多通商口岸，其中有的是沿长江深入内地的；洋货进口税更轻了；鸦片成了合法商品；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之手。一八七六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一八八一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一八八五年的《中法越南条约》中都有关于通商的条款，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这些不平等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廉价原料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进口的工业品和出口的工业原料如棉花、丝、大豆等迅速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快从出超变为入超，入超不断增加。从一八七一年到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指数：1871—73=100^②

年 份	出口	指数	进口	指数	出超(+) 入超(-)
1871—73	110	100	106	100	+ 4
1881—83	108	98.2	126	118.9	- 18
1861—93	167	151.8	219	206.6	- 52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一四——二一五页。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六十四页。

在这期间进口(表一)出口(表二)①主要商品数量增减如下:

表一:

年 份	鸦片(公担)	棉 布 (百万元)	棉纱(公担)	棉花(公担)
1871—73	37,408	32.0	37,791	151,491
1881—83	42,777	28.5	118,020	106,373
1891—93	43,558	44.9	704,877	54,567

表二:

年 份	茶(公担)	丝(公担)	豆(公担)	棉花(公担)
1871—73	1,022,159	37,529	57,506	8,486
1881—83	1,238,145	39,345	84,760	17,473
1891—93	1,055,064	59,946	760,522	290,417

从以上两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进口货中轻工业品迅速上升,棉纱在二十年中几乎上升二十倍之多。到九十年代,从进口货的价格计算,棉纱布已居首位。据统计,一八九二年进口的一亿三千五百万海关两的商品中,棉纱和棉布占五千二百万海关两,棉花的入口在八十年代后下降了。这些进口的商品特别是棉纱棉布,从量上说是大大地增加,从单位的价值说则是降低了。以英国进口的棉纱棉布为例,棉纱进口量从一八七二年的一〇〇,增为一八九〇年的二,一六四,单位价格从一八七二年的一〇〇,减为一八九〇年七五·六;棉布的进口量,从一八七二年的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七十四页。

〇〇,增为一八九〇年一二七·一,单位价格从一八七二年一〇〇,减为一八九〇年七六·六。价格为什么下降?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英国每个工人在棉纺织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如以一八二九——一八三一年为一〇〇,一八五九——一八六一年纱为二七三,布为七〇八;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纱为五二六,布为九三二。第二,进口的税率降低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税率最高是百分之三十二点五,最低为百分之十三点四,平均为百分之十九点九。鸦片战争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税率平均为百分之六左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入口税率平均减少到四点九八,实际缴纳只及法定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洋货运销内地只纳百分之二·五的子口税。这就造成纱布输入量日增,价格日益倍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必然加速中国手工业的解体,阻碍新兴的近代民族工业的成长。

外国廉价商品输入的增长造成中国手工工业的破产,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形成广大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业原料市场。外国资本为直接掠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在中国投资创办工厂企业。

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五〇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技术工场就有四所(英三个美一个),除一个柯拜船坞外,其余三个是为了印圣经等反动宣传品的印刷工厂。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七〇年,外商在上海、厦门、广州等地设立工厂企业三十八所,其中大多数是船舶修理、食品加工、公用事业(如一八六四年大英自来火厂和一八六六年法国自来火厂,制造煤气)和印刷等工厂,它们主要是为商品侵略、文化侵略以及生活上的需要而开设的,不是以资本输

出为目的的。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①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外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数量和资本额都大有增加，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〇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为止的二十四年间，外商在中国创办的工厂企业共五十九个。外商所投资的行业也扩大了，除了上述行业外，他们还投资于蛋粉厂、制糖厂和樟脑制造厂等，一八八〇年之后，更扩大到火柴、造纸、肥皂、制革、造锅、玻璃、制冰、纸烟等行业。

以上这些工厂企业，除了六个设在汉口、九江外，其他都设在沿海几个城市，而更多是设在上海。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沿江开办近代航运业，和在少数几个城市开设工厂企业，促使了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

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近代工厂企业，可以直接利用中国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制成商品以后又可以马上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这样就不但获得了惊人的暴利，而且还可以凭借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和不平等条约的护符，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三、侵略者侵犯沿海沿江航运权利和控制我国金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同意他们的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八二页。

兵船往来于通商口岸，这是武装侵犯中国领海的严重问题。实际上外国兵船侵犯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所在的沿海，他们把兵船自行开入长江，远至汉口。那时黑龙江是中国的一条内河，俄国兵舰就擅自航行于黑龙江上，横冲直撞，无恶不作。

同时，大量外国商船，包括那些和中国没有贸易关系的北欧国家的商船，航行于中国沿海，擅自在中国口岸之间装载客货，肆意侵犯中国航运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内河口岸的开放，侵略者对中国航权的侵犯也扩大了范围，他们的商船深入内河，甚至组织了专营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的轮船公司。美国于一八六一年在香港和上海设立旗昌轮船公司；一八六三年英商在上海成立会德丰和上海拖驳公司，一八六四年在津沽成立大沽拖驳公司；一八六五年英、葡商人创立香港粤澳轮船公司，航行闽粤沿海一带。一八六七年英商又在港沪等地成立中国航业公司，一八七五年开始长江的航行，因系太古洋行所经营，后来即称太古轮船公司；一八七七年英商在港沪等地成立印度中国航业公司，一八八一年开始了长江的航运，因系怡和洋行主办，故名怡和轮船公司。一八八三年英商在香港举办道格林轮船公司，一八八四年在上海设祥泰木行，专载华中一带的木材；一八九〇年在香港办鸿安轮船公司，主要航线是长江。此外，一八九〇年德商瑞记洋行代理的汉美轮船公司，一九〇〇年参加长江航运。一八九二年俄国创办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这些外国人所办的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海上和内河的航运事业，控制了中国的水上交通命脉，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航运权利。例如一八七七——一八九二年间，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

船的只数、吨位对比如下：^①

年 份	中 国 船 只			外 国 船 只		
	只数	吨 位		只数	吨 位	
		实 数	百分比		实 数	百分比
1877	5,104	3,908,034	36.7	8,604	6,727,591	63.3
1882	5,105	4,667,753	29.0	14,502	11,434,821	71.0
1887	6,402	5,508,178	26.0	17,037	15,641,348	74.0
1892	8,246	6,308,523	22.2	20,728	22,101,633	77.8

沿海沿江外国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严重打击了帆船航运业，并使许多内地运输改由海运，造成了大量中国水陆运输工人的失业。

侵略者在控制中国航运的同时，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企图在中国兴修铁路，屡次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均被拒绝。后来英商擅自组成吴淞道路公司，于一八七六年建成十五公里长的吴淞铁路。清政府随即赎买予以拆除。一八八七年洋务派成立中国铁路公司，募集外国资本百万两，由汇丰银行一手包办，这是我国铁路借款的起始，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攫得铁路权益的开端。铁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我国的过程中开始起着作用。

毛主席教导说，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二二一页。

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①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而半殖民地化了。

为了侵略的必要，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设银行，利用银行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一八四八年，英国第一个在上海设立东方银行，一八五四年设立有利银行，一八五七年在上海、香港分别设立麦加利银行，一八六四年英国又在香港设立汇丰银行，第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于一八八九年在上海设立东方汇理银行。德国于同年在上海设立德华银行。日本于一八九三年在上海设立横滨正金银行分行。到甲午战争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开设了近十家银行，而中国自己却连一家也没有。这些外国银行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剥削中国人民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外国银行开始时的主要业务是商业上的支付，如棉花、鸦片贸易的贴现等，以支持洋商的商品侵略。后来逐步发展到操纵中国的国际汇兑，发行纸币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它们还吸收中国地主、官僚、富商手里的游资，转手之间或是贷给清政府，以获得高额利息，并取得种种特权；或是支持帝国主义在华厂矿的发展，以压制中国民族工商业。

外国侵略者还通过银行的放款，逐步形成剥削网。由于外国银行的设立，中国旧式的钱庄、票号渐形没落，有的则仰求于外国银行成为它们的附庸。外国银行的放款往往通过被它们所控制的钱庄、票号深入到中国内地，再控制内地的封建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从事搜括掠夺。这样，外国银行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一——五九二页。

通过买办、钱庄、票号、商业高利贷资本，逐渐形成了一个掠夺剥削网，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总之，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人民大肆掠夺，残酷压榨，严重地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异常贫穷，而帝国主义吸血鬼们却大发横财，在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旁“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①！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第二节 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和洋务派的尊孔卖国思想

洋务运动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而发生的。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奕訢等人认为，洋人的“船坚炮利”可以用来战胜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运动。这些人签订卖国的《北京条约》，制订了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军事技术援助，镇压人民革命，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卖国路线。这就是洋务运动的路线。也就是所谓“自强新政”。积极贯彻这条反动卖国路线的，在中央有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在地方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军阀头目，还有后起的大官僚张之洞等。以这些人为头子的庞大的卖国集团，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所执行的反动卖国路线，是以“中学为体，西学

^① 《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六四页。

为用”作为思想指导的。所谓“中学”就是三纲五常孔孟之道，所谓“西学”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那就是一方面借助于孔孟的幽灵，从精神上麻痹革命人民，使之束缚在封建统治秩序的轨范之中；另一方面，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外国侵略者的援助，用洋枪洋炮镇压人民革命，达到维持反动统治的目的。

洋务派认为，三纲五常的孔孟之道是根本，即所谓“体”，这是丝毫动摇不得的，稍有动摇就意味地主阶级的统治动摇，一定要坚决维护它。要维护这个“根本”，必须尊孔，必须抬出他们的“至圣先师”来欺骗人民，使人民不起来造反。清朝统治者，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封建秩序打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尊孔。曾国藩把孔老二捧上了天，胡说孔道是“照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①的经典，孔丘是“圣之盛”者。他惊呼定“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名分的孔道被太平军“扫地荡尽”，清朝的统治危如累卵了。因而他喋喋不休地叫喊：要“教民以孝弟仁义之经”^②，恶狠狠地要“黜邪逆而反经”^③，恢复被太平天国英雄们打倒的礼义人伦。李鸿章亦步亦趋地在他的师傅后面叫嚣：“弭乱之道，以倡明正学为先”^④。即用孔孟儒学防止人民革命。

洋务派认为单靠尊孔还不足以维系腐朽没落的统治，还必须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新式武器才能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

① 曾国藩，《致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一册，《文集》第五十一页。

② 曾国藩，《送江小帆同年视察湖北序》同上书第七十页。

③ 曾国藩，《江宁府学记》，同上书第一四五页。

④ 李鸿章，《请修曲阜孔庙后》，《奏稿》卷十四，第四十八页。

因此，他们除“借师助剿”外，又大批地取用西洋枪炮和兵轮。洋务派说，清军之所以屡被太平军打败，主要是由于“无制胜之器”^①，所以清政府根据奕訢的提议而下谕旨说：“购买外国船炮”是“剿办”太平军的“第一要务”；^②曾国藩赶忙支持奕訢的“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的建议，并提出仿照“试造”的主张。^③他们认为，这样，战胜太平军就可以“计日而待”了。清朝统治者洋务派既要依赖外国侵略者来苟延残喘，就必然要“力保和局”，用国家民族利益满足侵略者的欲望。怎样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呢？奕訢说：“可以信义笼络”。李鸿章说：“以诚信驭之”^④。曾国藩则丧心病狂地一则曰“洋人与我同其利害”^⑤；再则曰洋人“不毁伤我宗庙社稷”，又派兵“助剿”和卖给我船炮，是“有德于我”的“恩人”，应该“报德”。^⑥所谓“信义笼络”、“诚信驭之”、“报德”等等，都是投降卖国的同义语。

由此可见，尊孔和崇洋卖国是清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反动路线，这也是中国的一切反动派搞反革命活动的共同特点。继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之后，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等大卖国贼，都是用的这两手。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继承

① 奕訢等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一页。

② 同上书卷十，第二十页。

③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二册，《奏稿》第四一七页。

④ 李鸿章，《二曾相》，《朋僚函稿》卷二，第三页。

⑤ 曾国藩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第二十八页。

⑥ 曾国藩，《治道》，《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三册，《日记》第三十七页。

了曾、李、袁、汪、蒋的衣钵，一只手扛着尊孔读经的黑旗，另一只手攀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

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还到孔老二那里找到了为投降卖国装饰门面的遮羞布。一八六二年李鸿章刚到上海，曾国藩就指示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①李鸿章心领神会，马上向曾国藩表示：“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保证在同洋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断不与之失和”，做到“委曲周旋，……外敦和好”。^②李鸿章用孔老二“忠信笃敬”办外交的几十年间，签订了大批卖国条约，出卖了大量民族权利。但是，卖国贼的丑恶咀脸不是孔老二的一块遮羞布所能掩盖得住的，李鸿章遭到了各方面的指责和唾骂，他的同僚并告诉他这种做法是“冒险负谤”。李鸿章又从孔老二那里找到摆脱罪责的遁词，他自比于孟轲所说“孔子圣之时者也”的“圣之时”，无耻地声称“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③这个老卖国贼在一八九五年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恬不知耻地援引北宋司马光等孔孟之徒对辽、夏妥协投降的事例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为仁、英之全盛”^④。在他看来，宋对辽、夏投降即“圣之时”者也。孔老二本来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去投靠敌国的无耻之徒。李鸿章把投降

① 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三册，《书牍》第七十七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卷一，第二十五—二十六页。

③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同上书卷十六，第三十页。

④ 李鸿章：《预筹赴东议约情况折》，《奏稿》卷十九，第四十七页。

卖国作为“圣之时”的注脚，这一点他算是说对了。因而借孔老二的什么“圣之时”来掩饰其卖国勾当，只能是妄想。

据上所述，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尊孔卖国。这就规定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求富”口号的后果不是“强”和“富”，而是弱而贫。洋务运动的行动纲领就是李鸿章所说的“联各国之好”和“资取洋人长技”。“联各国之好”，发展为后来的更大卖国投降，“资取洋人长技”，从购买洋枪洋炮举办军用工业，发展到一八七二年后大办民用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海军。洋务运动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共经历了三十五年，最后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二、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

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七二年所办洋务，除购买洋枪洋炮，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主要是湘军和淮军）外，就是大力举办军用工业，以达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维持清朝反动统治的所谓“自强”的目的。这期间所办军用工业主要有：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一八六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洋炮局，雇英人马格里主持，次年又在苏州设洋炮局；一八六五年李鸿章购买美人的机器铁厂一座，将上海洋炮局扩大，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曾国藩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运到，并入制造总局。制造局先造枪炮，一八六七年开始制造轮船，这是洋务派设立的最大一个军火工厂。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聘英、美人译出《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书；选官僚、地主子弟入馆学习，造就机械工程师。同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设船

政局，制造轮船，为当时最大的造船厂；船厂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法文及造船学，后学堂学英文及驾驶术；船政局从一八六八年一月开工到一八七四年五年间共造大轮船十五只，系用法国破旧机器装配而成。用这些质量很差的船编成了南洋水师。一八六七年崇厚在天津设机器局，此局于一八七〇年由李鸿章接办、扩充。以后，不少省份如山东、四川、吉林等都设立了机器制造局。

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官办。各厂的开办费和常年经费都由政府拨款，造出来的枪炮、弹药和轮船，大部份直接拨发清政府各军。经营管理上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营私舞弊、安插亲信。设备技术对洋人的依赖很深，例如李鸿章曾供言：“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①许多工人由清军中的士兵派充；在厂内依然沿用军阀军队中那套管理制度，工人没有任何自由，处处受官吏的压迫。所以这些军事工业是封建的买办性的工业，它们耗费大量钱财，多用于购买外国的设备、原料，有利于外国的商品推销，同时也便于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军事，便于洋务派官僚同帝国主义勾结和增强反动武装。因此，这些洋务军火工业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有害的影响。它是洋务派买办势力的不断扩大，根本不是中国自强的基础。

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举办军火工业活动中，迫切需要懂外文和有一定科技知识的洋务人才。一八六二年在总理衙门下面设立了同文馆。挑选八旗十三四岁幼童进馆学习外国语。

^① 李鸿章：《成船用款片》、《奏稿》卷二十六，第十六页。

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包尔腾作英文教习。一八六三年开设法文馆和俄文馆；一八六六年添设天文算学馆。同文馆每年经费数千两，由海关支拨，因此，赫德对同文馆有举足轻重之势。由赫德介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控制同文馆达三十年之久。同文馆所进行的教育，是崇拜洋人的买办教育，毕业的学生，后来多半成为清贵族中的洋务派。此外，江苏巡抚李鸿章于一八六三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于一八六四年设立广州同文馆，招集生徒学习外国语文及自然科学，学生的出路是当翻译、出国留学和承办洋务。随着洋务活动的发展，还需直接派送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美、英等国那时正企图打着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幌子，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竭力表示欢迎清政府派学生去留学。清政府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的奏请，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分四批选派了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国学习。所需经费一百二十万两，亦由海关供给。此后，清政府还多次派生员到英、德等国学习海军、陆军、船政等。

十分清楚，洋务派在反动卖国路线下举办军事工业和培养洋务买办人才，其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扩大侵略。

三、以“求富”为目的的创办民用工业及其作用

正当洋务派大办军用工业，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人民革命，宣扬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所谓“中外和好”之时，局势发生了变化。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的发生，一八七一年沙俄派兵侵占伊犁，特别是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之战以及屈辱的《北京专约》的签订，使正在高唱“中外和好”的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他们把屈辱的原因归之于

海疆“备虚”，于是大力筹办海防海军事宜。办海防海军需要大量经费，但“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①经费从何而来呢？洋务派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强，是由于它的富，富又系来自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燃料、原料的需要也日益增加。于是从一八七二年起又为了“求富”而筹办煤炭、冶金、纺织等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强与富相因”成了洋务派的口头禅。他们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采煤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權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②又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③这样，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购买洋枪洋炮和举办军用工业，发展为七十年代以后以筹办民用工业、创建海防海军为中心的“富强相因”的运动。

洋务派举办民用性工业的情况主要是：

一八七二年李鸿章指示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等人联络官商招集商股银七十三万两，购买轮船三只，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到一八七七年有轮船三十只。轮船招商局一开办就受到英商怡和、太古和美商旗昌等轮船公司的排挤，它们用降低运费的办法，与招商局进行竞争，使之难以维持下去。洋务派于七、八十年代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三次“齐价合同”，议定统一的运价。其实质就是洋务派在对外国轮船公司妥协，保证它们的垄断权利前提

① 李鸿章：《论海防筹饷》，《译署函稿》第十八页。

②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奏稿》卷十九，第五十页。

③ 李鸿章：《议复傅启原条陈折》，《奏稿》卷三十九，第三十二页。

下，分得一杯残羹。

一八七七年李鸿章任命轮船招商局总董唐廷枢设立开平矿务局，招商股八十万两，官督商办。十余年后，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

一八八〇年李鸿章设立天津电报局。一八七九年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到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乃于一八八〇年奏请设立电报总局于天津。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七处设电报分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洋员恒宁生商定合同，由他代为购料、雇人、勘察线路。一八八一年十二月电线敷设完工，用银近十八万两，由军饷项内垫支。随后招集商股，于一八八二年改为官督商办。

一八八〇年左宗棠设立兰州机器织呢局。全用官款，由德国人石德洛末等主持包办。一八八三年停工。据后来张之洞说：“大学士左宗棠前在甘肃开设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①

洋务派为了筹饷、运兵的需要，也把筑铁路作为办洋务的重要内容。一八八一年首先筑成了唐山至胥各庄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一八八六年延长筑至芦台。一八八七年成立天津铁路公司（亦称中国铁路公司），官督商办。以后向东延筑至山海关，向西延筑至天津、北京。在台湾也开始修筑台北至基隆的铁路。到甲午战争前夕，共筑铁路约四百公里。

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洋务派举办纺织工业。一八八二年李鸿章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官督商办。一八九〇年

^① 张之洞：《查明炼铁厂用款咨部立案折》，《奏议》卷四十七，第十七页。

开车。一八九三年被焚。李鸿章急图恢复，任命津海关道盛宣怀、江海关道聂缉槩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原址于一八九四年设立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官督商办。另在宁波、镇江等地设立十个分厂。此外，一八九〇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局，同一时间还设有纺纱、制麻、缫丝三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官局。这四局有的是官办，有的开始是官商合办但随即收归官办。

洋务派所办冶金工业，以一八九〇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炼铁厂(亦称“汉阳铁政局”)为最大。张之洞看到洋铁输入日益增加，看到他设立枪炮厂后对钢铁迫切需要，在创建湖北枪炮厂的同时，筹设了湖北炼铁厂。炼铁需要铁矿砂和煤炭，于是同时开办大冶铁山铺铁矿和大冶王三石煤矿。所以张之洞说：湖北铁厂“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①。铁厂生产能力可年达二、三万吨，但于一八九四年六月开始炼铁后一年三个月中，只生产钢铁和钢铁制品九千吨左右。张之洞说：汉阳铁厂“购器雇匠，悉资外洋，比之洋铁厂费多本重。”^②建厂中用银五百数十万两，钢铁产品“不敌洋产”。生产无法维持下去，只好由官办改为商办，其实就是交给了买办盛宣怀接办。

此外，还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工矿企业，如一八七五年开办的台湾基隆煤矿，一八八一年开办的热河平泉铜矿，一八八九年开办的黑龙江漠河金矿，等等。

洋务派所办民用性工业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

① 张之洞，《请添铁厂开炼用款片》，《奏议》卷三十四，第二十五页。

② 张之洞，《铁厂征税商情未便折》，《奏议》卷三十四，第二十五页。

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们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而以官督商办为最多，那就是商负出钱和经营的责任，官则“总其大纲”进行“督理”，掌握用人、理财等行政大权。企业具有很大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所需的机器和一些重要设备都靠外国进口；在生产运转方面主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主持；官僚买办在这些企业中操纵一切。既有利于外国侵略者的商品推销和这些企业的控制，使之为它们的侵略服务，也便于洋务官僚贪污中饱，大发横财。这类企业的创办，使清政府进一步依赖和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同时又起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加强压抑的作用。

洋务派在开始创办民用工商业时，对外国资本主义就表示了鲜明的妥协态度。李鸿章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为了“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①；上海机器织布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②。从洋务派的意图看，他们只是在不反对外国侵略的前提下“稍分洋商之利”而已。他们同侵略者一道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在经营过程中，对外国侵略者的依赖是明显的。各厂矿都有洋人染指其间或主持其事是不必说了，拿铁路的建筑来说，依赖更为明显。津沽铁路的修建，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六十三万七千余两，向德国借款四十三万九千余两；钢轨多用英、德造，法国则分得了一些桥梁的修建权，英人金达担任了总工程师。

洋务企业的创办，还为外国资本输入创造条件，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法越

①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奏稿》卷二十五，第四页。

②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奏稿》卷四十三，第四十三页。

南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洋务派的“开关纳客”政策，使侵略势力得以更快地深入内地；轮船招商局、电讯等事业的创办和铁路的修建，加速了洋货运入内地、土货从内地运出；煤炭、金属采掘等工业的发展，则满足了侵略者在华企业的燃料、原料的需要，等等。这使中国国民经济更快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创造了外国资本输入所需要的“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从而加快了我国半殖民地化的步伐，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办时“只准华商附股入股，不准另外开张”的规定，一方面限制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更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生产的棉布相对于中国市场需要量说是非常微小的。

洋务派在妥协屈辱路线下，以“求富”为名举办民用工业企业的结果，是民族工商业受束缚，广大劳动人民愈加贫困，而却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洋务官僚的致富和军阀势力特别是李鸿章淮系势力的扩张。

四、外国侵略者控制下建成北洋海军和海防设施

外国侵略者早就企图操纵清朝的海军。一八六二年赫德怂恿总理衙门购买外国军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当即委托归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李泰国在英政府协助下，购得兵船八艘，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管带舰队，并擅自“代表”清政府和阿思本订立合同，规定这个舰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阿思本负责。一八六三年舰队驶到中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而作罢。一八六六年，清政府根据闽浙总督左宗棠“整理水师”的建议，规定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仿照西法制造兵轮，准备用以装备新式海军。但没有什么成效。

清政府大力筹建近代海军，始于一八七四年“海防议起”。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前，分为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分别属南洋大臣、福建船政大臣和北洋大臣统辖。以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势力最大。并实际遥控着南洋、福建两支水师。一八八五年十月中法战后，清政府为了统一指挥权，设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譞为总办，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实权仍操在李鸿章手中。

李鸿章搜刮大量钱财，向外国大买兵船枪炮，认为是唯一“自强”之策，他尤其强调要购买铁甲兵舰，他说：“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①。从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八年，历时十五年，始建成北洋舰队。在全舰队二十余艘兵船中，向英、德等国购买的达十九艘（英十四只，德五只）。仅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和济远号铁甲快船，便花去了白银四百数十万两。确是外国军火商的阔绰主顾。同时也是洋务官僚贪污自肥的好机会，例如驻德公使李凤苞在购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中，“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李鸿章还恬不知耻地鼓吹“制船不如买船”的谬论。北洋海军的训练，开始聘请英国海军大佐琅威理担任总教习。到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的时候，由于德国在北洋海军中的势力增长，琅威理不得不辞职。代替他的是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英、德在北洋海军中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很激烈。由于赫德等人的活动，琅威理于一八八七年重新担任了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还窃据了副统领的职务。北洋海军在英、德控制下并不认真训练，而是敷衍塞责。以致“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

^① 李鸿章：《议请定购铁甲》，《译署函稿》卷十，第二十五页。

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①

为了培养海军军官，一八七六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送一批学生到英、法学习海军驾驶和作战技术。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任命刚从英国留学回国的严复为总教习，训练北洋海军军官。一八八六年开始兴建旅顺船坞，这个工程是由法人德威尼承包，用银一百二十五万两。由于偷工减料，不合规格，“砖石缝中，有水沁入”。需随时加以修理。此外，还修建了旅顺、大连、威海卫、烟台的炮台，但修建和控制权被以汉纳根为首的德国人所窃取。到一八九一年，是李鸿章“自强新政”的最高峰。李鸿章在《巡阅海军竣事折》中自我吹嘘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②事实上，清政府办海防海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抵御侵略，而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对外抱定投降的李鸿章在办海防之初即曾说过：“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③所谓“力保和局”是清政府妥协投降的代名词，所谓在万分不得已时才“一应之”的“一应”，目的也是为了投降。这种奇怪的逻辑，成了洋务派办海防海军的方针。因此，北洋海军成军和其他海防设施的建成，决不是什么“渤海门户”“深固不摇”，而只能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权势的扩大和巩固。海军经费原定每年四百万两，由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第七》。

② 李鸿章：《奏稿》卷七十二，第四页。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奏稿》四十二卷，第十二页。

于慈禧太后移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园工所费约三千万两，一八八八年停止添船，一八九一年后停购军火。甲午战争前几年间清海军没有什么发展。

五、洋务运动的后果和洋务派的性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洋务派在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革命，以维护封建反动统治乃至维护和扩大军阀小集团的势力和地盘的反动路线下，就决定他们以“求富求强”相标榜而举办的新式工业、新式陆海军的结果，非但不见“富强”的实效，却使中国更加贫穷衰弱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是洋务运动的初步破产，而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则是它彻底破产的标志。中国被更快地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林彪的投降卖国路线，与洋务派的路线如出一辙，其所鼓吹的“民富国强”谬论，后果也必然与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强求富”一样，使中国重新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泥坑。但今日已非洋务派活动的时代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林贼的险恶用心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我们可以看出，洋务派是依靠外国侵略者，创办新式工业和新式海陆军，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一意妥协，发展个人或小组势力的官僚买办集团。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买办原产生于进出口贸易的流通领域。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便于对华侵略，在中国百般物色和扶植走狗。它们在鸦片战争后，首先在通商口岸物色了一些商人，来帮它们推销商品和掠购中国的原料；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大，它们又培植了一批买办安插在它们在华开办的银行、洋行公司和

厂矿中,充当各类侵略助手,买办的人数就进一步增多起来。买办们在洋务运动中替清政府向外国购买军火、船只;同时从经手这些买卖活动中,又产生了一些买办。买办们凭藉外国侵略者的势力,参预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企业乃至政治活动。有的被洋务官僚保举为清政府官吏或取得官衔。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取得福建候补道官衔。盛宣怀由杨宗濂推荐当了李鸿章的幕僚,随后为李鸿章向英、美、俄、德等国洽买军火,当上了天津海关道,后来更是直接插手清政府对外事务,成为卖国“有功”的名臣之一。买办逐渐官僚化了。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洋务大官僚得到买办势力的支持,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更加密切,越来越买办化。尤其是淮系头目李鸿章,是实际主持洋务活动的人,他对外一意主降,一心顺从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办事,买办的程度更浓。官僚日益买办化了。这种官僚买办化,买办官僚化,逐渐形成为官僚买办阶级。

洋条派这个官僚买办集团,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分裂剥削政策下,形成为相互对立的小派系。帝国主义列强在侵华利益上是有矛盾的,为实现各自的侵略权益,必将培植自己的走狗,洋务派分裂为几个小集团是必然的。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在上海受到买办和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影响较深,军队的洋化最快,力量迅速超过湘系。李鸿章本来是亲英的,一八七〇年调督直隶,开始建立北洋地盘;一八七六年他在烟台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时,结识了德国人德璀琳,在德璀琳的影响下,逐渐疏英而亲德。英德两国分别控制了北洋海军,北洋的企业经营也大多在英德操纵下进行的。李鸿章后来又逐渐亲俄。李鸿章对于美国则是始终如一的崇拜者。湘

系左宗棠，首先是亲法。湘系长期盘踞着两江总督职位，这里是英国的商务中心地区，左宗棠等湘系军阀又成为亲英派。后起的张之洞系，缺乏实力，倾向湘系，由两广总督到两湖总督，始终在英德尤其是英国的影响之下，因而基本上也是一个亲英派。洋务集团各派系，为了发展自己力量，在他们后台帝国主义帮助下，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发展军队，经营近代企业，这就加速了中国经济政治不平衡的发展。酝酿着军阀的割据。

由此可见，洋务官僚买办集团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它代表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极端的反革命派。毛主席教导说：“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①

第三节 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

一、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和农村阶级分化的加速

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商品日益增多地倾销于中国，使中国原有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中特别是手工棉纺业受到的打击最为明显。例如一八八七年的山东烟台海关报告说：“据了解本省土纱纺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二页。

织几乎停歇。”^①江苏太仓一带原先是纺织业很发达的地区，到一八九〇年以后，“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原因是“民间自轧自弹，反不如买机器纱之便宜”。^②江西省自“光绪中岁以后，筵布（即手工纺织的土布）之业湮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③。

家庭手工业受到打击，农民所种植的棉花、蚕茧等只好拿去出卖，同时帝国主义又勾结封建买办势力强制农民种植他们的企业所需要的农作物然后廉价收买，于是大量的农产品商品化了。城市手工业受到打击，造成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

农产品商品化，是逐渐扩大到广大农村的。以棉花为例：江苏省华亭县原来主要是种稻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为了出卖棉花获利，“改禾种花者比比焉”^④。远在内地的陕西，“一向都是种谷，清朝末年，种棉花的渐多”。由于外人收购，亦促使许多经济作物扩大生产，如江苏江阴县“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设行收购，……育蚕者骤增”；直隶深州在“光绪十年许后，花生之利始兴。……外国购之，用机器榨油，转售中国取利”。其他如烟叶、大豆、芝麻、麻等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发展情况，也大致与棉花、蚕茧、花生等相同。粮食也在商品化，但这决不是粮食有多余，而是更加贫困化的表现，因为尽管农民缺粮，但为了济急用而不得不出卖，真所谓“医得眼前疮，割去心头肉，来岁春荒在所不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二〇八页。

② 何良栋，《利国宜广制造论》，同上书第二一八页。

③ 《南昌县志》，同上书第二二〇页。

④ 《华亭县志》，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四一九页。

免”^①。

商品化的农产品，主要被帝国主义所掠夺，见下表：

历年农产品农产制成品输出统计^② 单位：公担

年份	丝	茶	豆类	棉花	油类	烟叶
1868	57,346	1,440,871		38,141	261	737
1878	67,343	1,898,955	20,522	23,310	10,079	11,122
1888	76,780	2,167,460	39,985	202,546	64,952	67,128
1898	108,821	1,538,600	2,348,781	273,739	357,976	371,137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的日益增加的趋势。但表中数字并非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完全的数目，因为还有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创办的纺织、食品工业和洋务派及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所收购的农产品没有包括在内。

封建统治者的搜括、地主剥削的日益加重，促使农民更加贫困化，对于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加速，也起着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政府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和赔款的费用，为了筹划用于镇压人民起义所需的费用，加重了全国的税收。七十年代国内人民革命被镇压，并没有因此废

① 上引几段资料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二五七、四三六、四三七、三九八页。

②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三八七页。

除那些因反革命战争而增加的苛捐杂税，相反，在举办“自强新政”名义下，加紧对内搜括；借着“开海军税”而卖官鬻爵，“二、三千金得实缺州县，四、五千金得实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实缺道，皆以特旨简放”。这些用钱买得州、县、府、道的官吏，“将本求利”，任意勒索。洋务官僚都在镇压人民革命和洋务活动中大发横财，李鸿章更是“富甲天下”，他临死时的家产竟达四千万两。人民、特别是农民遭受的剥削日益沉重了。清政府在加重田赋征收方面常常巧立名目，向各省加征田赋，例如四川省从咸丰年间至光绪三年间加派的“地丁银”连同浮收在内，大县增加九倍，小县增加四、五倍。从名义上说，当时的田赋是由清政府向地主收的，但实际上仍是由地主转嫁到农民头上，这一点当时的人就已讲得很明白：“田赋虽征诸地主，而负担实转嫁于佃丁也。”^①因此，田赋的不断增长，使农民头上的负担也不断加重。

清政府在不断加征田赋的同时，还玩弄种种把戏，在征收时外加“加耗”、“折色”、“平余”、“倾工”、“扛兑”、“司房”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使得实际征收的往往比名义规定的要多出很多。

各地地主还拚命加重地租剥削，一般地区的地租大都达到占生产物的一半以上，例如江苏在一八八四年的地租占生产物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浙江在一八八三年占百分之七十，江西在一八八八年为百分之五十。当时广大农民受沉重的剥削，生活已极度贫困，反动政府又只知搜刮，对生产毫不注意，河道失修，水旱之灾频繁，农业生产率下降，好年成一

^① 沧江：《湘乱感言》，见《国风报》第一年第九期。

般地区每亩也只能产谷二、三担，或者更少，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不足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还要交出收获量一半以上的地租，这对农民是极其沉重的剥削，遇到年成不好，更是无法交地租。而原先农民用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也因外国机制纱布的大量输入逐渐被淘汰，在无法交税交租时，只有求之于高利贷。高利贷资本比之以往更加活跃。《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中说，广东商人贩运香港广州花布到广西各地贩卖，他们做生意的办法，赊货还谷，赊货时抬高物价，还谷时又照高利伸息计算，一进一出，赚钱十倍。当铺、钱庄放的高利贷，利息均为三分，紧用时四分、五分也有，借谷和欠租的，一石还一石半。八十年代前后，贫苦人民受高利贷盘剥更为严重。当时有人奏称：“肩挑背负之民，得钱数千以为资本，每日小贸可以糊口。无如资本无出，而为富不仁之徒，又从而盘剥之，既取其倍称之息，又迫以至促之期，数月之间，已经一本一利，转辗剥削，民困弥深。”有许多外国银行及买办控制下的钱庄、当铺，在放高利贷时规定受贷农民要种植棉花、烟叶、豆类等经济作物，以便于掠夺原料，农民们无奈祇有接受这些苛刻条件。当债务无法清偿及赋税无法完纳的时候，只有出卖自己微量的土地。外国传教士又用欺骗、强买、霸占等手段侵占农民的土地，土地更加集中于少数地主（包括佛寺、道观、洋教会、高利贷者）手中，更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流离失所，乞讨过活。

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

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在这一条件下发生了。

必须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等条件，主要是为外国侵略者所享用，民族资本主义不过吃其残羹而已。十九世纪下半叶既已具备了劳动力和商品的市场这些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必要数量的货币持有者就可能和必然使之转化为资本，一部分地主、官僚、富商巨贾、买办商人等将长期剥削掠夺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财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了。他们之所以把积累的货币投资于工商业，除由于他们看到外国侵略者经营近代工商业利润很高，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可以攫取高额赢利外，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期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很多地主、官僚逃亡到上海等沿海城市，大量货币也流入这些城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五九〇页。

市；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采取保护地主的政策，实行反攻倒算，恢复了地主的统治，但地主官僚们遭受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心有余悸，而太平天国失败后小规模农民起义，尤其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反对洋教斗争的蓬勃发展，他们购买土地的兴趣降低，而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生，最早的是机器缫丝业。一八七二年，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办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缫丝厂，总资本为三万六千元。此后陆续有人举办同类企业，到九十年代初，广东境内民族资本办的缫丝厂达五、六十家，大的每厂有工人七、八百人。一八八二年，上海也出现几家民族资本的缫丝厂，但由于在上海早已有帝国主义的缫丝厂，民族资本的缫丝厂处处受排挤，发展很困难。

有一部分地主、富商还曾经试办过棉纺织厂。一八七八年，上海有几个绅商上书给李鸿章，呈请开办新式棉纺织厂，李鸿章却一开始就把这类企业置于洋务派的控制下，他在自己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规定了所谓“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许另行设局”的办法，致使民族资本棉纺织厂到九十年代初才在上海办了两个，直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本棉纺织厂才较快发展，成为后来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中最发展的部门。

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一年间，天津、上海、福州、北京等地均设立了规模不大的机器面粉厂。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慈谿、太原等地都先后建立了火柴厂。机器造纸业在甲午战争前有两家，一在广州，一在上海。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还创办了十几家新式印刷厂，其中上海

的同文书局，雇佣工人达五百人。甲午战争前，在上海、广州、汉口还办起几家船舶修造厂，上有几家机器修理工厂，这些厂规模均较小。此外，一八七九年在广东汕头还办了一个机制豆饼厂，一八七五年在福州办了三个砖茶制造厂。其他如玻璃、制冰、碾米、制糖、制药、木材加工等工厂均在上海、福州等城市出现，规模都较小。

新式工业的举办，推动了民族资本向采矿业方面发展。八十年代前后开办了安徽池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枣庄煤矿、广西富川贺县煤矿等。这些煤矿大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小的只二万两。

民族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也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在甲午战争前主要有：一八九〇年设立的上海鸿安轮船公司，汕头小轮公司；一八九一年香港、广州轮渡公司；一八九二年杭州戴生昌轮船公司；一八九三年汕头南记行号等，规模都不大。

总计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一八九四年，民族资本先后举办的厂矿企业有一百多个，资本总额为两千几百万元。其中有些中途夭折，有的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竞争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采用外国的技术设备新创办起来的，如船舶修造、机器修理和棉纺织工厂等，但技术比外国企业落后；另一种是在原有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在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影响和刺激下，添置一些机器和采用一些新技术，印刷、缫丝和造纸等行业中便是如此。民族资本在经营轻工业时，往往不是一次购置企业所需的全部机器，而是逐步地从使用简单的

不完善的机器到使用比较完善的机器的。例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开始仅购用日本的手摇机，成功后才进一步购用蒸汽机。缫丝、印刷等行业也有同样的情形。这里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但还是有它自己的发展线索可寻的。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的即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和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当时，帝国主义已控制了在中国很多经济部门，多方排挤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清政府和洋务派也对民族资本进行压制。因此，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从产生之日起，就很脆弱，只能缓慢发展；而且在资金、规模、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比不过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正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脆弱，它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依赖性。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发展时，为了赢利，一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有斗争，但同样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转而依靠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首先表现在技术方面依靠外人，机器设备来自外洋，甚至某些原料也购自外洋，技师更是高价聘用洋人；企业愈大，这种对外的依赖性愈大。其次，民族工业在资金方面对外国资本也有依赖关系。不少工矿企业需向外国银行借款或吸收一部分外国股份，以资周转，到后来有一些工厂为外国资本所吞并。再次，有些民族工业企业的生产销售都对外国有依赖性，如缫丝、制茶、和轧花等行业要依靠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掠夺性的进出口贸易；制冰、木材加工等业则是为了

租界内的消费。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对外国资本的这种依赖性，它大多设在上海等外国资本势力最强的地方，以寻求从动力、资金到生产、销售的便利。

民族资本对封建势力同样存在依赖关系。民族资本为了赢利，同封建主义有矛盾有斗争，例如打破封建控制，在赋税方面要求享受与外国资本主义同等权利，等等，但同样为了赢利往往转而依靠封建势力。新式采矿业需要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和有势力的官吏的支持；需要地方政府代为保护矿厂和管束镇压工人；需要获取减免税厘的特权，以便利运销；有时甚至还需要清政府保证一定的销售市场和资本的支援，等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不仅在生产经营方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依赖关系，而且那些投资新式工业的资本家，绝大部分就是从地主、官僚、富商、买办转来，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转为资本家后仍在农村拥有土地，出租给农民；有些人还是清政府的在职官吏或候补官吏。所以，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伴随着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产生，出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别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也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总是要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完全适用的。

除了这个共同的特点之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决定了它是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是指什么呢？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①

毛主席还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②，他们即使在参加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全分裂，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而且准备随时动摇变节，向敌人妥协，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这两大基本任务，他们都不能解决。毛主席教导说：“中国反帝反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二—一六〇三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三页。

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①

三、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伴随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产生而出现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促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还有两个重要社会条件：一个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个是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一部分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员，不甘心外国侵略者的奴役，要求自强，也担心清政府将被日益高涨的群众反抗风暴所摧毁，主张革新。他们要求学习西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稳定清政府的统治，从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使自己成为当权的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种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到了八十年代有了初步发展，在若干上层人物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得到传播，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主要有：王韬、马建中、薛福成、郑观应、陈虬、陈炽等。他们自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大都同洋务派官僚有很深的关系，也同外国人有来往。例如：王韬（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年），长期依靠外国传教士，一八六七年冬随

^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一页。

传教士理雅各游学英国，一八七三年在香港办《循环日报》，与洋务官僚丁日昌很有交情。他不时向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条陈”“管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及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的“善后事宜”。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〇〇年），于一八五二年即与其兄马良（相伯）至上海教会办的徐汇公学读书，一八七六年洋务官僚派留学生到英法学习，马建忠随往法国学政法，回国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八十年代的中外许多交涉，马建忠多曾参预或是主要代表。历任驻朝鲜外交官员、轮船招商局总办等职。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是一个有心“经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八六五年以副贡生入曾国藩幕，后又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以办洋务有“功”，擢至道员。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四年担任清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本来是“日与西人游”的买办，后来为李鸿章延揽经办洋务，他先后经办过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沪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等洋务企业。这些人都曾经是洋务运动积极参加者和洋务路线的贯彻执行者。

但是，这些人在洋务活动中，不是主要当权者，他们对洋务派头目们的倒行逆施逐渐表示不满，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主张向西方学习，不仅学习其先进技术，而且要学习其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洋务派专搞船坚炮利和办一些新式企业，只是西学的皮毛，不能使中国富强。要求清政府以西方强国为榜样，作些政治方面的改革，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侵略。这样就使他们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士大夫，也有别于洋务派官僚和买办。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他们通过写书、写文章，发表变法言论，传播改良主义思想，

在知识界逐渐形成一股改良主义思潮。从一八七七年开始，马建中陆续写了许多文章，后来汇集为《适可斋记言记行》。一八七九年，薛福成著《筹洋刍议》，一八八九年出使外国后著《庸庵海外文编》《出使日记》等。一八八三年，王韬把他在七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辑成《弢园文录外编》。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将其早年所著《易言》增删为《盛世危言》。同年，陈虬作《救时要议》、《经世博议》。陈炽的《庸书》大约也在九十年代初完成。其中《盛世危言》一书涉及的内容较广，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改良主义思潮的全貌，基本上概括了那个时期这批人的一些主张。

早期改良主义者都强调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中国也应该变。他们相信“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郑观应说：“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①，越变越进步。王韬特别称许法家理论实践家秦始皇，说：“自祖龙崛起，兼併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②，是适时而变的进步表现。他们要求改变中国的现状，但主张只能一点一滴的变，不能彻底的变。他们主张变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是：第一，要求改变被侵略的地位。从这点出发，他们揭露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和外国传教士为非作歹的行为。薛福成认为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给中国造成无穷之患，应该设法修改。马建中指出：由于协定关税，使中国的利源尽为外人所夺，要求实行独立自主的关税政策。郑观应揭露外国传教士挟制地方官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

吏，偏袒教民横行乡里，欺压良善，并且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标榜的国际公法是强国用来欺压弱小国家的工具，如果国家太弱，虽有国际公法，仍不免隐忍受屈以至灭亡。他们认为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才能改变被侵略的地位。第二，要求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是“以工商立国”，所以国势强盛。在“振兴商务”的口号下，他们提倡“民间自立公司”，“富人出其资，穷人出其力”的资本主义剥削，又提出“商战”的口号，同外国进行竞争。郑观应认为，如果能这样做，“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国既富矣，兵奚不强”。^①这里，虽然反映了抵制外国侵略的要求，但是，所谓“国富”，是要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富起来，所谓“强兵”，是用来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第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种，认为君主专制君权太重，民主共和太偏激，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政治）最合适，可以使君民之间“权得其平”，是最理想的制度。对于这点，早期改良主义者只是一般的议论，还不敢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因为他们害怕触犯清朝君主专制制度。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上述言论和主张，尚未形成系统的变法理论，但已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微弱的要求表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仅仅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作某些枝节的改革，以便使地主、资产阶级有参政的机会。他们希望通过交涉以“消除外患”，不主张对外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他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

们妄想抵制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维护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愿也不敢去触动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还是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或者说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②。可见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为洋务派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范围。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一条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上爬行。

第四节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及其早期状况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③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出现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办的企业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即在四十年代，外国资本就在中国通商口岸经营船舶修理和加工制造等类近代企业，以极低微的工资雇佣中国人去做工，这就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从六十年代起，洋务派开始举办军用工业，在往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共设置了十几个兵工厂和造船厂，七十年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③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三——一三七四页。

代以后，洋务派又陆续举办了一些民用性的新式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又产生了另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与洋务派办民用性企业同时，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开始产生，到甲午战争前，先后开办了一百多个大小企业，于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就逐步壮大起来。

毛主席教导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如前所述，最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到七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而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在四十年代就已出现，比资产阶级早产生三十年左右。从最早一批产业工人产生起，到一八九四年时，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约达九万多人。（见下表）

近代工业中雇佣工人人数总估计
1894年

业 别	工人人数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	34,000人
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工业	9,100—10,81人
清政府经营的炼铁与纺织工业	5,500—6,000人
近代矿业	16,000—20,000人
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	27,250人
共 计	91,850—98,060人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〇页。

附表中的工人数，不包括码头工人和在轮船上作工的工人。表中所列九万多工人这个数目虽然还是不大的，但它是个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并且将随着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将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上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并终将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成为唯一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具备一些特出的优点，这就是：

第一、人数集中。从地域分布说，早期无产阶级都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几个大城市。据统计，一八九四年时上述三个大城市的工人人数约占中国当时全部工厂工人（不包括采矿业工人）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而上海一地即约占百分之四十七。从各种企业雇佣工人的人数来说，一八九四年时雇佣五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有三十九家，其中最大的企业雇工人达三、四千人，总计约有五万七千至六万二千二百人在这三十九家厂矿中做工，占当时全部产业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①可见，早期中国无产阶级的极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几十家企业中，是异常集中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如此集中，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少有的，这对无产阶级加强本身的组织和团结，充分发挥在革命中的作用，增强斗争力量和工人在工人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都是很有利的条件。

第二、经济地位低下，身受三种压迫，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

^① 上附表和数字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一二〇——一二〇三页。

建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受到三种压迫，即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成年男工的工资一般每天约一角五分到二角，成年女工则更低些，一般每天一角到一角六分。在纱厂、火柴厂里有的女工每天只五分甚至不到五分工资。采矿工人多半是计量工资，比一般工厂工人的工资还要低些。以当时上海的物价衡量，一个人一天的最低生活费用需二角钱，不到二角钱的工资是很难维持工人本人的生活的，更不要说养活妻子儿女了。

与工资极度低微成反比例的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却长得很。当时最短每天也得劳动十一——十二小时，有些厂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八小时，而且从来没有星期天，一年到头每天都得去干活。

上述的工资和劳动时间还是表面规定的标准，在实际上，工人还常常被资本家、工头等任意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所以工人的实际状况比表面规定的更加悲惨。

至于劳动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不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资本家，都只管拚命压榨工人，丝毫不关心工人的安危死活。一般厂矿都严重缺乏卫生设备和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工人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资本家对于伤亡事故根本谈不上什么抚恤，受伤残废的工人都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工厂外。工人生了病不但不让请病假，当然更谈不上给医治，还常常被开除出厂，甚至女工怀孕，不仅得不到任何照顾，也常被资本家开除。

工人不但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而且不论在中国或外国人办的厂矿中，还保持一整套极其野蛮的镇

压制度，许多厂矿都派驻军队，时刻准备镇压工人。还设立刑罚工具，随意对工人进行用刑拷打。每个厂矿都有一批封建把头，工头手拿皮鞭、棍棒监视着工人的劳动，任意打骂工人、尅扣工资，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工人连最起码的自由也没有。

以上这些情况还只是对成年工人的压迫情况。当时很多工厂都实行“包身工”和童工制，这些“包身工”和童工的遭遇更是悲惨，他们根本没有工资，劳动时间也更长，而且经常要遭受残酷的毒打，打死了，家长也无处去评理。这些“包身工”和童工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沉重的非人的劳动、忍饥挨饿和家常便饭式的毒打，使他们大批被残酷折磨死，不少人没有等到“满师”就被折磨死了！这是何等残忍的剥削和压迫！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这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每个工人都有一本血泪斑斑的家史。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竟胡说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其罪恶用心就是要为资本主义唱赞歌，要让资本主义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复辟，让千百万工人再去受资本家的压榨，让广大贫下中农再去受地主的血腥剥削，让中国再变成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真是反动透顶！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这种残酷压迫，使得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来自日益贫困破产的农村，他们刚离开农村不久，一般仍然和农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同广大农民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以上便是中国无产阶级固有的一些特出的优点，这些特出的优点，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发扬光大。

中国无产阶级从很早就已开始了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一八七九年，上海英商耶松船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工头尅扣工资举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中国工人举行了反对外国监工殴打工人的罢工。一八八二年，开平煤矿的矿工发生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一八九一年，该矿的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矿工们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使得所有外国技术人员都一度滚出厂矿，后来英国驻天津领事勾结李鸿章对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后，这场斗争才暂告停息。一八八三年和一八九〇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为了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先后发动三次罢工。一八九〇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人罢工。一八九五年，汉阳铁厂工人因抗议厂中翻译委员打骂工人而举行了罢工。其他如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也是不断发生。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工人几乎在所有厂矿企业中都有斗争。这些斗争基本上是要增加工资，反对尅扣工资和反对延长劳动日而举行罢工，也即是经济斗争。反对压迫带政治性的斗争较少。那时工人的斗争还是自发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政党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才成为“自为”的阶级，走上有机组织的斗争阶段，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第六章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 宗教文化侵略。边疆 危机和中法战争

第一节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宗教文化 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一、宗教文化侵略和传教士的罪恶活动

资本主义列强除了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以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俄、英、法、美等国家，就企图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虽未能为所欲为，但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前，来中国的俄国东正教教士还是干了很多侵略勾当。十八世纪初开始，东正教教士以北京东直门内的俄罗斯北馆为据点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一七二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二——五九三页。

七年《恰克图条约》后又增派教士建立了南馆。这样沙俄在中国就设有两个教堂，成为沙俄枢密院和中国理藩院之间的联系纽带。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归沙俄外交部管辖，每年向沙皇政府领取一六，二五〇卢布。显然，教会是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教会又是沙俄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例如，一七五六年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协助俄国商队领队阿克塞·弗拉迪金以一千五百卢布高价从书阁中非法复制一套清朝行省和京师地图，转献给沙俄政府，以作为从事大规模侵略之用。被捧为“俄国汉学之父”的东正教布道团头目雅金甫·俾丘林，在北京十余年间，大肆收集舆图文献，一八一七年绘制了一张《北京城廓图》，在他离京返俄时，竟带走图籍、手稿重达一万四千磅。可见在鸦片战争前，沙俄东正教在北京的布道团的侵略活动是十分猖獗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首先在《望厦条约》中强迫清政府同意“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设立医馆、礼拜堂”。接着法、英等国也取得了同样的传教权利。传教士不仅在通商五口进行种种侵略活动，而且违约潜入内地。一八六〇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允许各地中国人传习天主教。当时充当法国侵略者翻译的两个天主教士，在条约中文本上私自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沙俄在《中俄北京条约》中还取得在新疆喀什噶尔修建“圣堂”的特权。此后，传教士大批地涌了进来，并且明目张胆地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的不过数十人，到一八八九九年，美、英和欧陆国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达到一千二百九十六人。天主教的人数还超过此数。他们到处建立教堂，广收信徒，披着宗教外衣，干着数不清

的危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第一，进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妄图在精神方面征服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单用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国人民的。美教士史密斯说：“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是平凡的重复，充满着革命的火花。因为中国人民永远不愿意屈服于暴力的统治。”^①于是他们以传教士为尖兵，对中国人民进行“心理战”，妄图使中国人民“服从基督”，忍受外国强盗的侵略而不反抗。真是恶毒之极！

为了这个目的，外国传教士除了进行宗教欺骗宣传外，还用所谓“慈善事业”即办医院、办育婴堂等作幌子，进行欺骗活动。传教士高尔德在一八七七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供言：“传教医生的工作和目的，……既不是为着介绍医学，……也不是为着慈善而慈善，……他们无非是用治病为传教的手段。”“因为医生每天与他（或她）的病人接触，他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育婴”呢？传教士玛桑供称：“育婴，大大地增加异端分子对我们的好感。”不但如此，他们还把女婴为“资本”，用来引诱穷人入教，玛桑供言：“单是为着希望从育婴堂获得一个女婴作媳妇，往往全家都来受洗。”可见，所谓“慈善事业”，不过是侵略者用来欺骗中国人民接受奴化思想的勾饵而已！传教士们还借“慈善事业”大发横财，他们以慈善为名，向中国教民募捐，使有些教民“剖家财之大半输之教主无难色”。其次，他们在“慈善”的名义下，勒令中国人民赔款。譬如，

^① 史密斯，《今日之中美关系》第四十九页。

一八九八年美教士在四川江北厅强夺产业开设诊疗所，遭到人民反对，结果勒令地方人民出款五千四百海关两，作为“损失”的赔偿及对“慈善事业”的“乐捐”。其三，他们在“慈善”的名义下，开办工厂、农场、商店及一切可以剥削人民的企业。强迫育婴堂儿童乃至六、七岁幼儿每天劳动十六小时以上，折磨死了许多中国儿童。因此所谓“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吸血鬼的剥削事业。尤有甚者，育婴堂还虐杀婴儿，不给婴儿吃饱，不给治病，不给起码的照料，致使婴儿大批大批死亡，许多育婴堂婴儿的死亡率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上海徐家汇天主堂的“万婴墓”就是最好的见证。徐家汇育婴堂开设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解放前夕的八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被骗进育婴堂的婴儿共约七万余名，剩下的仅百分之五左右，有时死亡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据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自供：“我们孤儿院在开办之初，只养活了七个小孩，……一千多孩子都死了。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三。”^①而所谓医院又往往以贫苦无资的病人作为试验品。因此，所谓“慈善事业”实际是杀人的事业。

传教士还以教会之名办学校、办报纸和吸收留学生，进行欺骗宣传和培养他们的文化奴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供认不讳地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要）给予受洗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

^①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调查报告——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

治地位。”^①为此，他们不但办初等、中等学校，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同世纪末，还先后办了不少大学。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福建的协和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美驻华公使田贝还曾兼任燕京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吸引留学生和办学校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至于办报纸期刊，也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所以传教士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当时的主要报刊有：《中外杂志》（月刊，一八六二年发刊于上海）、《中外新闻》（周刊，一八六四年发刊于广州）、《教会新闻》（周刊，一八六八年美教士创办，后易名《万国公报》，改为月刊，影响较大）等。据统计，一八八九年美、英和欧陆各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医院、诊疗所有一〇五处。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〇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发行了七十六种期刊，其中宗教性质的四十种，“世俗”的即所谓文化性的三十六种。到一八九八年仅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已拥有一百五十五个教会和八百四十九个分会，四万零二十七名中国教徒；一千零三十二所初等学校，学生一万六千三百十人，七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八百十九人。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更大。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前，仅华北四省（直隶、山西、山东、河南），便有天主教会所二千四百二十三个，住堂五十八处，大堂、公堂、小堂一千五百三十五处，教民约十五万人。此外，还有中等学校三十余所，学生四百余人；初等学校近五百所，学生万人以上，大小修院十余所，修士三百五十人左右，医院、施药局及育

^① 《在华新教传教士一八九〇年大会记录》，引自汝卿撰：《美国侵华史》第二卷。

教堂等数十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些文化侵略网，来扩张侵略势力，使中国更迅速地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第二，充当侵华的谋士、间谍和开路先锋。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那些早先到东方来的传教士，就以“中国通”的资格，为侵略者出谋划策，攘夺权利。英国传教士小马利逊担任了《南京条约》的起草人。一八四三年美国政府派出以顾盛为首的侵华使团，传教士伯驾和裨治文充当中文秘书，在签订《望厦条约》中作了无耻的帮凶。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时，不少东正教教士积极参加了这一罪恶勾当。例如：沙俄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彼罗夫斯基（旧译“丕罗福斯盾”）被沙皇政府提升为全权代表，在逼签《中俄北京条约》中向清政府提出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另一个经北京东正教会训练过的长期任新疆伊宁领事的扎哈罗夫（清官方文件译为“杂哈劳”），在签订《中俄西北界约记》的谈判中，一开始他就图谋“变更犁宁省方面和斋桑湖地方的部分走向”^①，以劫掠大大超过《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范围的中国领土。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有传教士的参预。一八五八年美国公使列威廉供称：“没有他们（指传教士）充作翻译人员，公事就无法办理。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他们从旁协助，就一步都迈不开……”^②。这里所说的“尽责办事”，就是对中国的扩张掠夺，于此可见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中所起的作用了。传教士

①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二篇第五章。

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四七二页。

不仅在帝国主义侵华中出谋划策，而且从事收集情报的罪恶勾当。例如，沙俄东正教北京布道团神甫固礼，当伊格那提耶夫于一八六〇年五月离北京去上海与英法加紧勾结时，他被留在北京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特别是收集清朝的军事情报，以提供给英法侵略联军。又例如，经沙俄东正教驻北京教会训练的曾任驻塔城领事的斯卡奇科夫，是一个搜集中国情报的“能手”，他居留北京期间，搜集了中国的有关天文气象、农业、地租、人口、风俗习惯等各方的情报，他在塔城的“图书室”，成为谈判西北界约的俄方代表巴布科夫的“指路线索”，因此被巴布科夫称为他的“真正财宝”。^①东正教在北京的教会在沙俄侵略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无怪巴布科夫在对东正教北京教会歌功颂德时说：“设立这个教会是我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事务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教会成为培养后来在学术界知名的或因有功绩而著名的人物的养成所，在中国担任了我国（沙俄）代表的重要职务。……它……并成为全面研究中国的增进学问的机关，我国政府从这个来源可以获得关于中国的最确实的和最新的材料。”^②俄国如此，其他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传教士亦莫不皆然。美国公使田贝于一八八七年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的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③对侵略者的“贡献很大”，不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孽很大吗！

①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二篇第四章。

② 同上。

③ 《美国外交档案》，一八八八年，引自汝卿辑：《美国侵华史》第二卷。

第三，对中国人民肆意掠夺。传教士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和帮凶，就必然是掠夺中国的豺狼，欧美资产阶级也不讳言：“传教士都是坏蛋，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①除前面所讲到的借口募捐骗取钱财等外，强占人民房产，也是传教士肆意掠夺的一个重要方式。一八九六年〈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中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已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在一八六〇年后强占房产的事遍于各省。如一八八七年济南长老会“企图攫得一块永租的地皮为开设医院之用”，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佳白挟着皮包，冲入该地住宅，命令住户空出房间，由他占领。致令住户的老幼妇孺惊愕莫名……”。这种强盗行径，连帝国主义分子田贝也不得不承认李佳白的“行为是强暴的”。各地教会无不“广置田宅，经营蓄息”，成为残酷剥削中国农民的大地主。而且教士霸占田产，“既不过割，又不输粮”，把田赋完全转嫁在农民身上。传教士还制造种种藉口勒索赔款。如一八九八年山东日照德国教士被殴，勒索“恤银”二万五千两。此外，传教士还从事各种非法的经营如贩卖鸦片等。

第四，侵犯主权，包揽词讼。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后，清政府所拟〈传教章程〉中说：教士自立门户，违抗中国法令，僭越权柄，“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②。教士“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其有以一省最高官吏自居者，如山东传教士自称巡抚，命令各地方官服从

① 丹顿特：《亚洲的民族运动》。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

教堂的指示。媚外污贱的官吏有奖，如贵州主教胡缚理向总理衙门“保举前道员多文等，请予优奖”。不顺从的官员有罚，如“四川、贵州教士因教案请撤地方官”。又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福建主教发卖执照，每张洋二十四元，“良民有此，始免凌虐，奸民有此，乡里横行”。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连卖国媚外的机关总理衙门也承认：“似此无理已极，情实难容。”教士还力图使他们的信徒也享受这种非法特权。教会吸收土霸、恶棍、流氓入教，这些人“一经入教，鱼肉乡民”。他们“作奸犯科，一倚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有天主堂者，地方辄不能安其生，而教士之势乃张，为祸至于无穷”^①所以这些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至于教士包揽词讼之事亦随处皆是。“教民若有户婚田亩词讼”，都由教士出面说情，教民犯罪被押，教士则硬请释放。竟弄成“凡系奉教之人，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凡有词讼，教则必伸，非教必屈。”有的地方官吏诉说：“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偶拂其心，教士则饰词上诉。”其他如奸淫妇女，逞凶残杀，在各地也是不断出现。

传教士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列宁说得好：“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的确，中国人民十分痛恨这些胸挂十字架手捧《圣经》专于侵略勾当的豺狼，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

(1)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

(2)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争，狠狠地打击了这些殖民强盗。

二、利用孔教作为洋教侵略的帮凶

孔孟之道是束缚人民思想和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它是剥削之道压迫之道，同时也是侵略者的侵略之道和卖国贼的卖国之道。这对于旨在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者和殖民主义先锋传教士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东西。洋教与孔教结成“非常亲热的两兄弟”，“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是必然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知道，单用洋教这个“舶来品”还不足以征服中国的人心，于是他们借助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历来用以愚弄、麻醉人民的孔教作为洋教侵略的帮凶，来实现其征服中国人心的罪恶目的。

早在鸦片战争前，沙俄的北京布道团成员，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就先后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俄文，随后又将《三字经》译成俄文。沙俄传教士尊孔读经的吹鼓手雅金甫·俾丘林竟胡说“《四书》包含着关于道德和治国的最纯正的概念”。理雅各是继玛利逊之后来华较早的传教士，他“竭数十年之心力”，把四书五经译成外文，“甚至编搜注释，纤悉靡遗”，据说这是为了“互明彼此尊崇之道”，实际是为了达到恣意侵略而不遭反抗的所谓“互教睦谊”^①的目的。

一八六〇年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洋教士大批地涌了进来，他们在扩大传教的同时，大力宣扬尊孔。一八六六年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就鼓吹“通经致用”；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则说西人是早就“欣慕尊崇”中国的“圣教文化”

^① 李提摩太：《中国宜于教会主持公道论》，《万国公报》第一八七期第五页。

的。^①他们一致推崇孔教在中外反动派勾结中的作用。传教士们在这时也异口同声地叫嚷尊孔读经的重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孔教与洋教“共通”的谬理。在这方面讲得最系统的要算是德籍教士花之安的《自西徂东》。此书刊行于一八八四年，从一八七九年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数十篇。该书分五卷，每卷一集，用孔道的仁、义、礼、智、信名其集。它系统地进行耶稣教教义的说教，宣扬耶稣之道与孔孟之道所谓“共通”的“理”，实行洋教与孔教的反动结合，绝大多数篇目中都引用孔孟儒家的片言只语以与耶稣教义相应证。尽管书中烦琐附会海阔天空地瞎说一通，但作书的目的是明确的，花之安在书的“序言”中一开头就说是“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警醒”什么呢？他说“第一要着，贵有以使列邦和平，不至有齟齬不合”。要做到这点，必得用“仁爱之大道，而致天下一家，远人悦服”。这里讲的“大道”就是孔道和耶稣之道。全书七十三篇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的。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曰“耶稣实与儒教之理同条而共贯”。传教士们懂得，要利用孔教作为洋教的帮凶，必须找出它们“同条而共贯”的“理”。花之安同所有反动儒士一样，首先在“天人合一”上做文章。他说：“儒教言理，则归于天命之性，耶稣道理，则归于上帝之命令”^②；“西人所传耶稣之道，原本于上帝之道”，而儒家的五经，又“多合上帝之道”。^③因此，孔教与耶稣教本是一家，它们都是“天人合一”观。他胡说天赋予

① 赫德·威妥玛二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② 《自西徂东·序》。

③ 花之安：《传道会》，《自西徂东·信集》第三三九页。

人的性灵，本来是“仁义皆全”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与朋友之交，本属天性之自然”^①。“人一论”是违背不得的，违背了，就是孔老二所说的“获罪于天”，“获罪于天”据说连祷告的地方也没有了，那怎么活下去呢！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妄图用“天”、“上帝”这类东西把中国人民束缚于伦常之中，桎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思想。

二曰“怀柔远人”实即要中国人厚待侵略者。花之安为了兜售这个歪理，胡诌了一通孔孟的仁义礼恕。什么“博爱之谓仁”，人而不仁“曷得为人”，不仅要爱一般人，还要“爱怜仇敌”“仁及禽兽”^②，至于对那些把侵略说成友谊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不用说就更更要倍加仁爱了。花之安说，本来孔老二早就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既然是兄弟，中国人对待这些洋大人当然应该“推心置腹，相待以诚”，这不是什么新要求，不过是中国人“复圣人怀柔之典”^③而已。

为了要中国人不仇视侵略者而且要厚待他们，花之安又大力宣传孔孟的恕道。他胡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是“帮助”中国达到富强，是在行孔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恕道，中国人对待从事侵略的强盗们也应该行恕道的另一面，即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即不要仇视和打击侵略者，遭人仇视打击是不愉快的。这样，“恕道之行，……中外无龃龉之事”^④矣。据李提摩太说这就必将实现“中外一家，一合而不再分”^⑤的“大同世界”，

① 花之安，《学贯精通》，《自西徂东·智集》第二三三页。

② 《自西徂东·仁集》第五十二、五十六页。

③ 《自西徂东·仁集》第五十一页。

④ 花之安这些谬论参见《自西徂东》一、四十八、一三二等页。

⑤ 《中西教会报》，一八九六年一月号第一页。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可以通行无阻地恣意侵略，且能使中国人永远屈从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所谓“中外一家”。

传教士们又都是些“中庸狂”，从花之安到李提摩太，到沙俄的俾丘林，都狂热地爱上了中庸，他们都一致引用《中庸》“柔远人则四方归之”^①的话，所谓“柔远人”就是厚待侵略者的同义语。爱中庸的恶毒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第三是镇压人民革命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列强确定了扶持清政府并以它作为自己的侵略工具，以实现其侵略要求的政策，它们一致鼓吹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以维护清朝的统治。花之安之流大肆攻击人民革命运动，诬称太平军、捻军为“红匪捻匪”，主张对中国人民要“义以制之，仁以育之”，用“圣道教民”，人民就不致“揭竿为乱”。^②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传教士们大力强调忠君，说什么“为人臣者杀其身而有益于君”，就要做到“杀身成仁”^③，不仅是忠君，而且要全面进行三纲五常的说教，说什么“人伦为教化之先声”，如果“其理已深入乎骨髓，虽庸夫俗子，断不敢轻弃君父而溃其防闲”^④。这样，人民革命不会发生，清朝就可以稳固，帝国主义就可以太平平地压榨人民而不遭到反抗了。梦做得多么美妙啊！

传教士们在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同时，也攻击主张革新和爱国的法家路线，特别是攻击法家理论实践家秦始皇。他

① 参见花之安：《自西徂东·仁集》第四十七页；李提摩太：《帝王初学自序》，《万国公报》一八九八年三月号第七页等。

② 上四句引文见《自西徂东·义集》第一二〇、一二一、七九页。

③ 花之安：《劝戒轻生》，《自西徂东·礼集》第二〇九页。

④ 花之安：《清除鸦片流弊论》，《自西徂东·义集》第一〇页。

们胡说行封建之法，“国家可以长久”，秦始皇“变乱旧章”，废封建改郡县，是违反所谓“道”的，^①又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胡说秦始皇“焚百家之书，……坑天下之士，……而卒以亡秦。”^②他们之所以这样恶毒攻击法家秦始皇，就是因为如果中国“变乱旧章”，帝国主义就要失去封建主义这一统治中国的支柱了。

但是，那里有侵略奴役，那里就有人民革命的反抗斗争。殖民主义的先锋传教士们，不管你用洋教也罢，孔教也罢，“儒教……与耶稣之教相表里”^③地进行精神奴役也罢，其结果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掀起的持续数十年并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就是这种反侵略斗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三、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和天津教案

传教士的魔爪深入中国内地，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蓬勃地发展起来，一八六一年，贵阳爆发了反洋教斗争，接着迅速扩展到湖南、江西。一八六二年南昌人民为反对法国天主教堂虐杀婴儿等罪恶发表《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痛斥教士的种种罪恶说：“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两年间，“灭教公函”、“驱教檄文”广泛传播。贵州开州，湖南湘潭、衡阳、清泉，江西南昌、进贤等处，群众纷起攻击教堂，驱逐教士。一八六四年后，斗争扩及到四川、安徽、福建、河

① 花之安：《明正通权》，《自西徂东·义集》第一三三页。

② 花之安：《广行恕道》，同上书第一三〇页。

③ 花之安：《学贵贯通》，同上书《智集》第二三五页。

南、直隶、江苏等省，尤以四川的酉阳、酆都等地的斗争最为激烈。各地斗争交相影响，群众斗志日益昂扬。一八七〇年，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导火线是“教堂迷拐幼孩”。天津教堂对“育婴”怀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往往诱导为非作歹的教民从事迷拐。一八七〇年六月，育婴堂所收容的婴孩死去三、四十人。同时，从破获迷拐幼童犯的供词中证明，这种罪恶勾当都是教堂干的。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不约而同有上万人包围了法国望海楼天主堂，同法驻津领事丰大业进行说理斗争，丰大业竟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向通商大臣崇厚鸣枪威胁。丰大业出署后，适遇在场弹压的天津知县刘杰，又向刘杰开枪，击伤刘杰随从高升。群众激忿之下，将丰大业殴毙。随后爱国群众又火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传教士等侵略分子二十名。事件发生后，英、美、法、德、俄、比、西等七个资本主义侵略国家联衔“抗议”，战舰云集在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以兵力相威胁，逼令清政府屠杀爱国人民。法国海军提督甚至疯狂叫嚣：“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① 惧外媚敌的清政府惊惶万分，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去津“查办”，不久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是洋务派官僚的大头目，是外国侵略者的忠实走狗。他们抱定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方针，曾国藩说：“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牒中亦须含浑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几在不失柔远之道。”向法国保证杀人数目，任意罗织，昼夜刑

^① 《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三十三，第五十一页。

讯，拟出了一个“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的名单。惨杀爱国人民十六人，缓期处死的四人，发至边疆充军的二十五人，赔款四十九万两。清政府还派崇厚去法国“谢罪”。曾国藩之流无耻地向清廷奏报说：“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徧告诸邦。”^①这个笃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曾国藩，充分现出了反动卖国的原形。爱国人民恨透了曾国藩之流，愤怒地撕毁他贴出的布告，痛骂他是卖国贼。不久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国人皆曰可杀的仇恨声中死去了，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

天津教案后，中国人民反教会的斗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各地。从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后到九十年代的二十余年间，反教会斗争深入发展，有以下几个显著标志：（一）广泛而又深入。从前期几个地区的反洋教斗争，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凡是有洋教士的地方，都发生反洋教斗争。而且下层群众卷入斗争的越来越多，前期曾参加斗争行列的封建士绅，逐渐动摇、叛变退了出去，表面上少了一部分人，实际上队伍纯了，力量更增强了。（二）人民群众把反侵略反压迫联系起来。通过斗争实践，群众不仅逐渐认识到外国侵略者利用教会进行侵略活动，而且也逐渐感触到封建统治者依附洋人，借洋人“以威逼小民”的问题。他们喊出了“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长官欺凌”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口号。例如，一八九〇年四川余栋臣起义发布的檄文中，在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传教士的暴行的同时，还揭露了封建官绅“助桀为虐”的反动行径。（三）斗争形式从“骚动”“暴动”或“民教械斗”，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七。

逐渐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武装起义，终于汇成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

反洋教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充沛的爱国热情和坚强的革命毅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无限蓬勃的生气。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戳穿了所谓“同治中兴”和“中外和好”的无耻骗局。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军，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 边疆和邻邦的侵略

一、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我国台湾和侵占琉球

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就已在鼓吹对外侵略了。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和封建贵族、军阀合作之下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日本逐渐成为极端反动的军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野心极大。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日本就从出兵台湾、并吞琉球下手开始对外侵略。

日本对我国台湾和琉球的侵略，得到了美国侵略者的支持。美国对远东的许多岛屿包括琉球、我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一直抱有领土野心。一八六七年，美国借口台湾人民曾经袭击美国水手，派了两艘军舰侵犯台湾。台湾同胞奋勇抗击，把美国陆战队打得大败，粉碎了美国侵略者的武装侵略。美国在第一次武装侵略台湾遭到可耻失败后，就转向支持日本侵略者，以便坐收渔利。

一八七〇年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挟订约通商，昏庸的

清政府竟然同意。第二年日本派遣伊达宗臣到天津和中国订立《修好条规》，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两国互派公使、设领事、通商；两国互相保有领事裁判权。日本政府对这个条约很不满意，因为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日本没有能够得到欧美各国在中国所得到的同样的权利。伊达宗臣回日本后，不久就被免去所任的大藏卿（财政大臣）的官职。但当时日本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批准了这个条约，并于一八七三年派副岛种臣来中国换约。副岛种臣一方面和中国交换条约，另方面怀着侵占台湾和并吞琉球的野心，借口一八七一年有琉球国的船只遭台风飘到台湾，被台湾高山族人误杀数十人的事件，向清政府交涉。清政府根据琉球同清朝“宗藩关系”的事实，指出这件事与日本无关，予以驳斥。日使无言可说。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者派兵三千人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

日本和美国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美驻日公使德龙除积极鼓动日本侵略台湾外，还推荐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日本外务省顾问。李仙得和美国海军军官凯赛尔直接做了日本侵略军的参谋。李仙得参与了日军制订侵略台湾的作战计划。美国向日本提供子弹八千万发、兵舰二艘，还派海军少校日格赛尔和陆军中尉华森协助日本指挥军队。美国旗昌洋行还派船替日本运兵。美国侵略者支持日本的目的就是先让日本侵入台湾，试探清政府的态度，然而利用“利益均沾”的特权和日本一样享受侵略权益。

五月，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琅琦登陆，遭到高山族人民坚决的抵抗，打死打伤日军五百六十多人。日本侵略者退踞龟山，设都督府及医院，修桥筑路，妄想长期霸占下去。清政

府闻警，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带海陆军到台湾，兵力远胜过日本侵略军。事实上，日本在当时要实现所谓“征台”计划是有很大困难的。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才几年，军力、财力都还不足。侵入台湾以后，遇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不断给侵略军带来伤亡；士兵又不断遭到疾病的威胁。在国际上，由于日本的侵略性过于露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给予日本以实际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表明日本在那时还难以实现夺取台湾的野心。为此，日本在发动侵台战争不久，即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派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进行外交讹诈。狡猾的美国侵略者联络英、法公使出“调停”，用外交恫吓来达到侵略目的。他们代日本侵略者向清政府要求二百万两的军费作为“赔偿”。

当时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是大卖国贼李鸿章。李鸿章明知“日船非中国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但他不敢违背英、美侵略者的意图，力主议和，命令不准“开仗启衅”。十月，由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在北京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并“赔偿”日本军费五十万两银子。实质上这就等于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一八七九年日本用武力侵占琉球，废琉球国王，改为冲绳县。琉球被并入日本版图，并成为日本侵略我国台湾的军事跳板。

二、英国侵略缅甸和我国云南、西藏

英国侵占印巴次大陆后，就把它作为跳板，向北侵略阿富汗、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和中国的西藏、新疆；向东侵略缅甸，并经由缅甸侵略中国的西南。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就发动了第一次英缅战争（一八二四——

一八二六年），割取了缅甸西部沿海地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夜，英国又发动第二次英缅战争（一八五二——一八五三年），割取缅甸南部沿海。于是英国侵略者计划建造从仰光经八莫到达中国云南省的铁路，开辟一条侵华的陆路交通线。一八五六年回民起义军杜文秀占领大理，在云南西部建立政权。英国侵略者阴谋利用杜文秀政权，达到它侵占云南省的目的，英属缅甸政府于一八六八年派遣了五十余人的武装“探测队”，经八莫前往大理。由于云南西部战事激烈，“探测队”没有到达大理，窜到腾越后回缅甸。第二年，英属缅甸政府在八莫设立了一个政治和商务办事处来策划侵略阴谋。“探测队”向英属缅甸政府报告说：“在八莫、腾越之间的路上，修筑一条长达一百三十英里的公路或铁路，就能有效地开发云南的资源，且使我们与中国西南的财富和资源发生直接的联系。”英属缅甸政府根据这个报告向英国政府上了一个备忘录说：英国的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如果受到阻碍，“意味着印度财政遇到严重的危机”，如果水路受到干扰，那末经过云南的商业路线，对于不列颠帝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英国侵略者于一八七四年派军官柏郎带领一支由一百九十三人组成的武装“探测队”，探寻由缅甸通往云南的途径，英国驻中国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沿长江西行，经湖南、贵州、云南前往缅甸，引导“探测队”侵入中国。一八七五年一月马嘉理与柏郎在八莫会齐。二月，马嘉理引导这支“探测队”到达云南腾越。当地人民听到有洋人带兵入境的消息，已有所戒备，对马嘉理严加盘诘，马嘉理竟开枪杀人，激起了人民的义愤，立即处决了这个杀人犯，柏郎见势不妙，带领“探测队”狼狈退回缅甸。

英国侵略者借口“马嘉理事件”，借题发挥，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一系列新的扩大侵略的要求。英国公使威妥玛还恫吓清政府，一会儿说要和清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一会儿又匆忙出京到上海，扬言要和清政府打仗。一八七六年九月，清政府终于被迫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主要内容为：（一）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二）凡遇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国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可以派员“观审”。这使英国侵略者得以进一步侵犯中国的司法权。（三）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四）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五）英国侵略者可以派官员调查滇缅边界贸易情况，把侵略势力深入西南边疆。（六）英国可以派员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前往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使英国势力侵入我国西藏。这些不平等的条款不仅表现了英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南边疆的野心，而且在许多方面扩大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侵略特权。英国侵略分子得意忘形地说：“这一条约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之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二八四二年及一八五八年的条约。”^①可见这个条约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危害了。

英国侵略者在侵略缅甸和我国云南省的同时，还把它的侵略触角伸入我国西藏。一八八四年，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官员马考烈企图由印入藏。他到达哲孟雄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地方，为当地居民所阻，没有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于是逼清政府于一八八五年同意马考烈入藏。马考烈组织了一支约

^① 马士、麦克乃尔：《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三三九——三四〇页。

三百人的武装队伍，准备入藏，受到我国藏族居民的坚决反对，又未能得逞。一八八六年，英人从哲孟雄修筑道路直达我国西藏境内。西藏地方当局为了自卫，在吐隆山建卡设防，英人反诬西藏地方部队“越境戍守”，叫嚣要用武力驱逐。一八八八年三月，英军进攻西藏，西藏地方部队英勇抵抗，毙敌百余。侵略者调来了援军，于九月再次入侵，西藏地方部队终因众寡不敌，吐隆山、朗热等要隘相继落入敌手。正当藏族人民积极准备反攻，收复失地时，清政府竟派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赴前线求和，与英国谈判，又派赫德的弟弟赫政充当升泰的助手，使英国侵略者通过赫政完全操纵了谈判。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七日，订结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哲孟雄……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逕办”；（二）划定我国西藏和哲孟雄边界，从而侵占了我国的一部分地区；（三）进入西藏的通商容后再议。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五日，中英双方又订结《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商定开亚东为商埠，听凭英人从边界至亚东随意往来。英国胁迫清政府同它订立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攫夺了我国西藏部分土地和通商特权，为它以后侵略西藏打开了大门。

三、沙俄、英国对我国新疆的侵略

沙俄通过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和一八六四年《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与此同时，又调集大军征服中央亚细亚，并且继续从西面侵略中国。中央亚细亚存在着三个汗国，就是布哈拉、浩罕和希瓦。其中浩罕和中国接壤，是清朝的朝贡国。十九世纪前半期，沙俄已多次对上述三汗国发动武装进攻，六、七十年代正是沙俄侵略军大举进攻浩罕最后加以吞并的

时候。沙俄每占并一个地区，既是对当地领土野心的实现，又是把它作为侵略邻近地区的跳板。一八六一年，沙俄的奥伦堡总督声称：“我们占有塔什干，不但可以完全控制浩罕，并且可以把我们的势力伸入布哈拉，以便我们扩大在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贸易”。一八六五年，沙俄攻占了浩罕的塔什干。

一八六四年新疆回族、维吾尔族人民起兵反清，建立了好几个反清政权。这些政权先后为封建主所窃夺。他们实行封建割据，主要窃踞如下五个地区：黄和卓踞东四城（库车、喀喇沙尔、阿克苏、乌什）称土尔其斯坦王；妥明踞北疆及吐鲁番、哈密，称清真王；金相印占踞西四城一带；玛福迪、哈比图拉在和阗建立了统治机构；阿布拉门的据点是叶尔羌。其他还有一些小股势力如攻占伊犁的维吾尔族封建主迈孜木杂特等。在这些叛乱分子中，以黄和卓、金相印和北疆的妥明的势力较大。这时，喀什噶尔之汉城，仍为清军所固守，金相印久攻不下，竟勾引浩罕汗国封建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阿古柏贪婪残暴，野心很大。他于一八六五年侵入新疆后，先兼并金相印的西四城，继而攻灭阿布拉门，诱杀玛福迪、哈比图拉于叶尔羌，并攻取库车灭黄和卓，最后于一八七〇年战败妥明。这样，阿古柏控制了南疆的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并准备窥取伊犁。阿古柏于一八六七年在喀什噶尔非法建立伪“哲德沙尔（七城）汗国”，自立为汗，他任意夺取农民的土地，征收名目繁多的重税，又订出种种封建制度压迫和奴役人民，使新疆各族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

由于少数民族中封建主的分裂割据和阿古柏的入侵，整个新疆陷于分裂和混乱的状态，这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造

成了可乘之机。沙皇政府和英国殖民者各怀鬼胎都想把阿古柏作为侵略中国新疆的一个走卒。一八六八年沙俄和英国先后派代表前往喀什噶尔，对阿古柏进行拉拢和收买。

沙俄早就盘算强占中国的伊犁地区，它认为新疆的叛乱会拖延很长时间，清政府是无力在那里恢复统治的，还在新疆反清举事开始不久，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就派兵控制伊犁河上流的特克斯河谷，把伊犁的出入要道掌握在手中，以便待时而动。一八七〇年八月，俄军乘机侵占伊犁西南边界上的要隘穆扎尔山口。一八七一年六月沙俄以防御叛乱分子侵扰俄国边界为名，派军长驱直入，侵占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沙俄侵略军将原为伊犁将军和清军驻扎的大城毁去，又“将大城西三城庐舍燹为平地”^①，利用这些拆下的材料，在大城东九十里金顶寺地方，另外建设一个市区，街道长约二十里，为沙俄侵略者和俄军驻扎之所。新占领的伊犁地区归驻阿尔马阿塔的谢米列饮斯克的行政长官管理。同时，沙俄侵略者大杀大抢，成千上万的边疆人民惨死在沙俄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设官分治，移民垦殖，任意勒索中国各族人民，“日媵月索，劳扰不堪”^②，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

沙俄政府在侵占伊犁时曾向清政府诡称：俄国并无久占伊犁之意，“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③一八七二年春，清政府派员赴俄与俄方代表商议交还伊犁。俄方代表绝口不谈伊犁问题，反而要派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八。

② 同上书卷十五，第二十九页。

③ 《新疆图志》卷五十四《交涉志二》，第二页。

“助”清政府收复新疆各地，要求在新疆天山南北各城通商、设领事，态度十分横蛮无礼。当时，沙俄正在阴谋活动，想要通过阿古柏伪政权吞并新疆。沙俄一面从伊犁向东进攻乌鲁木齐，一面派员和阿古柏谈判订结条约。在乌鲁木齐起兵先后反抗妥明和阿古柏反动统治的徐学功，见沙俄侵略军向东进攻，奋起抵抗，在乌鲁木齐西面绥来县石河子地方，把沙俄侵略军打得大败，阻止了沙俄侵略军的进攻。但是，沙俄与阿古柏于一八七二年六月订立了一个“通商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阿古柏同意俄国在天山南路各地自由通行和经商，俄商在南疆只纳百分之二点五进出口税，俄国在南疆各城设“商务代表”和建立“商馆”。沙皇妄图侵吞我国新疆的野心暴露无遗。

英国侵略者也想通过阿古柏伪政权吞并新疆。阿古柏在与俄国订约的同时又与英国相勾搭，尊奉当时英国的附庸土耳其帝国为上国，一八七四年二月，和英国侵略者也订立了一个“通商条约”，给予英国各种特权和利益，英国承认阿古柏伪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就这样，阿古柏成了英俄的侵略工具。

阿古柏转而亲英，沙俄即在新疆边境结集俄军二万，准备用武力夺取新疆。但由于浩罕军民不甘心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于一八七五年发动武装反抗运动，沙俄不得不把结集在新疆边境的军队调去镇压。接着又发生了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俄土战争遭到英、奥、德三个强国的干涉，沙俄不敢在这时再在新疆和英国冲突，但又怕新疆经阿古柏伪政权落入英人手中，失去吞并新疆的机会，因此，沙俄决定不干涉清军收复伊犁以外的新疆各地，以便以后再从

清政府手中夺取过去。

一八七三年底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后，收复新疆、巩固西北塞防成为现实问题。第二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清政府把对日本屈辱的原因归之于“海疆备虚”，提出了“切筹海防”之议。“海防”“塞防”都需要经费，何轻何重呢？清统治集团展开了一场争论。以李鸿章为首的集团说，海防重要，塞防无足轻重，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这是一种出卖祖国西北领土的荒谬主张。以左宗棠为首的集团则主张俄国的威胁最大，目前应注重西北。出兵收复新疆。这种主张具有反抗外国侵略、维护领土主权的积极因素，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在任命沈葆楨、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的同时，于一八七五年五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规复新疆。

左宗棠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于一八七六年率军前往新疆。先进攻盘踞在南疆的阿古柏反动势力。一八七七年，清军在新疆人民支援下打败阿古柏军，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清军连克库车、喀什噶尔等南疆重镇。阿古柏残部伯克胡里、白彦虎等数千人逃入中亚，受到沙俄的庇护。清军收复新疆各地，只有伊犁地区仍在沙俄侵略军的占领之下。

一八七八年，清政府派崇厚去俄国交涉收回伊犁问题。一八七九年崇厚在沙皇的淫威之下，擅自签订一个丧失大批权利和土地的《里瓦机亚条约》。消息传来，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拒绝批准《里瓦机亚条约》，随即改派曾纪泽去俄国重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沙俄代表耍出种种讹诈手段，俄外部副大臣热梅尼象条疯狗似的

狂吠：同中国人谈判，必须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必须把手按在剑柄上，准备和决心拔出它”。^①同时调兵遣将，陈兵伊犁，并派军舰到中国海面上炫耀武力。曾纪泽被迫于一八八一年二月同沙俄重订交还伊犁的所谓《改订条约》二十款，也就是《中俄伊犁条约》。这个新的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沙俄答应将特克斯河一带地方与伊犁九城一并交还中国，但它仍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二）俄国向中国索去侵占伊犁期间的所谓“代守费”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三）沙俄除按照旧例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等地设领事通商之外，还开辟了由新疆到嘉峪关的陆路贸易，允许在嘉峪关、吐鲁番设领事。一八八三年沙俄又逼签《科塔界约》，割去斋桑湖以东和以南大片土地。此外，一八八三到一八八四年间，沙俄还逼迫清政府订几个新界约，进一步从中国割去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东南地区及阿克赛河源地区等大片土地。这样，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吞并了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一八八三年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沙俄强迫清政府将塔城以南巴尔鲁克山地区借给俄国“游牧”，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租借地”的恶例。

沙俄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进一步掠夺我国最西部的帕米尔地区。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据此，帕米尔西部竟被划入俄境。一八九二年，俄军进一步违约侵入帕米尔东部一带，毁清政府在帕米尔所设卡

^① 杰拉维奇：《俄国在东方》。

伦，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清政府提出抗议，沙俄始则诡称“决无其事”，后来对于《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竟横蛮无理地说：“往南二字，所谓南者，左右均可，非必一直前往不能挪动”，要求中国边界改为“从乌孜别里山口先向东再向南”，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全部割给俄国。一八九五年三月，沙俄帝国主义象窃贼一样背着清政府与英国立约，偷偷地瓜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

第三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侵略越南及其企图经由越南侵入中国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正如胡志明主席说的：“我们越中两国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相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加之国土接壤，地区毗连，更属唇齿相依，互为屏障”。^①因此，在抗击外来侵略者时，中越两国人民总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用鲜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法国侵略者对越南早有侵略野心。十七世纪，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商人和炮舰已在越南活动。

法王路易十六曾根据传教士的建议，拟制了侵略越南，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东方帝国”计划。但未及实施，路易十六的封建王朝，就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完蛋了。此

^① 见《新华月报》，一九五五年七月号，第二三六——二三七页。

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曾多次借口教案派海军到越南勒索巨款。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七年法国海军两次进攻南圻（越南南部）的土伦港（今岷港）。一八五八年七月，法国与西班牙组成联军大规模进攻越南。于一八六二年迫越南订立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开土伦、巴喇、广安等港为商埠；法、西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法国商船、军舰可在湄公河自由航行。一八六三年法国又强迫柬埔寨接受它的“保护”。一八六七年法国侵略军血腥地镇压了昭笃、河仙、永隆三省及柬埔寨南部人民的抗法斗争，占领了这三个省，非法宣布这三个省是法国领土。至此，湄公河三角洲完全被法国侵略者控制。

法国侵略者为了探测沿湄公河进入云南的道路，并妄图利用杜文秀大理政权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组织了一个湄公河上游“调查团”，于一八六八年三月到达云南大理。但是阴谋没有得逞。这个所谓“调查团”经由昆明、汉口、上海然后从海路回到西贡。经过这次间谍活动，他们发现湄公河上游不适宜于航行，决计改由越南北圻（越南北部，法人称之为东京）的红河进入云南，于是开始了对北圻的侵略。

一八七二年十月，法国侵略者的一个武装远征队，强行占领了河内的一部分地区，挑起了一场对北圻的侵略战争。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派安邨率军到河内扩大侵略，攻陷附近的四个省，越南军民奋起抵抗，驻在越南境内的黑旗军亦奋起助越抗法。

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年），广西上思人，出身贫苦，五十年代参加广东天地会反清起义。一八六七年起义军被清军打散，刘永福率领部众数百人进入越

南六安州。一八六九年移居保胜，以保胜为根据地，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在抗法战争中，屡败法军，越南政府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管宣光、兴化、山西三省，扼守富良江两岸。

一八七三年安邛侵犯河内等地时，黑旗军千余人开赴前线，离河内西城门外十余里下寨。十二月，法国侵略军出城挑战，黑旗军过桥和侵略军大战。黑旗军勇猛奋战，悉力攻敌。法国侵略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法国侵越军司令安邛及各将官在后压阵，被黑旗军冲上打死。黑旗军在这次战役中打死打伤法国侵略军数百名。迫使法国西贡总督不得不把河内和安邛所侵占的其他城市交还越南。

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法国强迫越南同它订立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外交事务须受法国监督，法国派军官训练越南军队；法国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越南开河内、东京、海宁为商埠，割下交趾六州与法国；法国可沿红河至中国蒙自县之河道自由通航。按照这个条约，越南实际上成了法国的保护国。一八七五年，法国将第二次《西贡条约》的副本通知清政府，要求中国制止“越境到东京劫掠的中国的武装党徒”和在云南红河沿岸开一个通商口岸。法国侵略者所恶毒污蔑的“中国武装党徒”，就是指助越南抗法的黑旗军。清政府拒绝了法国的要求，并表示不能承认第二次《西贡条约》。

二、中法交涉和法国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金融资本有了迅速发展，大资产阶级要求更强烈地推行殖民政策，以茹费理为首的温和共和党就是这种要求的主要代表。茹费理就是被恩格

斯谴责为“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剑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①大剑子手。他们主张为了谋取商人和银行家的新的贸易和投资场所，用武力扩大海外的法国殖民地。一八八〇年九月茹费理第一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十二月法国外交部对中国公使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蛮横地回答：法国在越南有行动自由，没有对中国作任何解释的必要。一八八一年七月，法议会通过了茹费理提交的拨款二百四十万法郎作为侵越军费的议决案。一八八二年三月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派舰队在东京湾示威，并由李威利率法军四百余人进犯河内，一个月后发动武装攻击，占领河内全城，并且企图消灭黑旗军占领北圻。

清政府见越南危急，派兵出驻谅山、北宁，并想利用黑旗军与法军交战达到他们“鹬蚌相持，渔人获利”^②的罪恶目的。在中法两国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严重起来的时候，如何对付法国侵略者，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前者以左宗棠、曾纪泽为代表，后者以李鸿章为代表。主战派认为，越南的问题是一个牵动大局的问题，越南如果被法国占领，其他邻邦也将相继解体，“北圻尤为滇粤屏蔽”^③，“唇亡齿寒”，云、贵、两广将永无宁日；如果法国的阴谋得逞，其他侵略国家群起效尤，我西藏、新疆、东北等边疆也就危险了，清朝的统治也就维持不住了。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官僚，一意主和，他们是当时的实力派。他们害怕洋人，害怕援助越南而得罪法国，害怕中国人民反侵略

①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八九页。

② 《裴侯致书》，《中法战争》资料丛刊（四），第二六七页。

③ 左宗棠，《时务说帖》，《中法战争》资料丛刊（四），第三二一页。

斗争会破坏他们的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特别是害怕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军事实力，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借口兵力不足，海军没有练成，战则必败，而极力主张对法国妥协退让。主战派和主和派都是反动统治者，他们在镇压人民、敌视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当时法国侵略者步步进逼，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主战派的主张，还算维护了民族利益，这一点上与主和派有区别。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支持李鸿章的主张，于一八八二年十月，授权李鸿章与法使宝海在天津会谈，议定三条办法：（一）中国撤兵，法国声明无侵占土地及损碍越南主权之意；（二）越南开放保胜（黑旗军根据地）；（三）在云南、广西边界和红河之间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这个妥协的协议，遭到各方面反对。但是法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一八八三年二月，茹费理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他决定推翻李鸿章和宝海拟定的三条办法，撤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令法国驻日公使脱理固以特使身份到中国来办理越南问题的交涉。同时，增兵北圻攻占新的军事要地。李威利于侵占河内后，一八八三年三月占领南定省，侵略气焰十分嚣张。五月十九日，黑旗军在距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黑旗军健儿挥舞大刀、长矛、猛砍狠刺敌人，打得法军狂窜乱奔，有的惊若木鸡，坐在地上哀求饶命。侵略军头子李威利被击毙。纸桥战役以法军全军溃败和主将毙命而告结束。

侵略者野心不死，又增派了海陆军，任命新的人员负责指挥在越南的军事进攻，并扬言要进攻中国沿海。清政府派李鸿章到广东去办理越南问题的交涉，并给他指挥广东、广

西、云南三省和在越南的中国军队的权力。李鸿章没有前往广东，迫不及待地图谋和法国的妥协。六月，在上海和法国特使脱理固交涉。脱理固要求中国不阻碍法国“在东京的军事和民事的行动”，“开放中国南部诸省，尤其是云南省的贸易”。李鸿章不敢答应。七月至九月，交涉改由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在巴黎和法国外交部进行，也没有结果。法国一面与中国交涉，一面于八月间宣布封锁越南沿海，在越南大举进攻。北圻法军的进攻遭到黑旗军的英勇抵抗，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坐视黑旗军苦战不加援助，黑旗军伤亡重大。法海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附近沿海岸的要塞，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规定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法国得在红河沿岸驻扎军队保证来往的自由；法国负责驱逐黑旗军。十一月下旬，茹费理指示北圻法军向驻有中国军队的山西和北宁进军，北京的法国代办蛮横地通知清政府说，如果要避免冲突，必须在法军进攻以前撤退中国驻军。

在这种紧张形势面前，主战派抵抗法国侵略的主张，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而当时黑旗军抗法胜利的事迹已广泛传播，深受中越两国人民的称赞。清政府外受法国的逼迫，内受广大人民群众反侵略要求的推动，在对法态度上一度趋于强硬。一八八三年十月到十一月间，清政府也在中越边境上做了些抗法军事准备。十二月十日，法国议会通过了追加九百万法郎军费，十六日，议会通过了茹费理提交的拨款二千万法郎、增派一千五百名侵略军前往北圻的提案。在茹费理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下，法国大资产阶级报刊也发出了一片对中国作战的嚎叫。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中法战争爆

发了。

三、战争第一阶段——从法军进攻山西到《中法简明条约》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国侵略军向驻扎在山西的中国军队进攻，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山西是清军和黑旗军联合驻守的阵地。法军进攻，清守将已先期逃往兴化，黑旗军与法军浴血奋战三日，黑旗军勇士奋力杀敌，有的身受重伤还用枪托把敌人的头骨打碎，为中越人民报仇。经过激战共毙敌三百余人，敌人惊呼“这些人的英雄气概，实在是神奇”。^①只是因为众寡悬殊，又加清军作壁上观，山西于十二月十六日失陷。法军大肆烧杀抢掠，一个法国侵略分子供称：“他们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②一八八四年三月，法军向北宁窜犯，清军不战而逃，三月十二日法军占北宁。十九日法军攻陷太原。四月十二日，又侵占了兴化。法军完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

山西、北宁失守，清政府大为恐慌。慈禧太后为了掩盖败绩，把不战而逃的将领革职拿问，派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越南军事。为了把战败的责任推到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的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任命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大臣，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掌握军机处实权，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但对主和派的总头

① 斯各特，《一八八四年法军进军越南记》，《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三），第三六二页。

② 斯各特，《一八八四年法军进军越南记》，《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三），第三六三页。

子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信任如故，加紧向法国妥协求和。

法国侵略者认为可以利用这次清军的失败迫使清政府接受法国的侵略要求，并且通过清政府解决黑旗军问题。在法国国内，反对派认为在越南进行战争就是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防御。为了缓和国内舆论，茹费理决定要在谈判桌上实现他的侵略野心。通过前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的亲信德国人德璀琳的中介，五月初法国海军中校福祿诺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福祿诺在事前已通过德璀琳向李鸿章提出议和条件：（一）法国保护越南；（二）开放云南省与法国通商；（三）中国赔款，并将占领中国东方沿海地方作为抵押，但这一点尚有商谈余地。除这三点外，福祿诺还向李鸿章提出一个讲和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将驻法公使曾纪泽调开。曾纪泽曾利用法国国内政局变化的时机和法国在欧洲列强间的孤立形势，采取“御之以刚”的态度进行交涉，将法国情况和动向报告给清政府，向清政府建议对策。所以，法国提出召回曾纪泽的要求。正好李鸿章也嫌曾纪泽妨碍他进行妥协退让的交涉，清政府改以力主投降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兼驻法国公使。李鸿章和福祿诺正式谈判了三天，于五月十一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有：（一）中国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二）中国对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律不过问，也就是说中国不反对法国和越南签订任何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殖民地；（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但中国必须开放与越南北圻毗连的边界，听凭法商运销货物。这次签订的是一个“简明”的条约，双方同意“三个月后”议定详细的正式条约。《中法简明条约》使法国侵略者大为高兴，签订的第二天，茹费理给了福祿诺一个电报，要

福祿诺“告诉李（鸿章）：我们在这里为此觉到庆幸。我快乐地体验了这位中国的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的利益的。”^①卖国求荣的李鸿章受宠若惊，赶忙打电报给茹费理，表示感谢，还说“彼此为难之隐衷，两地心照”。真是无耻之尤。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这次条约达成协议之快出于法帝国主义者的意料之外，他们决计重新挑起战争，以抢到更多的东西。侵略者撕毁了他们签字的协议，悍然扩大侵略战争。

四、战争第二阶段——从法军在凉山挑衅到《中法越南条约》

一八八四年六月十二日，法军以“巡边”为名在凉山附近挑衅。清政府认为撤兵应在三个月后的正式详细条约订立后进行，令清军“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六月二十三日，法军七百多人到凉山前的观音桥叫嚷：“越南是我（法国侵略者）地界，让我到凉山巡视，要大官说话。”清军通知法军，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请暂缓进兵。法军蛮横地要清军“或是投降，或是退到中国境内”。说罢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守军阵地，守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打退了法军的猖狂进攻。第二天再次来犯，又被打退。这就是所谓凉山事变。

法国侵略者在凉山挑衅失败，老羞成怒，反诬中国方面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七月四日，茹费理向中国驻法公使李

^① 《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七），第二一六页。

凤苞提出无理要求，要清政府赔款和下达“毫不延迟地”撤退的命令，并通知说：负责商谈正式详细条约的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诺德将停留在上海，不再北上。十二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代办向总理衙门致送最后通牒。又派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从南中国海北上，进行武力威胁。清政府幻想仍按《中法简明条约》妥协退让了事，说法军在谅山的挑衅是偶发的事件，不但不追究法军挑衅的责任，还向法方表示遗憾，宣布将完全按照《中法简明条约》从北圻撤退清军，要求同法国谈判详细条约。十八日清政府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与巴诺德在上海谈判，表示愿付一笔“救助”谅山死亡法兵的款项计五十万两，约合三百余万法郎。法国侵略者一意要扩大侵略，茹费里命令驻华公使巴诺德和海军提督孤拔先在福州采取行动，而后赴基隆进行战斗，“保证取得矿区。这个矿区，应成为我们补给的中心点”^①。法国进犯中国的海战开始了，它首先在福建偷袭马尾军港。

七月十五日，孤拔率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张佩纶等在李鸿章妥协投降路线下，不加阻止，亦不作战守准备，以致在马尾闽江江面上中国军舰与法国军舰一起停泊，“和平”相处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法舰队司令孤拔突然照会闽浙总督何璟等，约是日下午二时开战。何璟得到照会后，惊惶失措，才令各舰发给弹药，起锚应战。中国军舰尚未起锚，法舰即发炮射来，进行突然袭击。中国海军仓促应战，扬武、振威两舰来不及起锚就被击沉，随后飞云、福星等小舰虽然奋勇抗击，

^① 《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七），第二五〇页。

使敌舰也受到一些损失，终因力小难支也在战斗中被击毁。马尾战役中国军舰被击沉七艘，死伤千余人。福建马尾船厂也被敌人摧毁。马尾海战中，中国的人数、船数并不比法国少，下层官兵作战也很英勇。在马尾的中国军舰多数是马尾船厂造的，由于马尾船厂监督法人日意格的捣鬼，这些舰只存在装甲薄、火药库造在锅炉旁边等弱点，但如果指挥者有作战的决心，进行战斗准备，又有陆上火力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取胜的。因此，这次失败完全是由于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它表明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法海军在马尾之战后并没有在福州登陆，三十日驶出闽江，一路上摧毁沿岸炮台，前往进攻台湾的基隆和淡水。

马尾海战后，全国人民愤慨万分，纷纷要求坚决抗击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地群众自发地进行了反抗侵略的斗争。当法国侵略军将战火延烧到中国本土以后，广东潮州、揭阳、佛山，浙江温州等沿海地区以及云南永北厅、贵州桐梓、遵义等地都先后发生反对外国传教士和焚毁教堂事件。“粤东义民，视凡法人皆若仇敌”，“万众汹汹，各无异心”。^①自发地起来向法国侵略分子进行斗争。吓得法驻粤领事急忙带领其传教士、侨民等溜走。温州的群众群起“将教堂六所拆毁，并将海关内各物堆积，纵火焚烧”^②。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不为法国轮船装卸货物，驳艇船工拒绝为法国军舰运送牛羊粮食，其他各行各业工人、商人也进行了罢工、罢市。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出兵镇压罢工工人，工八

① 张之洞，《代署广州协副将记名总兵邓安邦复法教士李默函》，《张文襄公全集》卷九十二公牍七。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七，第二十三页。

斗争更为激烈，表示要放火焚烧在香港的法国洋行，反对法国利用香港进行侵略战争。旅居美国、日本、古巴等地的华侨捐款回国，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人民群众的抗法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迫使李鸿章等卖国贼的求和活动不敢公然进行。清政府也被迫在八月二十六日向法宣战。命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同时给刘永福“记名提督”头衔。刘永福接受提督名号，放弃黑旗军的独立地位，成为清朝的一个官员，这时，法国的方针是边谈边打，一面加紧诱降活动，一面继续增兵，大举进犯。

十月一日，孤拔率舰队攻台湾基隆和淡水，督办台湾军务加巡抚衔刘铭传放弃基隆，法国攻陷基隆，但攻淡水法军被中国守军打得大败。孤拔还派七百余名侵略军登陆，妄想占据据点，也被中国军民分头截击，死伤很多，仓惶溃退。事后孤拔不得不承认：在淡水“损失十分严重！”^①基隆方面法军虽占领了埤口，但由于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法军也未能扩大占领地区。台湾军民的英勇战斗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先行攻占而后逼清政府“让与”基隆和淡水的企图。

法国侵略者进攻台湾计划失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广东、福建、上海等地人民，突破法舰的封锁，不断输送物资去台湾，接济台湾军民。在全国人民的抗法要求下，清政府迟至一八八五年二月才令南洋海军的五艘军舰去支援台湾。法国军舰在途中截击，南洋海军的五舰中有二舰避入浙江象山县的石浦，被法舰鱼雷击伤后放水自沉，余舰避入浙江镇海。三月初，孤拔率舰队攻镇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率军抵

① 《巴德诺致茹费里》，《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七），第二六六页。

抗，停泊在镇海的三舰也投入战斗击退了法舰，打伤孤拔。孤拔决定攻占防御力量很单薄的澎湖。巴德诺向茹费里报告说：“这些岛（指澎湖）的占据已经决定，我们撤退台湾军队之日，该军队应调往该岛。……即缔结和约以后，政府的意见，也许也要保持澎湖。”^①三月二十九日，孤拔率舰占领澎湖，两个多月以后他就死在那里，结束了他的罪恶的一生。

在陆战方面，战场在越南。法国侵略军于一八八五年二月在北圻发动新的进攻。开始时，法国侵略军一度获胜，把战火引近中国广西边界。清政府派曾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冯子材赴前线指挥战斗，三月下旬，中、法两国军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进行了关系全局的一战。当时法国侵略军疯狂地向镇南关进攻，妄图进一步侵占我国广西，冯子材率领中国将士沉着应战。二十三日，法国侵略军从谅山方面倾巢来犯镇南关，敌人向我阵地猛烈轰击，“炮声震天，远闻七八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厚者至寸许。”^②敌人用火药爆炸镇南关，并且狂妄地竖立一根柱子，上写“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中国士兵豪迈地回答敌人：“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中国军队等法国侵略军冲近阵地前沿时，奋不顾身地冲出长墙，拚命杀敌，打退了侵略军的进攻。二十四日黎明，法国侵略军又来反扑，当法国侵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爬进长墙，中国军队“一齐涌出，肉搏冲突，纵横决荡”这时预先埋伏在长墙外面的藤牌军，也从敌人阵地内冲出，争先杀敌，使敌人队伍大乱。这样内外夹击，

① 《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七），第二九七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中法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四五五页。

前后呼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敌人的优势炮火，一点也不能发挥威力，战场上“炮声顿寂，横尸枕籍”，法国侵略军惨败，仓惶逃命。法国侵略者自供当时惨败的丑态说：

“中国军队的号筒，愤怒地响起前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烟云一般的敌人(中国军队)展开旗帜跑来，发出……把枪炮的音响都遮断了的喊杀声，他们因成功而胆力加大，奋力狂怒地向我军(法军)驰突前来。”^①“在我们的脚下，敌人(指中国军队)从地下的一切缝隙里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②镇南关之役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毙法匪千余，擒斩数百，并夺取枪炮，干饼不计其数”。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二十六日克复文渊州。法国侵略军退守谅山，谅山是敌人“强兵、巨炮、军械”聚积的场所，是侵略我国的军事基地。二十七日，中国军队攻到界牌(距谅山城十五里)，二十八日，前锋进攻驱骡墟，一阵激战，打伤法国侵略军统帅尼格里，驱骡墟为中国军队占领。谅山外围的敌人全数被歼。法国侵略军龟缩谅山城内，砍断浮桥，妄图顽抗。中国军队从浅水处渡河，三路并进，全力猛攻谅山城。中国军队英勇顽强，奋力登城，劈开城门与敌人开展白刃巷战。法侵略军惊慌失措，乘黑夜弃城狼狈逃窜。谅山战役，中国军队“总计毙敌不下千余”，缴获枪炮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① 黎贡德：《法军谅山惨败记》，《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三)，第四五九页。

② 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三)，第五三一页。

西路战线，在中国军队和黑旗军的互相配合下，一八八五年三月底，在临洮打败了法国侵略军，四月，攻下宣光，接连又克服数十州县，向河内挺进。

越南人民在战争期间发动了广泛的反法斗争，并从多方面支援中国军队。各阶层人民有八九千人编列成营，与西路华军并肩作战。著名的黄花探领导的抗法起义军长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到处袭击法国侵略军，给法国在北圻的殖民统治以严重威胁。在谅山战役中，当地越南人民积极帮助中国军队侦察敌情，带路助战。“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来相犒问，愿供办军米，向导先驱，助官军剿除法人。”有一千多越南人民直接参加了谅山大战。越南人民对中国军队战胜法国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反抗法国的侵略战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镇南关——谅山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凶焰，使法国政府处境狼狈不堪。法国人民本来就反对资产阶级发动侵略越南和侵略中国的战争。法军在越南的失败增强了他们反对战争的意志。法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在巴黎举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里”等口号。人民的反战斗争促成了发起侵略战争的茹费里内阁于三月三十一日倒台。法国的政治、军事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镇南关——谅山大捷扭转了整个越南战争的局面，使形势变得对中、越两国有利。但清政府不仅没有组织进一步的斗争，以取得更大的胜利，反而在胜利声中下令停火，赶忙结束了战争。清政府本来是被迫进行战争的，表面上曾强硬一时，却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一八八五年二月，中国在越南战场上一度失利时，清政府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操纵

下，派赫德的亲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为代表，在巴黎与法国进行了秘密的议和谈判。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消息传来，清朝统治者反而唱出所谓“乘胜即收”的卖国论调。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①一度主战的曾纪泽也认为：“谅山克、茹相革（指茹费里辞职），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稍让亦合算。”以求立即议和。这正符合处境困难的法国侵略者的意愿。四月四日，金登干奉赫德之命代表中国与法国外交部在巴黎签订《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及所附的《解释》主要内容如下：（一）清帝公布谕旨声明实行《中法简明条约》，命令北圻清军撤退，所有海陆军事行动全行停止，这个谕旨和命令发出后，北圻法军司令命令法军不准越入中国边界。（二）北圻清军接到上述撤退命令后，法军解除对沿海的封锁。（三）规定了北圻清军于四、五两月中撤退的具体日期。（四）商订正式条约，正式条约签订后法军从台湾撤退。这个协定签字后，清政府压抑了前线将士的昂扬斗志，强令在越南的中国军队撤回边界。清政府还几次下令调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入关。刘永福在个人利禄诱惑下，不顾部下群众的反对，抛弃了黑旗军旧部，只带三千人入关，当上了清政府的总兵。从此，刘永福彻底背叛了起义军，黑旗军也改变了性质，由反对清封建王朝反动统治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队伍，变为维护反动统治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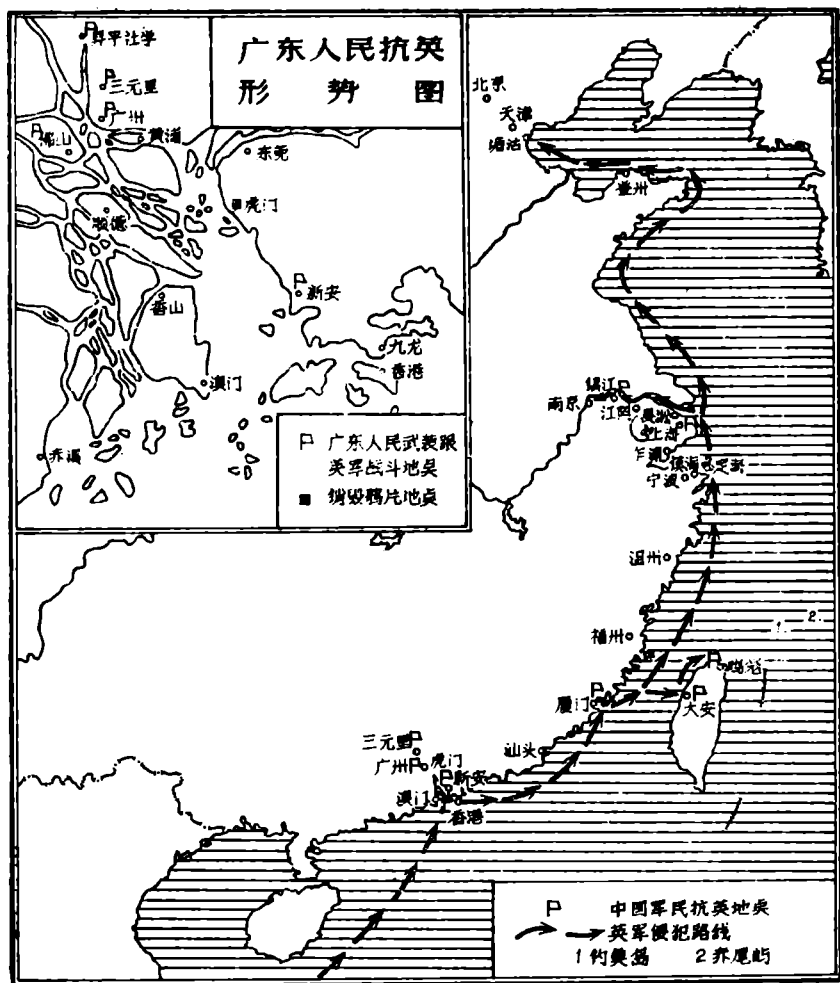
六月九日，李鸿章和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越南条约》，主要内容有：（一）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

^① 李鸿章，《电稿》卷五，第二十四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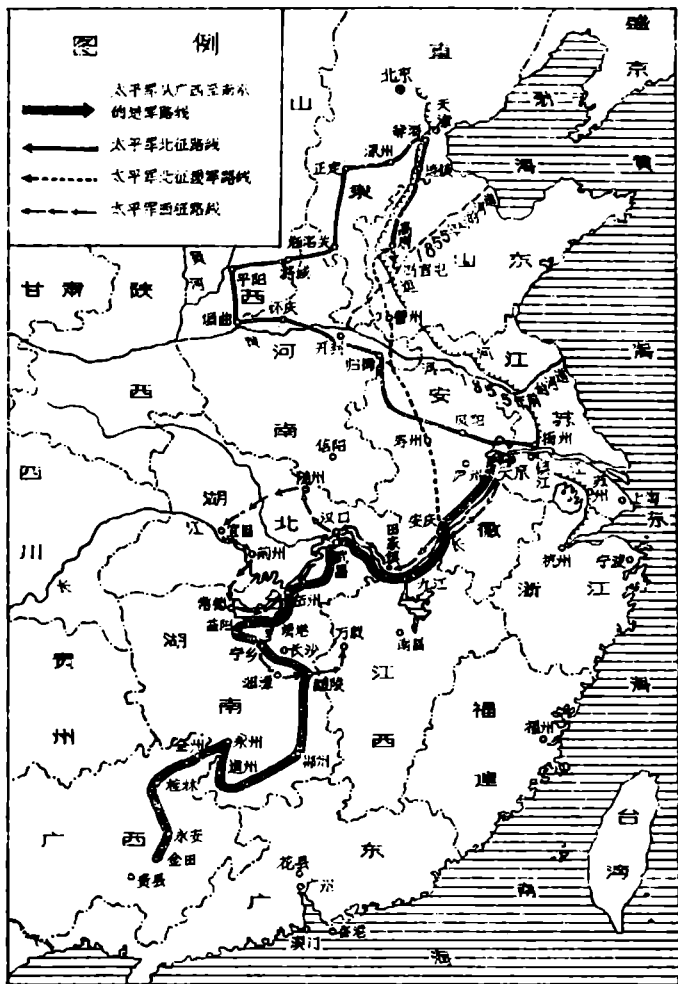
圻的边界(这项规定承认了越南为法国殖民地)；(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后来确定为云南蒙自和广西龙州，还增加了法国领事官属下一员驻扎蛮耗的规定)；(三)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四)法国撤走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法国侵略者被中越两国人民及军队打败了，但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朽使法国侵略者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达到了它的侵略目的。清政府把中国军民浴血抵抗侵略的胜利成果，出卖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强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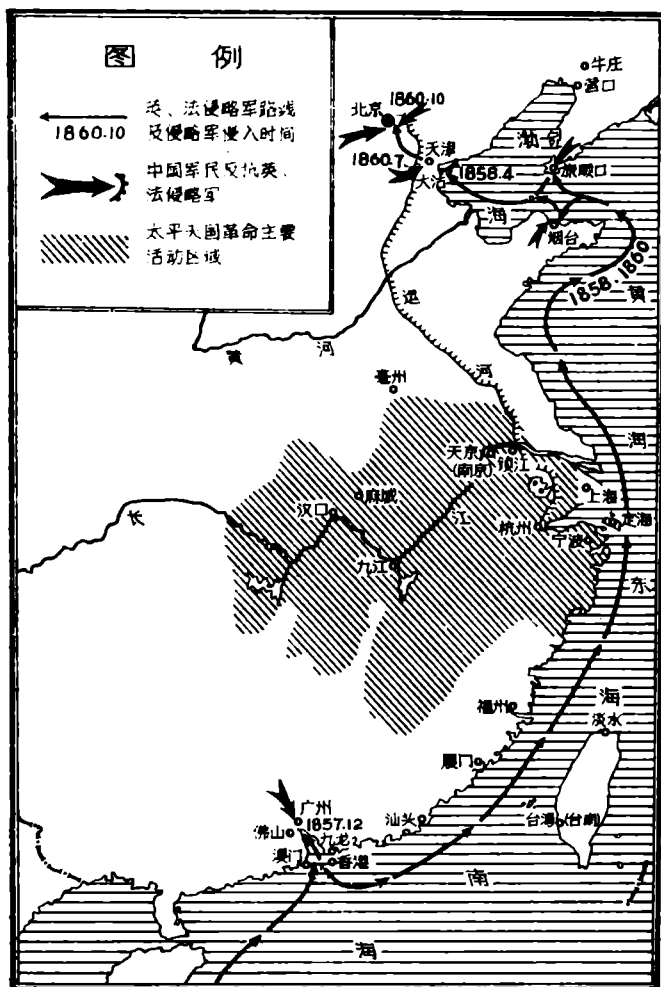
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者直接侵占、统治了南圻和北圻，安南王国领土限于中圻，与柬埔寨同为法国的“保护国”。一八九三年法国侵略者又併吞老挝为“保护国”，合称法属印度支那。英国于一八八六年併吞缅甸的全部，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完全暴露在英法两国的侵略魔爪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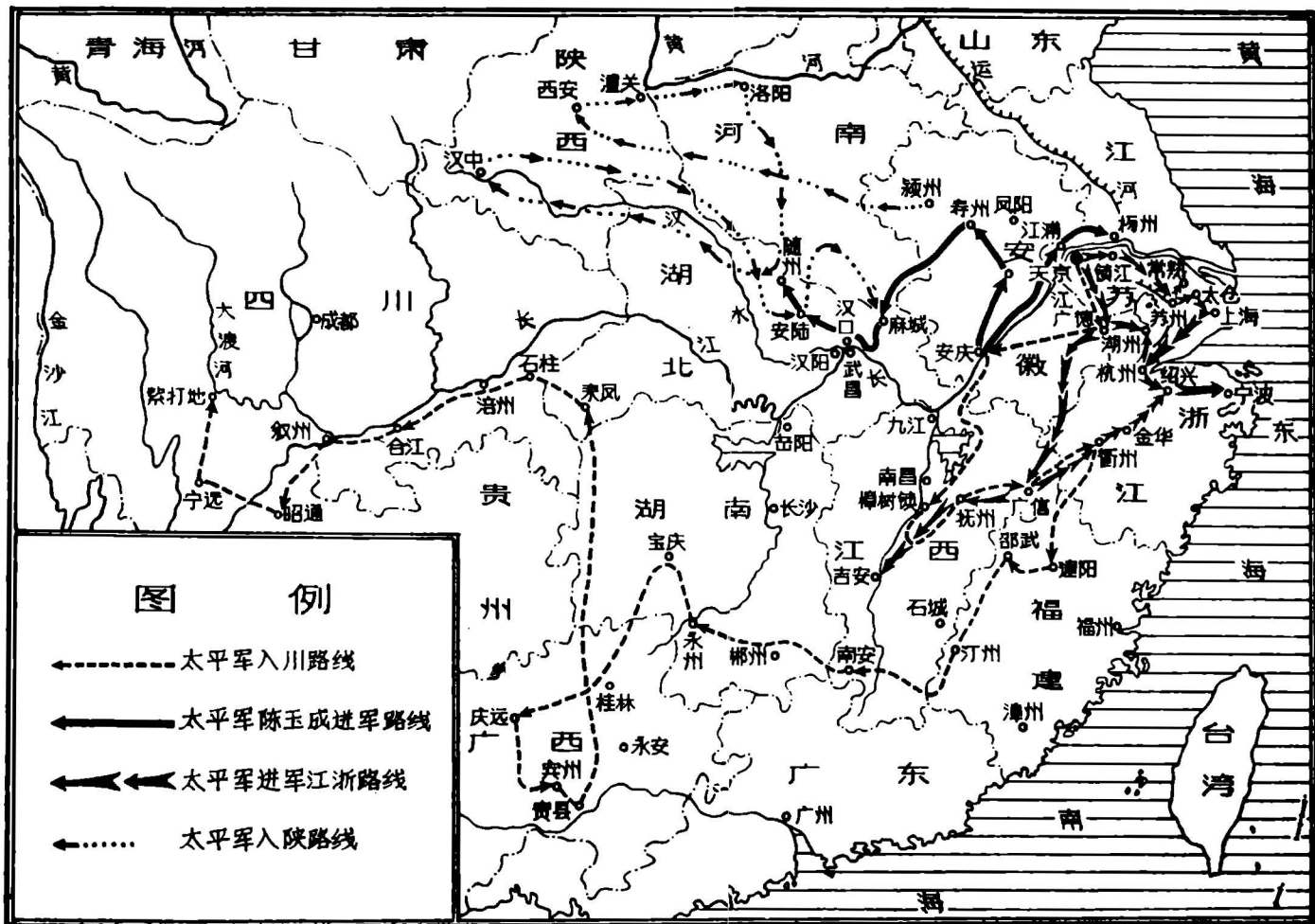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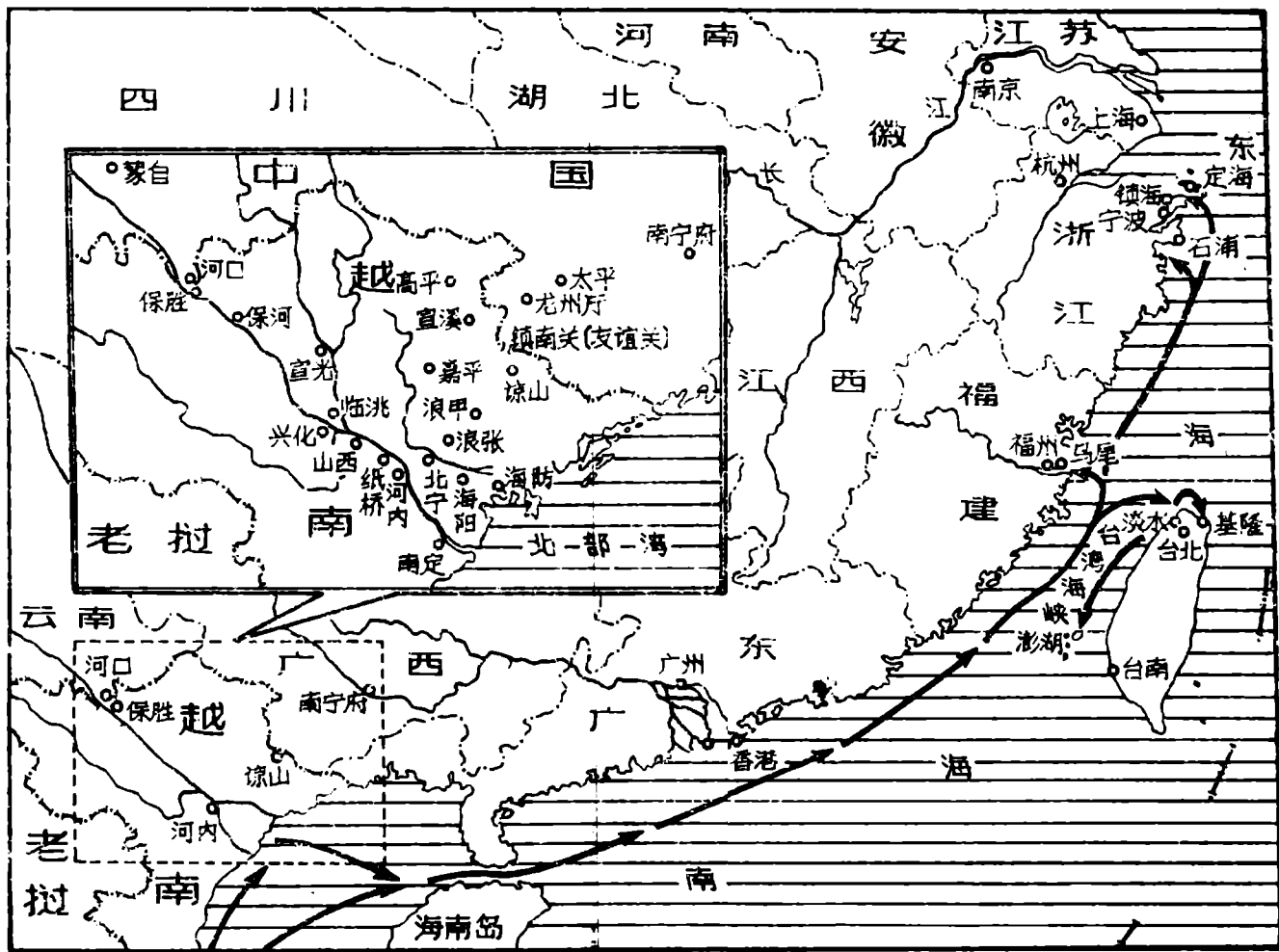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前期革命形势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太平天国后期革命形势图



中法战争形势图

中国近代史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组编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